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林蒔慧博士

語言政策對民族認同的影響：以南斯拉夫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標準化進程為例

The Impact of Language Policy to The National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Standardization of Serbo-Croatian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碩士班研究生：莊慧瑾

中華民國一零八年六月

DOI:10.6814/NCCU201900758

題獻

獻給我的父母和所有親愛的家人們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758

致謝頁

在五年的漫長碩士生涯中，我覺得自己像是重讀了一次大學一般。在休學前，有個學長跟我說了他休學的故事，他說寫論文是一直不斷在跟自己對話的過程，我想唸碩士就是這個心情吧！總而言之，在不斷和自己對話的過程中，謝謝很多人把我拉出來，讓我還能與世界對話。

先謝謝我的指導教授－林蒔慧老師，沒有老師不會有今天的這本論文，我常常覺得論文是為了老師、審查委員和碩士畢業證書那張紙而寫的，謝謝老師總是不厭其煩地提醒我，人生的每個決定都不是為了誰，而是為了你自己，讓我不只在學術方面有微小的一點長進，也多少替我回答了一些有關人生的疑問。還有要謝謝我的前指導教授－薩承科老師。謝謝老師在我最找不到自己的時期鼓勵我休學，也大方地讓我換一個指導教授，甚至後來還時時關心我的論文進度和幫我改俄文摘要。我真的是個很幸運的人。還有也要謝謝亞榴申娜老師，那麼臨時地接下幫我改俄文摘要的部分，真的真的很感謝，讓我不至於不能畢業。這本論文的完成還要感謝我的三位審查老師－杜子信老師、鄭得興老師和大綱審查時的王雅萍老師，謝謝杜子信老師提供我好多寶貴的資料和講了好多有關南斯拉夫人的故事，我好像又重新唸了一次斯拉夫語文學系的感覺，而且對南斯拉夫的分裂有更深的了解。謝謝鄭得興老師幫我釐清問題意識，讓我重新思考民族和語言的關係，還有也謝謝王雅萍老師在大綱審查時指點我論文的方向，我在完成碩士學業的路上真的遇到很多很多貴人。

謝謝我的精神科醫生－張勝傑和學校的諮商師們，特別是最後一個學期的修慧蘭老師，謝謝你們的幫忙，我才能鎮靜地寫完論文。真的很謝謝你們！

謝謝系上的幾位教授和助教還有同學們（例如宋繼元），特別是定嘉老師和美莊學姊，從我大學起就對我很照顧，不論是學業上還有有關人生的好多問題上，儘管我現在還在找尋答案，但謝謝你們提供了你們的答案給我。還有謝謝邦邦和小黑，沒有你們，我好多有關行政的部分都搞不清楚。

謝謝蘭友會的諸多友人，謝謝芳吟一直替我加油打氣、簡榮德總是陪我大聊沒有意義的廢話還有蔡一豪精簡概要地回答我好多問題，你們陪我度過漫長的碩士過程。復學的這一年還要特別感謝小禎姐姐、容瑋姊姊和大炫姊姊，謝謝你們三個聽我好多不論是做學術還是人生的煩惱，特別要謝謝小禎姊姊的一句「學問慢慢做、學位快快拿」，讓我又有重新回來念碩士的勇氣。還有要謝謝陳定良、瑾俐和林宜靜以及在捷克認識的友人們，不論是跟我一樣休學過的朱墨，還是陪

DOI:10.6814/NCCU201900758

我一起度過低潮的寧寧姐、李游皓和陳建男。此外也要謝謝三不五時就與我通信鼓勵我的日本友人們，像是聰子、鈴香和遠藤兄。

放到最後的就是我的家人們，謝謝你們支持我唸碩士，也謝謝你們陪我度過我的低潮，不論是我的父母親還是弟弟，謝謝你們！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758

摘要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為二十世紀第二南斯拉夫的語言政策對民族認同的影響，此外，並在文中探討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分裂以及和國家分裂的關係。

本文分為五個章節，第一個章節為緒論，說明論文架構及問題意識；第二章為理論基礎，探討民族認同與語言的關係還有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原則和架構；第三章為南斯拉夫的歷史背景探討；第四章則是南斯拉夫的語言政策、語言規劃和其對民族認同的影響；最後一章為結論。本文發現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分裂可以說是歷史發展的結果，還有與其說是語言政策對民族認同的影響，不如說是相反，是看民族認同如何影響語言政策。

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是在十八、十九世紀的民族主義浪潮中出現的語言，當時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開始追尋自己的民族主體，語言成了這股浪潮下的產物，後來更是建立起南斯拉夫的關鍵之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語言是融合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讓他們能成為一個政體的關鍵，但在二十世紀後期卻也是讓他們分裂的關鍵之一。

本文以語言分裂和民族認同為題，探討南斯拉夫的分裂。

關鍵詞：語言政策、南斯拉夫、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民族認同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758

Abstract

The thesis aims to, on the one hand, figure out how language policies have influenced national identity in Yugoslavia, and investigate the collapse of the Serbo-Croatian language.

The Serbo-Croatian language was a cultural invention of nationalism during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omanticism, south Slavic scholars began to trace back who they were and tried to reconstruct their identity and to build their nation. Sharing the same spirit, Serbian linguist Vuk Karadžić and Croatian linguist Ljudevit Gaj reformed both Serbian and Croatian languages, as an approach to demonstrate their independent national identity to other Europeans. In 1850, the term "Serbo-Croatian" was coined and had existed until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wever, the term "Serbo-Croatian" was eventually collapsed and divided into "Serbian," "Croatian," "Bosnian," and "Montenegrin." The names of these languages also embody their "state-nations."

The thesis reaches a conclusion that language is a key to unite people; however, when the civil war broke out in 1990s, the name of this unified "language" had nonetheless become a critical site of struggles. This particular case study demonstrates how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have affected language policies, instead of the other way around. It is important to emphasize that while a nation endeavors to create its "language," such a linguistic formation would simultaneously construct its creator.

The thesis is to provide a case study of Yugoslavia, we can see how nationalism affects language policy, but at the same time how language policy makes impact on national identity. I hope this paper can bring some insights for Taiwan's current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目錄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1
第二節：研究目的.....4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設計.....4
第四節：研究限制.....5
第五節：文獻回顧.....5
第六節：章節安排.....9
第二章 理論基礎.....11
第一節：語言政策.....11
第二節：標準語與語言標準化.....18
第三節：民族、族群認同與語言.....22
第三章：歷史背景探討.....29
第一節：南部斯拉夫民族的形成.....29
第二節：泛斯拉夫主義運動.....30
壹、發生背景.....30
貳、泛斯拉夫主義下的文學互惠.....34
第三節：Vuk Karadžić的文字改革.....36
第四節：伊利里亞運動.....42
第五節：第一南斯拉夫成立前和後的南斯拉夫各國歷史簡述.....44
壹、「南斯拉夫」的概念起源：.....44
貳、波士尼亞在第一南斯拉夫成立前的簡史.....46
參、克羅埃西亞在第一南斯拉夫成立前的簡史.....46
肆、蒙特內哥羅在第一南斯拉夫成立前的簡史.....48
伍、斯洛維尼亞在第一南斯拉夫成立前的簡史.....48
陸、塞爾維亞在第一南斯拉夫成立前的簡史.....49
柒、第一南斯拉夫的成立及殞落.....50
第六節：狄托和第二南斯拉夫.....54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第四章 南斯拉夫的語言政策及國族認同.....58
第一節：南斯拉夫的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58
第二節：塞爾維亞語和克羅埃西亞語.....66
第三節：一個名字內包含了幾個語言？.....73
第四節：「南斯拉夫人」的認同.....80
第五章 結論.....87
第一節：民族認同下的語言和語言政策.....87
第二節：關於給臺灣的借鏡.....89
第三節：後續研究建議.....92
參考文獻.....93
附錄.....108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758

表圖目次

表：

表 1 語言規劃與其目標.....16
表 2 按語系的語言分類表.....58
表 3 斯拉夫語系同詞類比表.....59
表 4 語言使用面積分類表.....59
表 5 以各語言為母語者分類表.....60
表 6 南斯拉夫 1974 年憲法語言分類表.....61
表 7 南斯拉夫 1974 年憲法定義的語言位階表.....61
表 8 以各語言的教材分類為例.....63
表 9 三大方言的差別.....68
表 10 南斯拉夫 1954 年到 1974 年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聯合語言名稱...72
表 11 BCS 的對話差別 78
表 12 四種語言同詞對比表.....78
表 13 南斯拉夫 1971 與 1981 的南斯拉夫民族人口數.....81
表 14 南斯拉夫民族認同分布.....82
表 15 克羅埃西亞南斯拉夫民族人口數.....83
表 16 以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語為母語者.....83
表 17 塞爾維亞南斯拉夫民族人口數.....84

圖：

圖 1 語言規劃與標準語的形成.....20
圖 2 南斯拉夫境內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下各方言的分佈
圖..... 67
圖 3 語言、認同與國家關係圖.....75
圖 4 南斯拉夫與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對比
圖.....77
圖 5 四種語言狀態圖.....79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語言在社會的發展中一直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與社會的結構、文化、政治等面向都有極密切的關係，也是人類社會中最顯著的交際工具。語言的變化與發展同時受到多方因素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國家的語言政策。

面對不同種族的文化與差異，諸多國家對於語言問題的處理尤為謹慎，順應多元化潮流的趨勢，強調尊重各種語言學習的權利漸漸成為國家語言政策規劃的重點。然而，並非每個具有多元種族的國家均是如此，有些國家為了符應國家體制以及國家教育目標，語言政策的方向大不同。根據史都華（W. Stewart）的分析，多元種族的社會在建國的過程中，對語言規劃所採取的政策，可歸納為兩大類：一是獨尊一種語言，則利用教育及法律等手段消除其他語言，而獨尊一語做為國語；一是多種語言並存，並擇一或若干種為官方語言，做為不同族群間溝通的語言。（郭振羽，1995，頁 57）（引自葉玉賢，2002，頁 2）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是位於二十世紀巴爾幹半島地區的南斯拉夫，其政權更迭包含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斯洛維尼亞人王國、南斯拉夫王國、南斯拉夫民主聯盟、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和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消失於冷戰瓦解之後。在社會主義時期，有這麼一句話形容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有七個鄰國、六個共和國、五個民族、四種語言、三種宗教、兩套字母，和一個目標—相親相愛，團結共存。」南斯拉夫屬於多種語言並存的國家，並同時使用兩種不同的書寫系統：拉丁字母和西里爾字母（Cyrillic）。就使用的普遍性而言，使用這兩種書寫系統的南斯拉夫人口差不多各佔一半。（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著、許綬南譯，1999，頁 35-37）孩童們在學校先學一套字母，然後再學習另一套字母，先後順序因地制宜，取決於這兩套字母在他們就學地區的普遍性。通常在他們長大後，他們會固定使用其中一套字母，但是同時也能保留另一套字母的閱讀能力。在現今南斯拉夫地區有為數一半的共和國（塞爾維亞、蒙特內哥羅、馬其頓）以西里爾字母為官方書寫系統；兩個共和國（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的官方語言則使用拉丁字母；在波士尼亞和赫塞哥維納境內，這兩種書寫系統的使用率約略相當。（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著、許綬南譯，1999，頁 38-39）依據各語言在前聯邦境內使用的普遍性：依次為塞爾維亞－克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羅埃西亞語、斯洛維尼亞語和馬其頓語。

回顧歷史沿革，19 世紀初，塞爾維亞語言學家、文學家吳克・卡拉季奇（Vuk Karadžić），在斯洛維尼亞語言學家葉爾奈伊・科比達爾（Jernej Kopitar）的影響下，他改革了塞爾維亞語及其正字法：19 世紀中期，由年輕的克羅埃西亞知識份子發起 「伊利里亞運動」，在這項運動中，克羅埃西亞語言學家和作家劉德維特・蓋伊（Ljudevit Gaj）和朱羅・丹尼季奇（Đuro Daničić）提議將使用最廣泛的 Štokavian 方言當作基礎，以此來發展克羅埃西亞的標準語言，而這個「伊利里亞語」也就是現在克羅埃西亞語的前身。塞爾維亞語言學家吳克・卡拉季奇和克羅埃西亞知識份子發起的伊利里亞運動語言改革都不約而同選了 Štokavian 方言當基礎來改革。簡而言之，現在的塞爾維亞語和克羅埃西亞語是有共同的基礎的。（Popović , 2004, pp.26-29）卡拉季奇將塞爾維亞西里爾字母標準化，而蓋伊以及丹尼季奇則是使克羅埃西亞拉丁字母標準化，並分別加上各自地區方言的特點。

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這個複合語名稱出現的背景為 1850 年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作家及語言學家簽署「維也納文學協定（Bečki književni dogovor）」，當時宣稱要建立一個共同的語言標準，一個複合的雙選項語言就這樣出現了，塞爾維亞人稱之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克羅埃西亞人稱之為「克羅埃西亞語－塞爾維亞語」。在後來的南斯拉夫王國（原名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王國），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以「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亞語」成為官方語言。（Greenberg, 2008, p.9） 1954 年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及波士尼亞的作家、哲學家等 25 人簽署「諾威薩德條約（Novosadski dogovor）」，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訂定標準並為南斯拉夫建立語言及種族上的團結。（Greenberg, 2008, p.18） 1991 年南斯拉夫爆發內戰，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也隨著各國獨立而分裂，恢復為在塞爾維亞就稱為塞爾維亞語，在克羅埃西亞的就稱為克羅埃西亞語。而曾經使用塞爾維亞－克羅埃西語的波士尼亞和蒙特內哥羅，在國家獨立後也認為自己所說的語言為波士尼亞與和蒙特內哥羅語。事實上，在南斯拉夫發生內戰前，根本沒有「波士尼亞語」和「蒙特內哥羅語」這樣的語言名稱出現。

1992 年隨著波士尼亞戰爭出現波士尼亞語這個名稱，但在岱頓協定後的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土地上，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並不承認「波士尼亞語」，只有波士尼亞人承認有這個語言的存在。（Greenberg, 2008, p.3）而蒙特內哥羅語則是出現在 2006 年蒙特內哥羅獨立之後，在這之前蒙特內哥羅語一直被視為是塞爾維亞語的方言。而現在一些政治團體進一步推動之下，2007 年 10 月 22 日蒙特內哥羅的新憲法中將蒙特內哥羅語定為官方語言。（M.M., 2007）但目前蒙特內哥羅語仍在標準化的過程當中。（Šćepanović, 2017）但在本論文將僅針對「塞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中的兩個發展中心語言——塞爾維亞語和克羅埃西亞語的標準化過程，不進一步討論波士尼亞語和蒙特內哥羅語。

筆者大學時就讀斯拉夫語文學系，開始接觸並認識斯拉夫民族，但是大學四年期間的學習主題，大部分都是以俄語以及俄國文化為主，基本上從來沒有接觸過南斯拉夫相關議題。大學期間出於興趣，選修了斯拉夫語文學程中的捷克文語文組。後來進入碩士班時，有幸取得捷克教育部的研究生助學金，並赴布拉格查理士大學進行一年的學習。這一年除了在學校繼續學習俄語和捷克語之外，也利用機會探訪歐洲各國，其中便包括巴爾幹半島。

由於大學時期學了東斯拉夫語支的俄羅斯語、西斯拉夫語支的捷克和波蘭語，到了巴爾幹半島，自然而然也開始留意和學習當地屬於南斯拉夫語支的語言，不論是塞爾維亞語、波士尼亞語還是克羅埃西亞語，發現一件很有趣的現象，這幾個語言的基本用語相似度極高。出於好奇心，進一步確認發現，原來這三種語言也可以說是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當下決定之後的研究方向將以南斯拉夫為主，並以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為題。

本研究的比較時間界定範圍為1945-1991年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也就是二戰後重建的南斯拉夫民主聯盟到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盟解體分裂前。時間點之所以如此界定，原因在於雖然廣義上來說，在 1918 年奧匈帝國解體後，塞國攝政親王在貝爾格勒正式宣告成立「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王國」時就已經是南斯拉夫的雛形，但二戰後南斯拉夫建立共產政權，實行一黨專政直到 1991 年分裂成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克羅埃西亞共和國、斯洛維尼亞共和國和馬其頓共和國等五個獨立國家，這段共產時期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才為一般人所熟知的南斯拉夫。

二戰後，由狄托領導的共產黨成為戰勝的政治力量，並一直持續到 1991 年。所以筆者選擇這段時間作為研究的範圍。雖然狄托在 1980 年就過世了，但他的影響力一直持續影響到 90 年代。（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著、許綬南譯，1999，頁 121-128）

南斯拉夫憲法並沒有指定官方語言，憲法中還保障不剝奪每個人說母語的權力，那為何之後語言議題也是南斯拉夫爆發戰爭的原因之一？根據「南斯拉夫分裂大戲」的作者，前南斯拉夫駐歐洲共同體大使—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的觀點，他認為一個國家裡有這麼多的語言，除了提高溝通的成本外，也會造成民族情感和「身份認同」的問題。簡單來說，語言是支持或反對南斯拉夫最重要的戰場之一。（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著、許綬南譯，1999，頁 43）除上述以外，另一個疑問是，在南斯拉夫全國通行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在國家分裂後，是如何分別進行標準化？這也將是本論文要討論的議題之一。

綜上所述，本文將以「語言政策與認同：以南斯拉夫塞克語的語言標準化進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程為例」為主題，期望能找到以下問題的答案：狄托時期的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是如何實施語言政策？南斯拉夫分裂後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是如何進行標準化？以及他們的語言政策對民族認同有什麼樣的影響？

第二節：研究目的

本論文論述、分析南斯拉夫語言政策及其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標準化進程為例，同時探討語言政策對民族認同的影響，研究目的歸納如下：

（一）梳理 1945-1991 年南斯拉夫的語言政策。

（二）了解塞爾維亞語和克羅埃西亞語的分裂過程。

（三）探討語言政策對民族認同的影響。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設計

研究方法攸關研究過程的進行，研究過程大致可分為兩個方向：（一）如何收集資料、（二）如何分析資料。本論文擬採用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為社會科學研究廣泛應用的研究方法之一，藉由搜集歷史資料，經由客觀的分析、評鑑，利用可靠及可信的資料研究社會變遷及其規律性， 解釋社會現象的現況，甚至預測將來之發展。（林倩宇，2015，頁 7）它是「系統而客觀的界定、評鑑並綜合證明的方法，其主要目的在於了解過去、洞察現在、預測將來。」（葉至誠、葉立誠，2002，頁 138-156）文獻可分為兩類：初級資料來源（primary sources）與次級資料（secondary sources）。初級資料即活在過去歷史中的那些人物的信件、日記、報紙、電影、小說、衣料、照片等等流傳至今者。（W. Lawrence Neuman 著、朱柔若譯，2000，頁 743-744）次級資料則包含專書論著、期刊論文、報章時事及網路資料等相關資料。本研究在採用文獻分析法進行歷史分析時，詮釋及再次建構歷史事實的一個佐證資料。

文獻分析法具有以下優點：

（一）協助研究者在相關領域中選擇題目，一方面避免選擇重複性太高的題目，另方面可避免選擇沒有充分資料的題目。

（二）幫助研究者確定問題的所在。

（三）幫助研究者瞭解知識基礎及其理論限制。然而，閱讀文獻是在刺激分析、思考，而不是代替研究者自己的思考，不要強使自己搜集的資料套入別人的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研究架構中，如果別人的觀念架構適合自己的資料，不要害怕借用這些觀念，並在自己的研究中擴展這些觀念，但是如果不適合，就不要用它們（黃瑞琴，1991）。

本研究透過蒐集國內外書籍、期刊、學術論文、報章雜誌以及官方出版品，最後進行整理與分析，藉由文獻探討來了解南斯拉夫的語言政策及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標準化進程，進而探討語言政策對民族身份認同的影響。

第四節：研究限制

筆者雖曾親臨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和波士尼亞，然而由於缺乏適當的人脈與管道，未能取得第一手資料，實屬遺憾。再者，筆者學習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未滿一年，語言能力有限，儘管短篇文章尚能理解，但仍無法大量閱讀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文章。除此之外，大量巴爾幹半島相關文獻多是以德文做撰述，惟筆者不諳德語。為此，筆者將大量參閱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和蒙特內哥羅學者的著作以及相關英文和俄文文獻資料，以補足其他文獻收集的不足。

第五節：文獻回顧

台灣以南斯拉夫為研究對象的論文或是專著並不多，且多集中於關注南斯拉夫內戰的成因與後續爆發的武裝衝突，試圖用地緣政治或是民族主義等觀點來解釋戰爭爆發的原因；另外則是有關經濟轉型的研究，探討南斯拉夫分裂後，進入民主國家的前南斯拉夫接續國的經濟轉型問題。

目前台灣現有關於南斯拉夫的碩博士論文中，本研究較關注的是張珍瑜（1993）所著的碩士論文〈民族主義分離運動之比較研究－以南斯拉夫與捷克斯洛伐克為例〉，這本論文完成的相當早，且是至今國內唯一一本關注於一個特別現象的論文，就是南斯拉夫與捷克斯洛伐克皆是斯拉夫民族、皆於冷戰後瓦解，且皆是前共產主義國家，那為何分裂後會產生如此不同的後果？捷克與斯洛伐克和平分離，然而南斯拉夫卻爆發激烈衝突。他認為最大的因素不是民族主義或是族群仇恨，而是政治決策上的問題。另一為江秉彝（2008）的碩士論文〈南斯拉夫疆界與民族衝突（1991-2006）〉，他認為南斯拉夫的分裂不是由於社會主義時代產生的不公，而是由於社會主義時代太過平等，導致狄托過世後的後狄托時代，當各共和國政府的勢力已與聯邦政府的勢力達到相等，而導致聯邦政府失去其主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導性。在新國家的獨立當中，以宗教與文化建立疆界，以及以語言的差異性與鄰國做區別，對內則是以獨立過程凝聚民族認同意識。最後一本為俄國研究者安德（Ananyan, 2010）以中文寫作的碩士論文〈東正教與巴爾幹半島民族國家的形成：以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利亞為例〉，他認為一般學者大多忽略巴爾幹半島地區的宗教因素，於是他以民族宗教學的角度來分析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的解放運動，並提出現在的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的民族特性、文化，甚至於國土面積，皆與他們的宗教有很大的關係，東正教信仰讓這兩個民族極早就有民族主義的思想。東正教並無教宗概念，不同的民族會有屬於自己不同的組織，教會的發展也與國家的歷史相結合，因此，宗教很早就是當地民族主義的成因之一。也因此，他主張若是要先了解巴爾幹半島為何是歐洲的火藥庫，就要先了解當地的民族神學發展。

當提到台灣研究南斯拉夫的學者，不能不提到著有《東歐諸國史》、《東歐變貌》、《南斯拉夫史：巴爾幹國家的合與分》的洪茂雄，他的著作則是從歷史的角度來認識南斯拉夫和巴爾幹半島，由古知今探訪巴爾幹半島國家的愛恨糾葛。

以上文獻大都是探討南斯拉夫的分裂問題，但是本文主要專注於南斯拉夫狄托時期的語言政策和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分裂與後續語言的標準化，這兩個議題在整個華語學術界並沒有太多的文獻和研究，但不乏歐美以及巴爾幹半島學者的相關論述著作。例如，塞爾維亞語言學家布加爾斯基（Ranko Bugarski）對南斯拉夫的語言規劃、語言政策和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問題有數十本以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德語、英語和法語書寫的論文專書，他在〈Language in Yugoslavia: situation, policy, planning〉一文中概述性地介紹南斯拉夫的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以及其優缺點，最後他提出南斯拉夫的語言政策和規劃反應了其聯邦政府和共和國間的關係，要自治還是要融合？（Bugarski, 1992, p.23）政治轉型從去中央化、朝向多元主義發展最後導致分裂，也因此，進而建議已分裂的民主國家要更加慎重地制定政策，以維持國家的民主狀態。此外，還有克羅埃西亞語言學家杜博拉夫科（Škiljan Dubravko）、布羅柔維奇（Dalibor Brozović）、卡羅吉耶拉（Damir Kalogjera）、卡蒂齊奇（Radoslav Katičić）、柯瓦切奇（August Kovačec）、寇爾蒂奇（Snježana Kordić）、波士尼亞學者托秀維奇（Branko Tošović）和塞爾維亞語言學家拉多萬諾維奇（Milorad Radovanović）、伊維奇（Pavle Ivić）、貝利奇（Aleksandar Belić）等人對這部分的研究領域有諸多貢獻，其中部分語言學家也是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獨立後語言政策的參與者。杜博拉夫科曾撰文〈Standard Languages in Yugoslavia〉，詳盡探討南斯拉夫境內的民族組成以及語言使用狀況。（Dubravko, 1992）布羅柔維奇和柯瓦切奇曾協助克羅埃西亞國立辭書學機構（原文：Leksikografskoga zavoda Miroslava Krleže）編撰克羅埃西亞百科全書（原文：Hrvatska enciklopedija），後者並曾擔任過克羅埃西亞文化及科學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學院的語言部主任，他也與年輕的克羅埃西亞語言學家一同處理克羅埃西亞現有的語言問題。伊維奇則曾協助現代塞爾維亞語的標準化，他是塞爾維亞語言學界的權威，他曾對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提出下述看法，認為克羅埃西亞的語言隔離政策，其主要目的是要證明克羅埃西亞語的與眾不同，但這並不能改變一個基本事實。就語言架構和本質而言，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是一個具有兩種變體的語言，但從社會語言學的觀點來看，塞爾維亞語和克羅埃西亞語是兩個不同（但非常相似的）標準語言。貝利奇被視為是塞爾維亞二十世紀上半夜最重要的語言學家之一，他的研究領域主要是斯拉夫比較語言學、普通語言學、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方言學和句法學，他畢生致力於倡導統一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托秀維奇著有「塞爾維亞語、克羅埃西亞語和波士尼亞語的相關語法：第一部－語音學、音韻學、韻律學（原文：Корреляцинная граматика сербского, хорватского и бощняцкого языков （Часть I Фонетика — Фонология — Просодия））」一書，此書以俄文寫成，書中他詳細介紹塞爾維亞語、克羅埃西亞和波士尼亞語的歷史沿革，並關注語言本身，分析上述三個語言的語音學、音位學、詩體學、重音、母音與子音的發展，這本書為俄語界研究塞爾維亞語、克羅埃西亞語和波士尼亞語的重要參考文獻。

歐美學者則以挪威學者枚吾斯蘭德（Svein Mønnesland)、奧地利語言學家波赫爾（Heinz-Dieter Pohl）、俄國學者托爾斯泰（Н.И. Толстой）和美國語言學家瑪格內爾（Thomas F. Magner）、內羅爾（Kenneth E. Naylor）、布朗恩（Wayles Browne）、弗萊德曼（Victor A. Friedman）和格林伯格（Robert D. Greenberg）等人為南斯拉夫語言研究的專家。挪威學者枚吾斯蘭德發表過多篇與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相關的文章，但他的主要研究重心為現今的波士尼亞語。托爾斯泰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探討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語言的來源和發展。他提出十二世紀以前的塞爾維亞書寫系統都沒有被保存下來，以至於現在無法復原當時的塞爾維亞語書面語。瑪格內爾、內羅爾和布朗恩皆是美國關注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發展的知名學者，並分別著有《Introduction to the Croatian and Serbian Language》（1972）、〈The Eastern variants of Serbocroatian as the lingua communis of Yugoslavia〉（1978）和《A Handbook of Bosnian, Serbian, and Croatian》（2004）等書；佛萊德曼則是研究馬其頓語、阿爾巴尼亞語和其他巴爾幹半島語言的專家。格林伯格為當代研究塞爾維亞語、克羅埃西亞語及南斯拉夫接續國語言政策的重要美國學者，他在 2008 年著有《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the Balkans : Serbo-Croatian and its disintegration.》一書，書中他分析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合併與分裂、塞爾維亞語標準化所遭遇的困難，以及蒙特內哥羅語和塞爾維亞語的分裂、克羅埃西亞人希望藉由語言分離以藉此劃清與塞爾維亞的界線、波士尼亞語的出現以及波士尼亞複雜的三語政策和蒙特內哥羅的語言政策。最後他提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出民族主義者的對話和 1991 年、1995 年的戰爭加速了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和蒙特內哥羅的語言和民族認同，藉由種族清洗的政策，支持民族主義的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和波士尼亞領導者建立了語言、民族認同、宗教和領域皆相對應的新國家。（Greenberg, 2008, p.1）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第六節：章節安排

本研究之章節架構由五個章節構成，除了第一章緒論與第五章結論外，論文骨幹由三個章節構成，按照理論及實例相互配合說明。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限制、並說明研究方法與途徑，進行文獻分析，將研究成果彙整成有系統的文字。

第二章則從語言政策的觀點出發，本章主要探討語言政策的理論及其影響。首先說明語言政策的概念，接著分析標準語的形成及其推行的影響結果，最後探討語言與認同的關係。

第三章為，首先概述南斯拉夫的歷史背景，以期了解南斯拉夫語言分裂下的時空背景。

第四章為探討南斯拉夫語言政策及塞爾維亞語、克羅埃西亞語的標準化進程，並說明南斯拉夫境內四分之三人口的母語－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歷史及其分裂後各自的標準化。

第五章結論為總結上述研究之成果，探討在狄托這樣的強人政治之下，語言政策是如何發展，並後續對當地民族認同的影響。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第二章 理論基礎

第一節：語言政策

對許多科學家、藝術家、作家、政治人物、語言社群領袖與語言權利捍衛者而言，文化差異性與語言多樣性的保存已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在目前世界上約 6,000 種語言中，超過一半面臨著在 21 世紀內消失的危機。許多因素影響著人類語言的存續和使用，其中包括母語使用者人數、地理分歧程度與該語言的使用者在世界上的社會經濟影響力等。國家則可透過語言政策強化或消弭這些因素。[1]

俄國學者日利比諾（Жеребило, Т.В）對語言政策的定義為：「國家、黨派、位階、社會團體為了改變或是保存現有的語言和其他層面的語言（Языковая подсистема）[2]的措施，以接受新的的或是現有的語言規範。語言政策有下面幾個特徵：1.追溯性（以保留現有的語言生活）和透視性（改變語言狀況）；2.民主（考量到國家內所有階層和所有民族的利益）和不民主（只考慮到精英階層和/或是人口統計上或是社會上強勢民族的利益）。語言政策有以下幾種類型：1.語言多元主義、2.民族主義、3.語言虛無主義（языковой нигилизм）[3]、4.國家主義和 5.語言純粹主義」。（Жеребило, 2010）

掌權者往往藉由制定政策、立法或是法院裁定等方式來培養國民對於特定語言的理解與掌握，或是維護個人或是群體使用某種語言的權利。語言政策的實施和國家的歷史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所以語言政策的制定往往各國相異。

語言規劃則是語言政策的體現，語言政策往往反映出國家或是社會團體對語言的態度。語言政策就是國家藉由「語言規劃（Language planning）」語言功能的分配。（施正鋒，2003）「語言規劃」包括政府、社會組織或是學術部門等對語

[1] 資料擷取日期：2019 年 6 月 4 日，檢自 fro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語言政策#cite_note-1

[2] Языковая подсистема 根據俄國學術字典（Словарь и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 на Академике：https://dic.academic.ru/）的解釋為：不同位階的語言和語言的不同樣貌，包含它的社會功能和使用層面。以俄語為例，Языковая подсистем 指稱 1.文學語言、2.區域性方言、3.城市俚語、4.社會黑話、5.專業術語、6.語體。

[3] Языковой нигилизм:據俄國學術字典（Словарь и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 на Академике）的解釋為「對一種或是另一種民族語言的消極態度；輕視它；嘗試平衡民族的語言、種族和文化特徵。

DOI:10.6814/NCCU201900758

言生活（Language Situation）所做的干預、管理及相關計畫，其中包含語言政策的制定及其實施等內容。而前耶路撒冷大學的教授庫柏（Cooper）也提到，「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有時是同義詞，然而語言政策更指向語言規劃所追求的目標。

「語言規劃」一詞最早是由美國語言學家浩真（Haugen）介紹給大眾，他並將之定義為「在一個不同種族的說話社群中，為了給說話者和作家做指導，而準備的規範化正字法、文法和字典的活動。」（Cooper, 1989）

美國語言學家如賓（Rubin）和耶爾努德（Jernudd）將語言規劃視作「細緻的」語言改變，在語言符碼、口說或是兩者皆是的系統中由組織為了某些目的或是授權給機構以完成某些目的地改變。語言規劃從識別一個問題開始，特別是這個問題是根據社會的要求而做的計畫行動中有關語言資源的領域。語言規劃聚焦在解決問題和嘗試找到最佳（或是最優化、更有效、更有價值地）選擇以解決問題。（Rubin & Jernudd, 1971）而問題可能會是什麼？例如語言的選擇，如政治特定部門上需要用哪種變體，還是哪種語言；傳播知識（教育）、大眾溝通或是立法該用哪種語言。也可定義為語言符碼針對特定偏好規範的修改，如字彙、文法、發音或是對話的現代化與標準化。另一方面語言問題也可定義為社會的需要，特別是針對廣泛的社會經濟目標。這些目標可以是工業上取得資訊的現有途徑的需求或是特定團體要傳播家庭計畫或是農業改善的訊息。此外，他也提到兩位語言學家耶爾努德和古舖塔（1971）則建議要將語言問題定義為不只關注語言現象的語言問題，而是更要注意獨立於語言之外的驅動社會政治的原因和根本原理。也就是，語言規劃起始於社會驅動的語言符碼或是口說的改變，如果我們沒有注意到這點的話，那麼就無法做好語言規劃，而是註定會流於挫折和資金浪費的狀況。最後也提到為何人們經常會認為語言政策是失敗的，因為政策的決定不等於規劃，若是實施政策的人缺乏執行政策時的清楚指標和對選擇的方法認知不足時，那麼就無法達到語言規劃的目標。語言政策的制定人一定要瞭解到一件事，就是這個計畫是要跟隨著社會政治的脈動，不然就僅僅只是個政策。（Rubin, 1989；施正鋒、張學謙，2003）

台灣政治學家施正鋒則認為語言規劃是確認和「語言有關的社會問題」（Fasold, 1984, p.250），而學者甘迺迪（Kennedy, 1983, p.1）則將之定義為「以有意的改變來達成某些特殊目的問題解決活動；這些目的可能是社會的、政治的或是教育的，也有可能是這三者的組合。」政府常被認為是負責語言規劃的主要機關，例如偉因斯坦（Weinstein, 1980）就指出，語言規劃是基於溝通問題而在政府授權下所進行的長期不斷地、有意識地改變語言在社會中的功用所做的努力，庫柏（1979）更直接把語言規劃總結為「在國家層次尚未解決語言問題所做的有組織的努力」，並提出「語言規劃就是指稱有意識地努力影響他人在獲取其語言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符碼的結構或功能分配的行為」。庫柏認為他的語言規劃定義不侷限規劃者為權威機構、也不侷限目標團體和規劃的理想形式和種類。（Cooper, 1989）語言規劃和政治也有很深的關聯性、如賓和耶爾努德（1971）則將語言規劃定義為「關於語言的官方政策」。（施正鋒、張學謙，2003）費須曼對語言規劃的定義為「有組織地尋求語言問題的答案，特別是在國家層級上」。（Paulston, 1984, p.55）

語言規劃又可以分成三種類型：1968 年德國語言學家克勞斯（Heinz Kloss）提出地位規劃（status planning）和本體規劃（corpus planning），1989 年 Cooper 提出第三種類型：習得規劃（acquisition planning）。地位規劃確定語言（包括文字）及其變體的社會地位，內容較多涉及語言政策，例如國語的選擇、民族共和國的確定等等。（李宇明，2012）美國語言學家史都華（William Stewart）（1968）列舉出十一種地位規劃的功能：1.官方的功能；2.省（province）的功能；3.廣泛地溝通功能；4.國際化的功能；5.有首府的、首要的（capital）功能；6.群體的功能；7.教育的功能；8.學校科目的功能；9.文藝的功能；10.宗教的功能；11.其他如大眾媒介和工作方面。（施正鋒、張學謙，2003）針對這十一項功能，庫柏在其專著「語言規劃與社會的改變（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中詳加敘述並提出自己的看法。

1.官方的功能：在國家範圍內作為一切代表政治和文化意圖的合法語言發揮功能。一般來說，語言的官方功能是由憲法訂定的。史都華認為被賦予法律地位的語言才擁有官方的功能，然而庫柏認為，被政府用作與日常生活連結的媒介語言或是被用作有象徵意義的語言，都可以稱作是官方的功能。他認為在官方的功能底下還可以在分出三種型態，分別是「法定的」、「工作的」和「象徵的」官方語言。

2.省級（province）功能：省級或是地方級的官方語言功能。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官方功能，省級功能侷限在地理上更小的行政區域，而不是全國。所有官方的功能都可以應用在省的功能上。例如加拿大魁北克在 1974 年宣布法語為唯一的官方語言，還有如印度的各邦皆有自己的官方語言。

3.廣泛的溝通功能：語言系統中主要昨為國內跨越語言邊界的溝通功能（除了官方和省級功能之外）。史都華認為這個功能和接下來提到的功能都應該排除在官方和省級功能之外，然而庫柏認為官方和省級功能也是規劃的一部份，因此，他認為應該要一併討論。他假設這個功能可以垂直地將制定規則者和接受規則者、中心與邊緣融合，那麼這個功能在地位規劃中就是存在的。但通常這樣的語言就是工作的官方語言，不論它是否有法定地位。如法國人在他們的多語的西非領土上使用曼丁哥語（Mandingo）。

4.國際化的功能：在語言系統（除了官方和省級功能之外）中作為與國際視野交流的媒介功能，例如外交關係、國外貿易或是觀光等。

DOI:10.6814/NCCU201900758

5.首府的、首要的（capital）功能：在語言系統（除了官方和省級功能之外）中作為國家首都及其周邊交流溝通的媒介功能。這個功能對政治權利、社會威望和經濟活動都在首都的國家特別重要，因為語言會將由中心擴散到四處去。

6.群體的功能：在語言系統中作為單一文化、族群，如一個部落或是外來移民社群的溝通媒介功能。這個功能會將語言行為和族群認知連結起來，如連結四散各地猶太人的希伯來語。

7.教育的功能：語言作為國家的或地區的初等或中學教育的媒介。他認為這是地位規劃中最常見的決定，也是教育者和學生最能感受到強烈政治壓力的語言規劃。在這項功能中，教育因素的影響中有高有低，然而可以確信的是，一定有政治因素的參與。例如，當前的美國雙語教學運動，目的除了要改善貧窮問題，更是要獲得少數族群的選票。而高舉「雙語教育無效」的人，他們的理由不外乎是害怕改變，特別是人口中少數民族中增加的比例，對「美國不再屬於我們了」的意識還有對少數民族帶來的，不論是真實的或是想像出來的經濟競爭的憎恨。總而言之，在對幼齡學童實現最大化的教育重要性時，選擇教授哪種語言基本上是根據政治考量，因為從國家的觀點來看，教育是初級的社會控制；然後從個人家庭的觀點來看，教育是作為社會驅動性的一種方法，因此毫不意外地，選擇哪種語言會成為重要的政治議題。

8.學校科目的功能：語言（除了官方和省級功能之外）作為在中學教育或是高等教育中普遍被教授的科目。庫柏認為史都華將官方或省級功能排除在學校科目的功能外是合理的，因為架設一個學生的母語既非官方語言也非省級語言，那麼他就會在學校學到官方語言或是省級語言，特別是這個官方或是省級語言是被廣泛使用的。而學校若是教授官方或是省級語言以外的語言，那麼庫柏認為有以下幾個目的，例如讓信教者能用古典語言讀懂宗教經典、讓學生擁有第二外語的技能、讓學生能有用第二語言學習的機會、連結學生與民族或是國家遺產以及從群眾中區分出菁英。

9.文藝的功能：語言主要使用在文學或是學術用途上。鼓勵用方言寫作經常作為國家運動的特色，特別是相信這會提升群眾或者至少知識份子的國家意識。特別是國家主義份子相信方言文學的發展會提升宣稱國家主權的合法性。

10.宗教的功能：語言主要作為連接儀式和特定宗教的功能。此外，庫柏再增加三個次功能：(1)激勵皈依和宗教指示、(2)閱讀宗教經典的能力和(3)大眾祈禱者。例如，伊斯蘭教和猶太教限制只能用一種神聖的語言來朗誦宗教經典。還有宗教改革促使人們直接閱讀聖經，而非藉由牧師的闡述，而這只能當聖經改用方言寫作時才能實現。

當傳教者試圖要宣揚自己的宗教時，他們必須要決定要使用哪個語言來傳教。選潛在信教者的母語是最有優勢的，因為既能直接被了解，也讓傳教的內容顯得

DOI:10.6814/NCCU201900758

不那麼「外來」。例如，十四世紀時，俄國東正教主教聖史蒂芬的傳教即為成功的一例。當時聖史蒂芬奉命要向科米人傳教，然而他發現由於科米人對於俄羅斯人的厭惡，也讓科米人拒絕使用俄語，因此，聖史蒂芬使用科米語傳教、佈道，並將儀式的語言改成科米語，最後大部分科米人都接受受洗，實為一場勝利。

史都華對地位規劃的功能還有兩個：大眾媒體和工作。當政府掌握大眾媒體時，也就掌握了媒體使用的語言，以以色列為例，以色列政府規定每天有多少時間廣播和電視要用希伯來語、阿拉伯語和其他外國語言播出。（Cooper, 1989）至於工作功能則可舉魁北克的法語政策作為例子。1950 年代法語的中產階級的出現，伴隨著魁北克人黨的形成，他們希望建立一個高度自治的語言省份。

在推動法語政策上面，魁北克在 1961 年成立「法語辦事處」（Offic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除了提倡法語之外，最主要的目的在於「純化」法語的用法。由於長期與英語族群的相處，很多魁北克法語受到英語的影響，因此「法語辦事處」主要的工作是建立標準的法語以對抗英語。

魁北克政府詳細制定語言法規，詳細規範各種標誌及大眾傳播所出現的英語，還有英語學校的招生人數，將法語的使用標準化；這些規範英語的政策，則是等到 1970 年代後期，才在法國推行。

魁人黨於 1976 年成為魁北克的執政黨，伴隨著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語言也成為政治認同的重要部分。由於魁北克的第一大城蒙特婁在當時也是加拿大的最大城市，許多跨國公司和重要的金融中心都在這裡，蒙特婁因此聚集了很多說英語的企業，而當時進入魁北克的移民大部分也都以英語人士為主。

魁人黨怕英語稀釋魁北克的法語人口，在 1977 年通過了《法語憲章》（la Chart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也就是《101 號法案》（Bill 101）；自此法語成為魁北克的正式官方語言，在公共領域都必須使用法語，人數超過一定數量的公司也都必須採用法語。（胡川安，2015）

本體規劃是在地位規劃的前提下進行的，目標是促進國語、民族共同語等這些有社會地位的語言不斷規範、完善，使其能夠很好發揮地位規劃賦予的語言職能。本體規劃的內容，包括文字的創制，以及各種語言技術的發展等等。今天常說的語言文字的規範化、標準化、訊息化，基本內容都屬於語言的本體規劃。（李宇明，2012）而台灣學者施正鋒也提到本體規劃是關於語言本身的改變，如辭典編輯，語音、語詞和語法規範，借詞、術語的制定以及文字系統的發展和建立等。美國語言學家佛估森（Ferguson, 1968）則將本體規劃稱為「語言發展」（language development），並將之分為三大類：文字化（graphization）、標準化（standardization）和現代化（modernization）。地位規劃和本體規劃雖然在概念上可以區分開來，在實踐上兩者則互相依賴。地位規劃所確定的語言也是語言規劃的對象，同時，語言規劃的進展也可能影響地位規劃所做出的決定。例如，本土語言成為必修科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目，這屬於地位規劃；而要將本土語言文字化、標準化和現代化，這就屬於本體規劃。（施正鋒、張學謙，2003，頁 29）

而庫柏提出的習得規劃（acquisition planning）則是指經由語言學習增加語言使用人數。學校的語言教育規劃是習得規劃的一種。學校的語言教育課程是語言規劃的重點，因為學校的教育制度最能影響一地區的社會語言行為（Cooper, 1989）。習得規劃可以分成兩個重點：1.明顯的語言規劃目標和 2.用來實現目標的方法。明顯的語言規劃目標還可以分成以下三點:（1）學習第二語言或是外語，例如：台灣人學習國語或是蒙特婁講英語的人學習法語、（2）重新學習曾是該地區人民母語的語言，例如，紐西蘭毛利語的復甦運動和復甦希伯來語。（3）語言維持，以防止語言在一地消失的狀況，如愛爾蘭語在愛爾蘭地區式微的情形。（Cooper, 1989）

庫柏認為地位規劃、本體規劃和語言習得規劃這三者有密切的關聯，考慮到語言規劃的三種類型，語言規劃本身可以說是「為了影響別人的語言學習、及語言本身結構和語言的社會功能而進行的一項活動」。（Cooper, 1989, p. 5）（施正鋒、張學謙，2003）

綜合以上所說，語言規劃和其目標可以歸類成下表，這是美國語言學家洪伯格（Hornberger）所整理的表格：

表 1 語言規劃與其目標

方法	政策規劃 （聚焦在形式）	培養規劃 （聚焦在語言功能）
語言規劃的類型	目標	目標
地位規劃	官方化 國家化 標準化 地位禁止	復甦 擴散 維持 語際 溝通
本體規劃	標準化 語料庫 輔助語碼 文字化 語言純化 風格簡單化 語言形式	現代化 詞彙的 風格的 革新 術語統一化 語言的功能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習得規劃	教育/學校 文學 轉移 大眾傳播 外語/工作 社會中語言形式的角色	再學習化 宗教的 維持 第二語言/ 讀寫能力

表格引用自 Seran Doğançay Aktuna. (1995). *Language planning and education: An intertwined matrix.* Boğaziçi Üniversitesi, p. 83

語言規劃不論作為政策規劃或是培養規劃，都是以目標為導向的一種規劃形式。在地位規劃的目標上，主要是為了達成「官方化」、「國家化」、「標準化」和禁止一個語言的使用的「地位禁止」。而地位規劃的語言功能則是為了要加強或是削弱語言的溝通、擴散、維持和復甦。至於在本體規劃上，政府主導的語言規劃形式有語言標準化、語料庫和輔助語碼的建立以及文字化、語言純化等。功能就是為了要革新語言、使術語統一化、語言功能化。政府在習得規劃上的主導則是有學校和教育系統的支持、文學、大眾傳播和工作以及外語的使用，目的是為了要讓語言可以再學習化、宗教化和養成國民的讀寫能力以及培養第二外語。

語言規劃通常是為了達成某種社會、政治或經濟的目的，而不是為了語言本身。如賓（Rubin, 1984, pp.8-9）提出三種語言規劃的目的（aims）：語言的、半語言的和超語言的目的。語言的目的指的是規劃的目標為促進溝通的效能；半語言目的指的是規劃目的除了語言外還有社會或政治的目的；超語言的目的則是指沒有實質的語言問題，但是「藉著注意語言問題」來協助達成非語言的目的」。（施正鋒、張學謙，2003）以半語言的目的為例，俄羅斯要求境內少數民族改用西里爾字母就是其一。這樣看起來好像是少數民族（ethnic）不用再學兩套字母系統，然後這僅僅只是政治意圖，因為俄文是用西里爾字母拼寫的，而現在少數民族也改用西里爾字母，那將會促進他們閱讀和學習俄文。

語言規劃方針（orientation）是語言規劃的重要組成指導原則，可以決定規劃的方向和目標。如茲（Ruiz, 1984, p.16）認為語言規劃方針是對語言及其在社會上所扮演的一種傾向複合體。學者一般將規劃方針分為三類（Ruiz, 1984；黃宣範，1995）：1.語言是社會問題根源（language-as-problem）；2.語言是一項公民權利（language-as-right）；3.語言是一項社會資源（language-as-resource）。第一種方針將語言視為問題，政策上常體現為消滅弱勢語言的同化政策；第二和第三種方針針對弱勢語言則保持積極肯定的態度，因此，實施雙語教育、雙語政策，特別扶持弱勢語言。（施正鋒、張學謙，2003）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科巴如比亞斯（Cobarrubias, 1983, p.63）區別四種語言政策的動機：語言同化（linguistic assimilation）、語言多元論（linguistic pluralism）、本土化（vernacularization）、和國際化（internationalism）。語言同化的政策要求所有的人民不論其族群背景為何，都必須說主流語言。這個政策後果通常是弱勢族群的語言死亡。相反的，語言多元論承認各種語言團體的事實，給予弱勢語言官方地位，並且賦予各族群維繫其母語的權利，例如比利時、瑞士、新加坡和芬蘭等國。本土化指的是恢復或發展本土語言，並將之訂為官方語言。如秘魯推展奇楚瓦語，菲律賓對他加祿語的推廣。國際化的動機則選擇廣泛通用的語言（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而非本土語言，作為官方語言，同時也作為教育語言，例如新加坡、印度和新幾內亞（Hoffman, 1991, pp.215-216）。科巴如比亞斯（Cobarrubias, 1983, p.71）歸納官方對弱勢語言的態度為：1.嘗試語言殘殺；2.讓語言（自然）死亡；3.不加聞問的共存；4.對特定的語言功能提供部分的支持；5.（將弱勢語言）訂為官方語言。這幾種深層的官方語言意識形態將影響語言政策的制定，同時也會決定弱勢語言的未來命運。（施正鋒、張學謙，2003）

第二節：標準語與語言標準化

「語言標準化」（standardization），即「在一語區內製訂出一套『正確用法』，將之編為正典並加以推行（Stewart, 1968；Fishman、黃希敏譯，1991）

語言標準化有以下幾個步驟

1.挑選（selection）：挑出一個語言或其變體。從數個競爭的變體中尋找一個或是從主要的方言中合成一個。（Whiteley, 1957）

2.系統化（codification）：將語言結構或是其特徵標準化，這個改造語言的進程也可稱為「本體規劃」

3.精緻化（elaboration）：擴展語言功能以使用於新領域。這涉及開展必要的語言資源來處理新的概念及脈絡。

4.確保其被接受（securing its acceptance）：這個新語言的位階很重要，還有要考慮到人民對這個被發展出來的語言的態度。要增強這個語言的威望，例如，鼓勵人民使用這種語言。

挑選並發展一個標準語常常是一種全然的政治性的決定，儘管語言學家可能會指出選擇這個語言或是另一個語言會衍生出的問題。要使人民接受新的語言會需要藉由政治人物或是社會上有威望的團體支持，系統化和精緻化語言使其有更多功能。（Holmes, 1999）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經過規範化的語言被稱為標準語，接著透過行政命令、教育、傳播媒體等把標準語推行到全國各地；評議、監督單位則負責督導時所欲的阻力獲評定期成效。再來要擴大標準語的功能層面，使之能適用於各種不同的情境，並隨時將詞彙「現代化」或學術化（intellectualize），使之能生存於現代知識爆炸的高科技社會。（黃宣範，1993，頁 116）

標準化這個術語被某些特定的學者固定使用（Haugen, 1972），在他們的解釋裡，它的主要特徵為對有可選擇的變體的語言的不容忍性。而在其他學者的觀點中，語言標準化的數個階段是包含在語言的發展歷史中，他們認為標準語擁有有最小的變體形式和最大功能變體。（Leith, 1983, p.32）這樣的定義是很合理的，但很明顯地，包含在語言的發展歷史中的標準化階段被視為是在特定時間內的社會觀點所影響的一致性需求的結果。一個變體先是被「挑選」成為標準語的基礎（其他與其競爭的變體無疑地會被社會中的其他群體選擇，然後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只會有一個變體可能變成標準語）；接著這個變體被有影響力的人接受，接著在地理上和藉由數種方式（如官方文件、教育系統、寫作系統、直接或間接地對非標準語的使用者的歧視）在社會上被擴散。某些學者（Giles et al, 1974, 1975; Leith, 1983）認為標準語是一種強制的、被疊放的變體，一旦它被建立好了而且打敗其他競爭的變體，那再來就需要被維持。維持需要藉由幾種方式，作為功能的精緻化（elaboration of function），標準語被視為是比其他單純被使用的變體更具有社會活動的價值。它同時也需要威望（prestige），藉由最成功的人的寫作和演講使其被注意。它也因為識字率而被維持，如寫作系統協助建立「正確性」。接著還需要被認知，寫作系統就作為被認知的其中一種規範，然後再經過規範化後，語言會密集地被認知。因為說話者開始有管道去取得字典、文法書等被視為是權威的書籍。說話者們會比較容易去相信這些書中的「語言」是神聖的（儘管裡面可能有很多錯誤或是疏漏），而非百萬人每日在語言學上或溝通性上的競爭所使用的語言。（Milroy & Milroy, 1992, pp.26-27）

DOI:10.6814/NCCU201900758

針對前南斯拉夫的情形，塞爾維亞語言學家拉多萬諾維奇提出他認為的語言規劃和標準語的形成（如下圖），首先要先挑選一個語言、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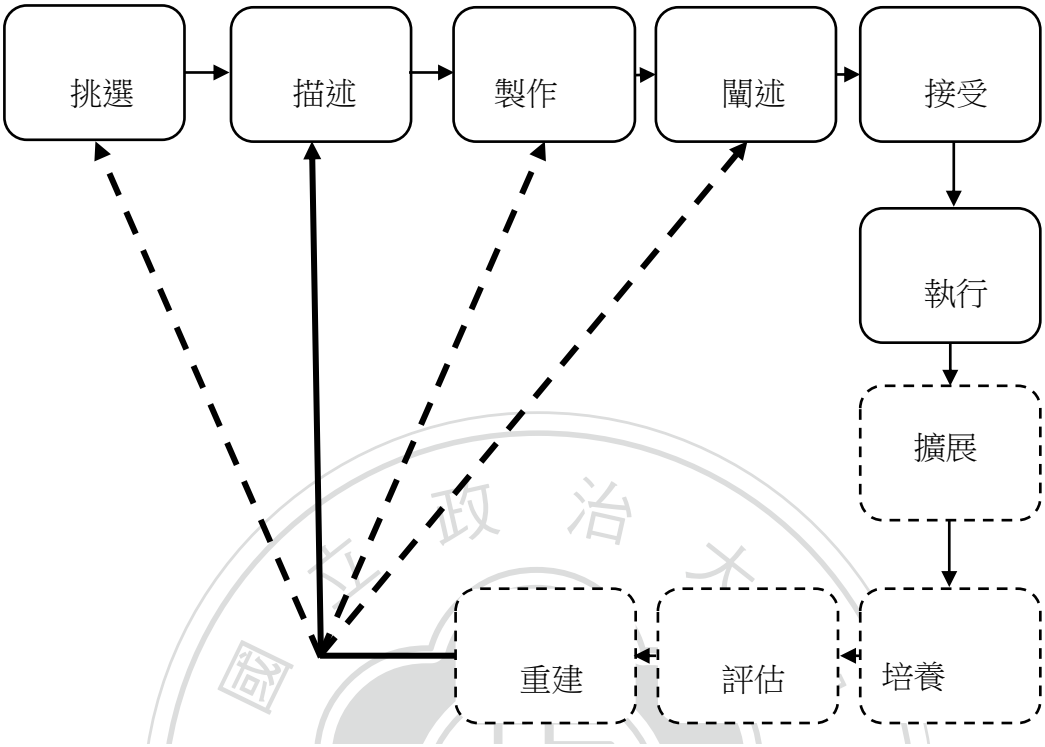

圖 1 語言規劃與標準語的形成

（圖形引用自 Radovanović , Milorad. (1991) Standard Serbo-Croatian and the theory of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 in Yugoslavia*. p.95）

或是社會方言，並使其被標準化。接著這個語言要能被描述（有概述性的文法）。接著要「製作」它（規範文化、編撰字典），然後這個語言要能符合文明社會文化發展的需求，並被官方和大眾接受。接著要讓語言在社會能使用，並擁有主導的地位，使其能自然地應用在功能和社會上的各層面。再來藉由學校教育或是大眾傳播來培養語言，且要不時地評估被規範化的語言是否需要修改，在所有文法的層面上，從語言學、形態學到字彙、語法。最後一個階段就是重建標準語，關閉這個循環，使語言規劃能一直持續被發展。而要將這個理論套用到南斯拉夫上，就要先假定「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標準化會朝向一致性，且語言規劃的過程能被持續。」。他認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已經完成了前面六個階段（挑選、描述、製作、闡述、接受和執行），而且前面這些階段是經過兩個世紀的成果，也就是地位規劃和本體規劃。剩下四個階段需要去完成，目標為讓標準語傳到所有講方言的區域還有社會各階層，這要藉由教育和媒體的力量，最後要評估現有的標準語是否有改變的需求。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剩下的習得規劃的四個步驟（擴展、培養、評估和重建）將會使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添加新的功能和效用，而且會啟動新的一個語言規劃循環。新的一個循環可以從描述和製作開始，但在必要的時刻，也可從挑選這個步驟開始。描述、製作和闡述標準語言並使其具有溝通性、文明性和其他符合現代社會需求的語言，並成為語言規劃的實踐。而這過程會受到許多外部因素的影響（民族、國家、政府、政治和意識形態等），也因此會出現許多不同的結果，不同的結果可能會產生出標準語的變體，而變體可以被官方推行在不同的政治或是語言區域。（Radovanović, 1992）

但嚴格上來說，標準化並不允許變化（variability）。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標準語」的概念，標準化就是語言持續不斷的遇到的歷史過程。標準化一開始是由於不同的社會、政治和商業需求而出現，之後進而在語言被呈現的各種方式中被改變，而在語言的各種呈現形式中，書寫系統也是相對容易被標準化，然後基本上不可能將口語標準化，唯一能被完全標準化的口語是「死掉」的語言。也因此，可以說標準化是一種「意識形態」，而標準語則可以說是一種內心的想法而非事實。

如果我們要在語言以外的事情進行標準化，那麼這個觀點適用於金錢、重量或是度量衡這類用來交換訊息的媒介。如貨幣系統是被嚴格標準化的，以確保系統中指定的值不會有變化，而且在此標準化的目的就是要確保可信度。語言也是一種交換的媒介，儘管比起貨幣系統，它複雜得多，但語言標準化的目的是相同的。標準化旨在確保系統中指定的固定值。在語言中，就是通過選擇被視為是正確的固定慣例和建立正確的字義以及句子架構。以英文為例，“he does.”是被接受的，而“*he do.”是不對的。標準化的觀點和語言功能效率的主旨是被綁在一起的。最終，希望每個人都應該以最小的誤解和最大的效率和以相同的方式使用和理解語言。

上述的這個說法是能被理解的，因為或許會爭論語言的形式若是沒有經過一些權威的認證或是立法，那之後語言會變成各種方言，最終會分裂成彼此無法溝通。以拉丁文為例，在羅馬帝國消失之後，缺乏中央權威，而最後導致拉丁文四分五裂成法文、義大利文、西班亞語、葡萄亞語、羅馬尼亞語和其他語言。語言標準化的意識形態需要的不只是大不列顛的英文要盡可能地一致，還有其他使用英文的地方。這種意識形態不只影響到北美洲、澳洲，甚至是新加坡。（Milroy & Milroy, 1992）

台灣語言學家黃宣範也提到其實不論是日本政府推行的日語還是國民黨政府推行的國語，這樣的標準語概念其實是一種形上的東西，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超越現實的信仰、理念。這樣一套超越現實的信念建立之後就形成一套假象，常人為之所努役（因此必須要常去追問某個字的「標準」讀音究竟是什麼），而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研究者也無法經由標準語了解語言社會的真實。當然，在另一方面，標準語的意識形態卻得以使一般人相信我們語言社會程序是合理的，理想的，而偏離這個意識形態就是不合理、不理想的。掌權者經常設法將標準語弄得難以專精，以便無限期地掌握語言優勢。（黃宣範，1993）

而英國語言學家蕾絲莉和詹姆斯・米爾羅伊也認為標準語是抽象的，或是更確切地說，所有語言都是抽象的、是一種意識型態。術語「標準」和「非標準」被專家使用在表面上價值中立的意義上，即使這些術語和他們每天的用途並不相當。但是許多規範性的術語，如“sub-standard”經常在已經吸收「標準化的意識形態」的母語人士間出現。（Milroy & Milroy, 1999）他們認為只有一種語言可以符合「標準」，然後其他相關的非標準變體就是不完美的相似物。還有另一點從社會語言學的觀點來看，標準化是一種文化壓迫，主要來自上層階級，而且很難從藉由接受標準化意識形態的觀點來看大部分說話者的社會優勢。這種意識形態的概念也解釋了風格變體，這是由社會情況所決定的，很少有說話者享受這種語言安全性，他們可以去忽略當他們需要與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溝通時，這是風格變體和情況變體的來源。（Armstrong & MacKenzie, 2012）

對於標準語的傳播，人們一般持有矛盾的看法。一旦國家的政治合法性來源於人民，標準語就成了一種必要條件，原因是它為政治參與提供了一個論壇、一種媒介。從另一角度來看，標準語又成了一種霸權中心的強加手段，並隨著標準語的推形而扼殺社會多樣性。由於其他語言連同其文化遭到扼殺，那些特殊社區裡就會產生個體損失，因為他們再也沒有機會或得自己社團內由語言所傳遞的文化遺產。這些社區語言表達的意義的獨特方式所呈現的洞察力如果伴隨語言一同喪失的話，對整個人類而言都是一種損失。 (蘇・賴特著、陳新仁譯，2012，頁66)

相對於語言學的概念，標準語更是一種政治下的產物，從選定語言到推行，處處皆需要政治的介入。我說的是中文、他說的也是中文，要如何判斷我們說的是否是「標準」的中文？甚至可以討論，「標準」的中文意義何在？它代表的是一種規範、一種意識型態。而這種主流的意識形態，在當前情況下，都會被國家採用，只要人民認可民族主義，那一般來說國家就會採取國家的標準語言，因為國家的標準語言除了它在建構民族交際共同體中的實際作用外，還是民族共同體和民族榮譽的標誌，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 (陳新仁譯、蘇・賴特著，2012，頁47)

第三節：民族、族群認同與語言

什麼是民族？這是一個困難的題目，沒有一個答案可以滿足任何人。民族

DOI:10.6814/NCCU201900758

不像國家，它不是一個「現實」。民族被美國學者安德森（Anderson, 1983）視為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民族作為一個實體，其存在完全繫於它的成員在心理上與感情上對集體的「認同」，即使那個集體的大部分成員可能一輩子也碰不到面。

民族通常結合在一個共同語言之下，語言通常可以用來區分民族。但是被視為共同與獨特的語言，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個與民族主義脫不了關係（而且往往引起爭議）的決定。有些地方方言在詞彙、句法和習慣用語上的差異，時常大到彼此幾乎不能理解的地步，但是這些方言的身份卻遭到否認或積極鎮壓，不被承認為獨立的語言，只因為害怕他們破壞民族團結。另一方面，有些方言只有相對微小的地方差異，卻被拿來大作文章，過分誇大其獨特性，以便把方言提升到獨立語言的地位，使之成為一個獨立民族的特徵（舉例來說，挪威語和瑞典語的差異，荷蘭語和佛萊明語的差異，烏克蘭語和俄語的差異）。除此之外，一群人即使承認他們講同樣的語言，仍可能認為自己屬於不同的民族（例如，同樣說英語的威爾斯人和蘇格蘭人；同樣說德語的奧地利人、瑞士人和德國人）。（Zygmunt Bauman 著、朱道凱譯，2002，頁 194-196）

什麼是族群？族群根據臺灣教育部國語辭典[4]的解釋是在特定時間內由相同物種占據某一空間，所組成的個體群。同一族群的人通常享有共同的語言、生活習慣和風俗。族群也可以是只要有共同的地域、社會或是經濟關係的一群人，在歷史發展中，共同追求一塊地域和經濟生活，即使他們原本並沒有共同的地域和經濟生活關係。族群也不是只要有共同的血緣、語言、文化、宗教或祖先的一群人認為自己是構成獨特社會群體的人就成立的，通常還需要經過社會經驗或是歷史經驗，才會發展出來的。族群是由本身組成份子認定的範疇，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邊界」，而非語言、文化、血統等的「內涵」。一個族群的邊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的邊界，而主要是「社會邊界」。在生態性的資源競爭中，一群人強調特定的文化特徵，來限定我群的「邊界」以排除他人。

民族和族群最大的區別就是民族是追求政治疆界，或是已被政治疆界化的族群，也就是被制度化的族群共同體。族群則不一定要求政治疆界化。

討論族群或民族的形成，一般可以其構成因素分為客觀和主觀因素。客觀因素又可歸納為 1.觀察得到的有形特色，比如血緣、語言、宗教或生活習慣；2.無形的基礎則為共同的歷史或經驗。在眾多客觀因素中，又以無形或是想像出來的共同歷史經驗最為重要，因為它可以超越不同的有形特色而加以整合。而主觀意識才是決定族群或民族的認同關鍵。（施正鋒、張學謙，頁 2003）

[4] 擷取日期：2019 年 6 月 4 日，檢自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UV2Eg&o=e0&sec=sec1&op=v&view=0-1

DOI:10.6814/NCCU201900758

「認同」的現象被視為是一種關聯和情緒認知的現象，它作為個體在族群關係的脈絡下，一個有意義的象徵，且能夠產生強而有力的情緒活動，這最終會變成高度的行為和動機行動。這種「認同」將會使人們識別出文化、象徵和行為模式，這種行為模式會取得優勢，促使他願意去保存以及發展。如果他相信這種行為模式會因為政治或是人口變遷的因素而逐漸削弱，那他就會採取行動以避免這些變化發生，好以表示他的高度認同。藉由這種方式，他可以確保維持集體認同的基礎。相反，如果人們生活的環境不僅與他們的認同高度對立，而且顯然也很難改變，那麼這些人可能不得不對他們的集體認同進行改變 ，這可能會對他們的行為產生相對應的影響。（Bastardas-Boada, 2012, p.21）

認同（identity）一詞指涉了認知與身分的概念，「認同」一詞，同時包含了對於一件事的認知、概念，以及我群意識、同族情感。研究民族主義的江宜樺以為「認同」（identity）指涉三種不同的意義。首先，認同有「同一、等同」（oneness, sameness）的意義；第二，認同有「確認、歸屬」（identification, belongingness）的意義；第三，認同有「贊同、同意」（approval, agreement）的意義。美國學者安德森則從民族運動的角度切入研究民族認同，他認為民族的建構是想像的，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者甚至聽說過他們，然而，他們的互相連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個成員的心中，也因此，他提出「想像的共同體」一詞，來解釋民族的出現。（葉俊呈，2012）

身份認同（identities）是個人與社會用來表達社會歸屬之主觀認定，與客觀認識之間的協調點。雖然說個人表達個體的心理歸屬，可能是個人選擇的結果，然而社會歸屬的範疇卻是群體性的，是社會生活的產物，因此個體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必然有各種外在群體生活的影響，因此這裡所談的認同，是指集體性的認同而言。而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ies）是以族群範疇做為認同對象的歷程，族群認同其實可以有比較寬闊的理解方式，有些族群範疇是在歷史的長河中發展出來，如漢人或是潮州人等，有些則在比較短的時間冒升，如香港人或是新加坡人。除了群體範疇是社會界定之外，而認同意識的消長，也受到不同的社會歷程的影響，也會隨時空的改變而調整。（楊聰榮，2002）

身份認同並不總是等於分類個人的簡單方式。如果我們與他者有接觸，那才會產生我是「甲組」人，而他者屬於「乙組」人，但這個反應不一定伴隨著情緒波動，或者沒有理由會感覺到「我」與「他」的分裂與差異處。同樣地，可能沒有任何方面可以讓我們有感覺或是有動機來使我們雙方產生對立。身份認同的建立（而且是確實在建構當中的）發生在一個特定的環境內，使雙方有意識地發展出，不論是真實的或是假想的，衝突、對立或是他者的強烈差異。而這種自我意識可能會轉化為對另一個群體的積極地或是消極地的自我形象，並且可能引起其中一方採取適應性的社交活動或是強烈的抗議。在前一個情況下，消極自我形象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的出現，會讓另一群體的行為舉止合乎社交禮儀；然而積極的自我形象可能會引起該組織的成員抵制並與他者發生衝突，但卻也有可能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取得平衡。

我們會有意識地將「語言」和「身份認同」連結在一起的情況，主要是與後者衝突形式相對應的狀況。在這種形況下，其中一個群體出現一個明確的身份認同的過程，這構成了一種這個群體和他者群體互動的定義，而語言和其他的差異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它們表示一種象徵性價值。在特定情況下，一種語言和另一種語言正好相對於一個群體和另一個群體，語言在社會層面的使用會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個語言的使用，包含「用哪種語言」、「如何用那種語言」都會影響另一個群體的不同感受，可能是親近、厭惡、友好或是有距離等。

毫無疑問地，人類語言多樣性更容易促成上述的狀況，用語言來識別「我者」與「他者」，特別是在涉及少數群體時更是如此，不論是政治上、人口上地少數群體。一個群體在一個特定的領域可能會感受到另一群體的威脅或是不公平對待，而這情況也會發生在多數人的群體中，如移民的出現，而這會導致雙方群體在彼此的身份認同和語言增進自我意識。（Bastardas-Boada, 2012）

認同主要滿足我們對一個群體的「歸屬感」、「得到他人的接納」等需求。滿足這個需求後，進而培養我們對國家、社會的贊同，而之後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民族、族群意識。

而語言是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的重要基礎之一。語言是簡便的族群辨識象徵，族群或民族的成員往往藉由自己的語言來象徵其族群的排他性，並滿足心理上的集體需求。但是語言是否為族群性（ethnicity）的本質，是否為族群意識（ethnic consciousness），並不是畫等號的。（施正鋒、張學謙，2003）

語言和認同有高度的密切關係，但「語言」和「認同」並不是一定有關聯的，在缺乏強烈的認同感之下，語言也有可能存在，並且存在與語言無關的認同。如果一群人與其他不同群體的人並無接觸，那麼他們的自我認同便不是建築在與其他群體的差異性上，而是建立在周遭環境的因素上，因此，這些人並不知道是如何說話的，因為這是一種自發和習慣性的現象，就如同呼吸一樣，並不需要意識的存在。在接觸的情況下，一個群體識別與其他群體的差異，便不是或是可能使用同一種語言，而是依據宗教信仰、膚色或是政治結構，在此時，「語言」和「認同」便不是一定相關連的現象。（Bastardas-Boada，2003）

比如，烏克蘭境內從東部到西部是從使用俄語轉換到烏克蘭語，你問東部或南部同時講俄語、烏俄語（суржик，俄語和烏克蘭語的混合現象）或烏克蘭語的人，他是哪裡人，他會回答我既是烏克蘭人也是俄國人；而若問西部操烏克蘭語的居民，他只會回答我是烏克蘭人。東部的人會回答我是烏克蘭人也是俄國人，表示他對俄國的認同不只是建築在語言上，更是建立在相同的宗教、相近的歷史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和文化上。

即使一群人失去了母語或是其他的有形族群特徵，他們也不一定會喪失族群認同或是族群意識，因為族群意識並不是建立在有形的特徵上，而是建築在內心裡的自我認同感。

安德森在他的著作「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提到，拉丁文的沒落與方言性的「印刷語言」的興起，而以個別的印刷方言為基礎而形成的特殊主義的方言－世俗語言共同體，就是日後「民族」的原型。想像「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語言，而語言往往因其起源之不易考證，更容易使這種想像產生一種古老而「自然」的力量，無可選擇、生來如此的「宿命」，使人們在「民族」的形像之中感受到一種真正無私的大我與群體生命的存在。「民族」在人們心中所誘發的感情，主要是一種無私而尊貴的自我犧牲。「語言」加速了民族的想像，最後民族被想像成一個共同體，儘管內部可能存在著剝削或是不公義，但民族誘發的是一種平等的、同胞互相友愛的概念。（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2010）

民族認同最具說服力的時候，便是當民族被視為是「宿命」，而非選擇的時候；當它被視為來自不可改變的過去時，而且非現今人力所能改變的事實時；當它被視作不可輕舉妄動，除非要冒生命危險的現實時。總的來說，民族主義所追求的民族認同所追求的便是這個境界。（Zygmunt Bauman 著、朱道凱譯，2002）即使民族最初只是一個想像，如安德森認為方言性的印刷語言隨著資本主義和科技的發展擴展到各階層的人民，加速人民對民族的共同想像。然而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民族卻自然而然地變成一種真正「自然」的現象，它變成一個非人力所能控制的東西。跟隨著這種想像，民族的成員被他們的共同過去綁在一起，而民族精神是他們共有且同享的財產。民族精神團結了他們，同時也區隔這個群體與其他群體。但即使民族像是自然的現象，它仍須隨時警惕並不斷努力，好以維繫這個現象。也因此，為了維持「民族」這種意識形態，人需要強制力的權力來確保民族的存活與延續，而「國家」的權力最符合這個要求。合法化政權或是統治者的權力，讓新社會單位的民族國家能有效運作，「民族主義」這種意識型態就是其推動的原力。國家的權利意味著壟斷強制工具；唯有國家權力，才能直襲統一的行為規範，和頒布人人需要遵守的法律。國家需要民族主義來確保它的正當性，恰如民族主義同樣也需要國家來捍衛它的有效性。（Zygmunt Bauman 著、朱道凱譯，2002）

一旦國家與民族被視為一體，那民族主義就有越大的成功機率。現在國家權力意味著可以執行語言政策，將民族語言變成公家機關、法庭、議會或是社會上使用的語言。也因此，語言政策必須考慮到語言對於個體、族群、民族、社會及國家的意義，因為其中亦牽涉到認同的概念（蔡芬芳，2000），這些概念是環環相扣的。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安德森認為現代的國家之所以可以作為「想像的共同體」，是有其條件的。在消極條件上，他在建立新的認識世界方式前，必須打破原有的文化體系、宗教社群與帝國紀年等等舊的認識世界之方式。這就像西歐現代國族主義或者是民族國家的建立，其實是伴隨著世界觀的轉變，如放棄拉丁文（Zygmunt Bauman 著、朱道凱譯，2002），連帶著十九世紀中葉歐洲所有君主都在使用某種方言作為國家語言，以提升民族的理念在全歐各地迅速上升的威望。（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2010）此外還有放棄以社會階序中上層統治為核心的信念以及放棄人的起源與世界起源一致的時間觀念。但即使放棄了舊的認識世界方式，但還不足以建立新的民族國家。認識世界的新方式，必須要有三個重要的條件：第一個就是印刷工業，特別是印刷資本主義，提供大家以習以為常的報紙，使「想像的共同體」之中的所有人，不需面對面直接互動，就可以得知遙遠所在的最新消息，而產生休戚與共的感覺。第二個條件就是「標準化」的語言，使共同體成員間的溝通成為可能。也只有在這條件下，印刷工業才有可能發揮效用。第三就是國家統一的教育體系。（黃應貴，2016）從這裡可以看出，發展現代民族國家的三個條件，都與「語言」有關，如上述三個條件，第一個－印刷工業的出現，讓人民可以用方言接受到訊息，進而注意到遠方的「同胞」。第二個標準化的語言則是讓大家都能溝通；第三個條件則讓標準化的語言有機會透過學校教育來習得，並讓標準化的語言廣泛流傳。相同的語言會促進人民對民族的想像和認同，進而維繫一個國家的存在。現代人民講的語言也多少與政府制定的語言政策有關聯，語言政策的實施會影響民眾平常會接觸到的語言，從而影響人民對國家、社會、民族和族群的認知。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第三章：歷史背景探討

南斯拉夫是一個僅僅存在於二十世紀的國家，而要了解南斯拉夫境內的語言政策以及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議題的紛爭由來，就要從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和波士尼亞穆斯林的歷史說起。今日我們所討論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合併與分裂問題，是歷史事件的延續。巴爾幹半島南斯拉夫的種族、宗教和國家疆界問題，可以追溯到西元六世紀前，並且會牽涉諸多曾經存在於歐亞大陸上的國家與民族，其牽涉範圍不論時間或空間都過於龐大，也因此，在本論文中將只針對對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合併與分裂有影響的事件作論述。

第一節：南部斯拉夫民族的形成

南部斯拉夫人屬於斯拉夫人的南部分支，而斯拉夫人的原始起源地約在普里帕特沼澤區（Pinsk Marshes），即維斯拉湖上游盆地及聶伯河發源地一帶，大致涵蓋今日波蘭東南部、白俄羅斯西部和烏克蘭西北部。西元一世紀起，斯拉夫部族先後臣服於入據此地區之歌德人及匈奴人，並循其遷徙路線而四散播遷，主要分成向東、西兩個路線進行。向東遷徙之斯拉夫人後稱之為「東斯拉夫人」；向西遷徙之斯拉夫部族則是受日耳曼部族他遷之影響。因日耳曼部族陸續徙入羅馬帝國之疆域，其原居領域頓成真空，緊隨其後之斯拉夫部族遂未經任何戰端即取得大片領土，西元七世紀前後，斯拉夫部族以向西推進至中歐心臟地帶，此亦為斯拉夫部族西遷運動之頂點。中歐的斯拉夫部族後又分裂成「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杜子信，1998，頁 25）

構成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的幾支主體民族：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斯洛維尼亞人、波士尼亞人和馬其頓人皆屬於南部斯拉夫人，他們居住在巴爾幹半島上的歷史已超過 1500 年，6 世紀間，一支屬於阿爾泰語系的遊牧民族阿瓦爾人由中亞襲向中東歐地區，闢使原來棲息於此區的斯拉夫各族在不堪侵擾下紛紛向外遷徙，當時斯拉夫部族的遷徙分向東、西、南行進，到了 6 世紀末南斯拉夫珠部族就落腳於巴爾幹半島上。（杜子信，2010，頁 31）

南斯拉夫部族諸部族遷入巴爾幹半島不久後，除因地理阻隔之因素而形成數支血緣相近的民族及其語言之外，書寫字母及宗教信仰也在之後出現奇異；約 9 世紀之時，西里爾字母被發明並逐漸流傳於巴爾幹半島，最後除了半島西北部的

DOI:10.6814/NCCU201900758

斯洛維尼亞及克羅埃西亞採取拉丁字母拼寫之外，其他民族皆使用西里爾字母。緊隨其後的年代中，南斯拉夫諸部族一致化的宗教信仰局面亦被打破，原本自 6 世紀末以來已逐步皈依基督教信仰的南斯拉夫部族，在 1054 年基督教世界大分裂時被分隔成東西教會的陣營，由於東西教會的分界線縱切巴爾幹半島中西部，遂使南斯拉夫諸部族因地理位置及統治者不同而各取其宗，例如西北部的斯洛維尼亞人及克羅埃西亞人，因長期受到信奉羅馬天主教會的法蘭克王國、德意志第一帝國「哈布斯堡王朝」及匈牙利王國的統治而信奉天主教，位於中部及南部的塞爾維亞人及馬其頓人則因受到拜占庭的強烈影響而皈依東正教會，14 世紀末開始鄂圖曼土耳其西侵巴爾幹半島，導致了大批波士尼亞人及阿爾巴尼亞人皈依伊斯蘭教信仰，更使原本南斯拉夫地區東西基督教會對峙情勢轉而成為宗教三分之局。（杜子信，2010，頁 31-32）

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侵入巴爾幹半島及其與哈布斯堡帝國在巴爾幹西半部的對峙，同時也導致了南斯拉夫地區民族大混居的現象，因為鄂圖曼帝國佔領期間，原棲息於半島南部的塞爾維亞人不堪土耳其人的統治，遂大批逃向半島的北部及西部，當時的哈布斯堡帝國遂將這些塞爾維亞人安置於邊境地帶，執行禦敵政策，這些充當邊防農民的塞爾維亞人駐紮之地即位於今日克羅埃西亞東部的克甯斯卡・克拉伊納（Kninska Krajina，克拉伊納在斯拉夫語系的諸語言中皆表示「邊境」之意）、斯拉沃尼亞（Slavonia）及波士尼亞西部的波桑斯卡・克拉伊納（Bosanska・Krajina）等地，至於原先塞爾維亞人的發源地—科索沃，則移入大量的阿爾巴尼亞人，此種結果就造成南斯拉夫各民族分布的界線模糊化，並潛藏日後領土歸屬的嚴重爭端，因為不論是克羅埃西亞的克拉伊納地區或是科索沃地區都是中世紀克羅埃西亞王國及塞爾維亞王國的心臟地帶所在，這兩個地區對兩個民族心理上的象徵地位及民族價值是至高無上的。（杜子信，2010，頁 32）

第二節：泛斯拉夫主義運動

壹、發生背景

「泛斯拉夫主義運動」是一種根源於自十九世紀出所肇興的德意志浪漫主義（Die Deutsche Romantik）的文化及民族運動。德意志浪漫主義運動基於反抗法蘭西文化長期主宰著德意志及歐洲文化圈以及拿破崙入侵並佔領德意志，並導致自身特有的民族文化受到忽略甚為不滿，因而竭盡心力於自身民族傳統文化的收集與詮釋。德意志浪漫主義思想家、文學家及歷史學家等，如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t，1767-1835）與格林兄弟藉由研究民俗傳統文化、採集民間歌謠尋

DOI:10.6814/NCCU201900758

找德意志民族的再生力量。在此期間，他們發覺語言是一項利器，並且是民族意識的核心要素，因為對內，德語足以凝聚自身民意識；對外，則可與非德意志民族作一明確區別。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認為民族文化遺產中最特殊的因素即為語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語言」為其理想中的政治體。赫德在撰寫於 1784 年到 1791 年間的代表作《人類歷史哲學的理念》（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一書中論述德意志民俗及語言的重要性，因為兩者具體體現了「人民精神」（Volksgeist）及「民族的獨特性」（Nationale Eigenart），一個民族就是藉由自身的語言及傳統文化所形塑而成。洪堡特和赫德所見略同，亦認為民族性格的線索存在於個別語言的特有形式之中。對格林兄弟來說，「民族」（Volk）係由一群操相同語言的人所組成的。德意志浪漫主義者從對德語的研究中，找到專屬於德意志民族的「純正」與「真實」—德意志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格林兄弟必其心力深入民間且有系統的整理出各類文獻、各地方言、傳統習俗、民間儀式及傳奇佚聞等，在此過程中，德意志民族因而漸漸被建構成清晰的實體，並被視為早已存在現實世界許久，而後逐漸成為「自然」存在的。（蔡芬芳，2008，頁 112；杜子信，2012，頁 119）

由這種德意志浪漫主義所建構出的「語言國族主義」，可觀察出語言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國族主義中的洶湧浪潮及政治版圖的重組中扮演著無比重要的角色，而且成為界定民族的標準，此一觀點影響後世甚鉅。（蔡芬芳，2008，頁 112）

在巴爾幹半島上建構出「民族」有三個重要的因素，分別是語言、宗教和歷史。東正教成了守護過去傳統的重要媒介，儘管牧首也會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當權者合作，但是整個教會還是給信眾一種基督徒是較優越且獨特的認知，並認為是穆斯林僭越了基督徒的土地。由於東正教的教會機構會提供教育，也因此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很難去影響這些基督徒的思想。而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內缺乏一般的世俗教育，也因此他們錯失了影響穆斯林想法的機會。此外，講述聖人、殉道者和英雄的宗教文學再次受到歡迎，特別是那些因為抵抗伊斯蘭教入侵的殉道者的故事。宗教藝術也讓巴爾幹半島的人民想起過往偉大的拜占庭帝國、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王國[5]。

影響民族主義發展的還有緊密的農村社群。沒有讀過文學作品、正式的歷史和報紙的農民，儘管他們不識字，他們卻一代又一代的將口述史詩以及傳統的詩

[5] 塞爾維亞的全盛時期出現在十四世紀中葉，史蒂芬（Stephen Dušan，1331-1355）為塞王時，將國家的勢力推到最高點。他當時建立巴爾幹半島地區的最大帝國，西起亞德里亞海，東至愛琴海，北到多瑙河，南至希臘半島的柯林斯灣

1346 年，杜山加冕為「皇帝」（Tsar），並自上尊號為「塞爾維亞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之帝」。在宗教方面，杜山將塞爾維亞教會，由原來的大主教區提升為「教長區」，教區設於培契（Peć），地位與君士坦丁堡教長平行。

杜山所建立的擁有龐大領土的塞爾維亞帝國，一直是塞爾維亞人光榮歷史的象徵，二十世紀初「大塞爾維亞」運動的理想疆域，即以杜山帝國的領地為藍圖。（李邁先，2012，頁 149-150）

DOI:10.6814/NCCU201900758

作流傳下來。十九世紀的歐洲作家，如德國作家約翰・沃夫岡・馮・歌德（J. W. von Goethe）、波蘭詩人亞當・米茲奇維奇（Adam Mickiewicz）、蘇格蘭歷史小說家華特・斯考特（Sir Walter Scott）和俄國詩人普希金（A. C. Пушкин），他們對著迷於巴爾幹半島的民俗故事，並且將之引用在自己的作品中，且傳到西歐。所有的巴爾幹半島的民族皆有自己的神話、詩作和歌曲。所有的斯拉夫人在講述民族故事或是演唱民族歌曲時，皆會搭配古斯拉（gusla）一起表演。塞爾維亞人的歌曲主要描述中世紀的輝煌時期和其殞落，克羅埃西亞人歌曲的主題常是十五世紀之後的事件，而波士尼亞穆斯林歌唱的主角卻主要是土耳其人。在信仰基督教的斯拉夫人中，「馬克王子」（Prince Mark）是最常見的歌唱主題。塞爾維亞人稱他為 Marko Kraljević，保加利亞人則稱之為 Krali Marko。他的英勇事蹟和對抗科索沃[6]的故事過往歷史中的一個重要事件。

上述是將民族主義帶往一般人民的辦法，然而更普世，且影響到受教育階層的語言和歷史的方法則是印刷術的出現。巴爾幹半島的語言多樣且複雜，然而在有了大量印刷的技術之後，每個作者都希望可以用自己的母語來出版自己的作品，也因此有必要訂定標準的文學語言和將這個語言在學校傳授。塞爾維亞的語言改革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例子。

在當時的塞爾維亞，文學和文化的中心是哈布斯堡王朝境內的斯雷姆斯基卡爾洛夫奇（Сремски Карловци），當時教會在文學的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十八世紀時，塞爾維亞仍和基輔以及俄羅斯的東正教機構有著緊密的聯繫。唯一一個不受外人統治的東正教國家－俄羅斯，對哈布斯堡王朝境內的塞爾維亞人有著極大的影響力，特別是相較於以希臘和鄂圖曼為主的牧首。且當時塞爾維亞的神學院學生皆是在基輔接受教育，也因此，俄文和教會斯拉夫語便融入了當時的文學語言，而這個語言被稱為塞爾維亞斯拉夫語（Serbian-Slavonic language）。但這個語言只在教會和受過教育的人間使用，在其他巴爾幹半島上的東正教斯拉夫國家並無人使用。（Jelavich, 1983）

為了改善這種語言狀況，歐布拉多維奇（Dositej Obradović）和吳克・卡拉季奇便出來改革。他們兩人皆用方言寫作，而後者還做了語言改革。前者因信服西歐的啟蒙思潮，也因此他將大量西方作品翻譯為塞爾維亞語，並傳入塞爾維亞。後者則是選擇使用人數最多的赫塞哥維納方言作為標準，並且以此編文法和字典。

[6] 土耳其帝國的伊斯蘭教大軍，由小亞細亞半島度過黑海海峽（1354），攻佔亞德里亞諾堡（1361），定為新都。蘇丹穆拉德一世的下一個攻擊目標即為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公拉薩兒除了集結本身的騎士準備應戰外，並邀巴爾幹基督教邦國波士尼亞、瓦雷奇亞、阿爾巴尼亞等合組聯軍，迎戰土軍於科索沃，決戰日為 6 月 28 日。科索沃戰役表示著基督教聯軍的徹底失敗，並且決定了塞爾維亞和巴爾幹半島淪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附庸國，七十年後塞爾維亞即為鄂圖曼土耳其正式兼併（1459），歷時三百五十年。此戰爭被視為是護衛宗教、護衛家鄉的神聖戰爭，也因此有上百首史詩加以歌頌，成為一個神話性的傳奇。（李邁先，2012，頁 151）

DOI:10.6814/NCCU201900758

之後另一位塞爾維亞語言學家丹尼齊奇更完善改革後的塞爾維亞語法、文法和字典等。此外，吳克・卡拉季奇也對塞爾維亞的民間故事有極大的興趣，所以收集了為數不少的歌曲和詩作。而後來的克羅埃西亞的語言改革，也有受到他的影響，相同的方言基底成了之後促進南斯拉夫形成的一個因素。歐布拉多維奇在 1788 年完成一部自傳，此書常被譽為是塞爾維亞最好的散文作品。他在書中超越地理和宗教的界限，強調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的民族關係，認為所有在巴爾幹半島居住的斯拉夫人實為一家，首先提出了「南斯拉夫人」的觀念，為二十世紀建立的「南斯拉夫」預奠初基。（李邁先、洪茂雄，2012）

選擇哪種方言作為文學語言的基礎大大影響了巴爾幹半島上的斯拉夫人，而且在將來選擇也成了重要的政治指標的一環。從亞德里亞海到黑海和愛琴海，南斯拉夫語言的方言連續體從西邊的克羅埃西亞語、塞爾維亞語到東邊的保加利亞語。學者和政治人物用語言作為標準將人分成保加利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塞爾維亞人和之後出現的馬其頓人，但這樣的語言劃分在未來卻演變成彼此互相仇視的一個因素。

歷史也是民族主義的推手，語言是最先識別每個人是從哪個國家來，而歷史則是劃定了他們的領土。儘管對抗科索沃的戰役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會讓所有基督徒有共同的影響，然而在更古早之前的歷史則會彰顯出各個民族的差異，特別是談到中世紀的帝國時，如十八世紀寫出《斯拉夫保加利亞史》(Slavino-bulgarska Historiia）的保加利亞神父－白錫伊（Paisii），他在其作品中表現出炙熱的愛國情緒，呼籲同胞要熱愛自己的國家和語言，而且他寫作除了使用教會斯拉夫語外，也兼用保加利亞方言。他列舉保加利亞歷史中的君主、聖者以及一般人民的輝煌事蹟和特殊貢獻。他並不否認保加利亞自土耳其征服後的黑暗落後地位，但將保加利亞人和猶太人相提並論，強調他們才是上帝寵愛的民族。今日的苦難都是為了成就未來的輝煌。而要如何才能復興祖國，首在熟讀歷史，只有依賴歷史知識，才能抵制他人。白氏也規勸同胞，不要羨慕模仿希臘人的生活，不要使用希臘文，也不要以身為保加利亞人為恥。白錫伊也因此書而被視為是保加利亞民族意識的第一位覺醒者。（李邁先、洪茂雄，2012）

此外，宗教也對傳播民族主義運動有其影響力，如東正教的建立延續了基督徒的身份認同，且之後在對抗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和哈布斯堡王朝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也是未來區分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的主要判斷標準。

上面三個因素：語言、歷史和宗教形塑了巴爾幹半島的民族，它們建立了民族，卻也是民族衝突的催化劑。（Jelavich, 1983）此外，如在此章第一節南部斯拉夫人的形成中所提到的領土糾紛更是衝突的要素。

DOI:10.6814/NCCU201900758

貳、泛斯拉夫主義下的文學互惠

在斯拉夫人中，最早企圖去實踐赫爾德的民族自決學說的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捷克學者多布羅夫斯基（Josef Dobrovský）、巴拉茲基（Fratišek Palacký）和戎曼（Josef Jungmann）等捷克學者開始致力於研究捷克的歷史、文學和語言，因為在民族復甦的過程中，對歷史以及語言的重視是非常重要的起步。捷克學者（Miroslav Hroch）在其針對中東歐個個民族主義的興起及演變所作的一系列研究成果顯示，一個民族在推動其自身民族的重生可分為三階段：1.各民族的文人學者、思想家及藝術家等，致力於發覺遭統治當局壓迫或是漠視的自身民族的歷史、語言及文化傳統，這些人士並無任何政治意圖，純粹只是期望能夠維續其特有的民族文化及傳統於不墜，避免其隨著時代變遷而消逝不存。2.當學者的工作內容漸為各民族的有識之士所明瞭後，這些知識份子即以學者研究成果而作為自身民族真實存在的獨特價值，藉此激起所屬民族的民族情感。3.廣大民眾接受其說而逐步參與自身民族運動，先是爭取民族的自治地位，最終則要求建立完全獨立的國家。（杜子信，2012，頁 118-119）

斯洛伐克的學者則是在強調民族自決的意識中，更提倡所有斯拉夫人的共通性。當捷克學者多布羅夫斯基和戎曼在致力於將捷克語從日耳曼化中純化以及提升捷克語，斯洛伐克的學者薩法里克（Pavel Jozef Šafárik）和柯拉爾（Ján Kollár）則更強調注重斯拉夫人的共同文化遺產和推廣文化團結與互惠。柯拉爾相信文化和文學的互惠可以讓不同宗教信仰和使用不同字母的斯拉夫人融為一體，並進而促進斯拉夫人的文藝復興。他強調在斯拉夫人的文學互惠中有四個主要的語言：俄語、波蘭語、捷克斯洛伐克語和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柯拉爾的學說被翻譯成德語、塞爾維亞語、俄語和其他斯拉夫語言，並出現在捷克的期刊，也因此，他的主張被視為是泛斯拉夫主義的文學合作的宣言。而在受柯拉爾學說影響的斯拉夫人中，屬對南斯拉夫人的影響最大。他強調斯拉夫文學的合作可以抵抗外國文學的入侵，並主張斯拉夫人同屬一個民族，大家講的是同一種語言的方言，但他並不想讓他的主張變成一個斯拉夫政治同盟，也並不想泛斯拉夫主義變成對抗政府的組織。

在 1840 年代，柯拉爾的學說影響了部分塞爾維亞青年，同時他們也受另一位斯洛伐克學者斯圖爾（Ľudovít Štúr）的影響。他們成立同盟，並且出版有關泛斯拉夫主義的文章和期刊。1847 年出版一本名為 *Slavianka* 的論文集，裡面的文章全是討論泛斯拉夫主義。

而在 1826 年，塞爾維亞人就在佩斯（今布達佩斯的部分區域）成立塞爾維亞科學及文藝研究院（Matica srpska），這被視為是最早開始有民族自決意識的建

DOI:10.6814/NCCU201900758

設。塞爾維亞科學及文藝研究院出版以塞爾維亞語寫作的書，並支助布達佩斯地區提倡塞爾維亞文化的活動。

斯圖爾經常在教授的課堂上要求學生閱讀有關泛斯拉夫主義的文章，如閱讀柯拉爾、俄國詩人霍米亞科夫（Алекс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Хомяков）和波蘭詩人亞當・米茲奇維奇的作品。而其中亞當・米茲奇維奇對塞爾維亞的史詩和民俗傳說有所研究，他經常將自己的詩作與歷史事件做結合，如描繪 1389 年的科索沃戰役或是塞爾維亞人試圖抵抗土耳其人的佔領。他特別強調塞爾維亞人的民族和歷史的自我防衛的意識，同時他也是頭一位將塞爾維亞史詩與荷馬史詩做比較的人。他的作為被後起的塞爾維亞作家模仿。

而斯圖爾自己也寫過與斯拉夫民俗文化有關的書，他的書籍後來被翻譯成塞爾維亞語，因而引起許多塞爾維亞知識份子的注意與討論。也因此，他有機會認識塞爾維亞文字的改革者吳克・卡拉季奇和丹尼齊奇，他們兩位的文字改革是塞爾維亞民族覺醒的重要開頭。

塞爾維亞作家與文學批評家斯克爾利奇（Jovan Skerlić）認為斯圖爾、薩法里克和柯拉爾等斯洛伐克學者的主張對塞爾維亞起了很大的影響，因為塞爾維亞知識份子，不論是在塞爾維亞境內或是奧匈帝國境內，大多都贊同他們的文學互惠主張。同時，他也指出，他們皆是受捷克和斯洛伐克學者的影響，而非俄國；他認為俄國的泛斯拉夫主義不清楚明瞭，但是他認為最能感受到斯拉夫人的團結就是俄土戰爭時期和 1860 年代中期的莫斯科斯拉夫人會議。然而在 1870 和 1880 年代，塞爾維亞的泛斯拉夫運動焦點漸往關注塞爾維亞的中世紀以前，他們開始強調十四世紀的杜山時期的光榮歷史。

在克羅埃西亞，柯拉爾的學說也影響了部分的克羅埃西亞學者，如柳德維特・蓋伊。柳德維特・蓋伊在他訪問佩斯的時候，與柯拉爾結為好友。柯拉爾對他表示，克羅埃西亞的民族覺醒應該要變成斯拉夫人文藝復興的一環，他告訴柳德維特・蓋伊他是克羅埃西亞人，但同時也是斯拉夫人，要有所行動前，應該要以這個出發點開始。也因此，之後他發起了伊利里亞運動，並將此運動視為南斯拉夫人的政治、文化同盟的象徵。（Milojković-Djurić, 1994）

克羅埃西亞在十九世紀時仍受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並直接受匈牙利人的治理，也因此克羅埃西亞人僅能使用馬札爾語。到了 1836 年，在克羅埃西亞的出版品中，出現以「伊利里亞」代替「克羅埃西亞」的用詞，此「泛南斯拉夫人」思想的提出，使克羅埃西亞的民族復興由文化轉為政治。此後，伊利里亞變成一種政治運動，開始在克羅埃西亞型成氣候，同時也在斯洛維尼雅、達爾馬奇亞和波士尼亞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然而，伊利里亞運動始終沒有得到塞爾維亞的支持，其一方面是對伊利里亞運動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則是為了自身獨立建國做準備，並盡量避免激怒奧地利和俄皇。1843 年開始，「伊利里亞」一詞被奧國禁止

DOI:10.6814/NCCU201900758

使用。（洪茂雄，2005，頁 72）

第三節：Vuk Karadžić 的文字改革

狄托在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提倡的口號「兄弟情誼與團結精神」並不是要將所以的南部斯拉夫人變成一個民族，而是要尊重各個民族，大家和平友愛相處。在提倡這個口號的同時，狄托也用了塞爾維亞語的改革者－卡拉季奇作為一種象徵，因為卡拉季奇的改革將塞爾維亞語在歐洲默默無聞的地位提昇至一種語言的位置，讓「塞爾維亞人」被看到，之後也影響了克羅埃西亞人的語言改革，簡而言之，狄托時期的南斯拉夫有超過八成的人的母語皆是受卡拉季奇改革的影響，因為他改革了語言，才有機會讓南部斯拉夫人合作，並進而建立南斯拉夫。

在卡拉季奇之前，另一位塞爾維亞學者歐布拉多維奇也曾試圖改革塞爾維亞語，而他的思想也影響到許多卡拉季奇的同輩人。如果說十八世紀時，塞爾維亞傳統文化的維護者是東正教教會的話，那歐布拉多維奇就是其啟蒙運動的代表。

歐布拉多維奇原本也在東正教的修道院學習，但他在修道院中看到僧侶的懶散、怠惰以及媚俗，以及他無法滿足於修道院圖書館裡的知識，所以後來他就逃出修道院，並四處遊歷。1782 年他到德國哈雷大學學習哲學，1783 至 1784 年在萊比錫出版他的第一版書。後來他持續寫書想發揚哲學，並希望能介紹當代的歐洲文化給塞爾維亞人。所以他不停地翻譯德文、法文和英文作品到塞爾維亞語。他批評當時的大主教比土耳其人更糟糕，像是他就不會讓人們跳異教徒的舞蹈，也不會讓他們去尋找吸血鬼。他是一個比學有所成的不可知論者還要虔誠的新教徒，他的思想是反傳統的。他認為書比教堂的鈴聲更重要，因此他減少宗教節日、改革衛生習慣，使原本傳統、冗長又不衛生的喪禮儀式更合理。他佈道時宣傳普世的道德價值，這和當時的奧地利塞爾維亞神職人員相當不同，十八世紀時那裡的神職人員喜歡講述思想狹隘的懺悔文學。歐布拉多維奇是當時強硬的塞爾維亞愛國份子，他認為「信仰可以改變，但是民族和語言從不會改變。」

他沒有語言學的基礎，也沒有試圖改變塞爾維亞語，但他希望他的作品能被所有塞爾維亞人讀懂，也因此他嘗試用當時流行的塞爾維亞語寫作。他的改變讓當時的書寫從「文學」的形式轉變成「流行的」形式。1804 年他待在義大利的第里雅斯特（Trieste）並為塞爾維亞第一次起義籌錢，因為他認為這是塞爾維亞人脫離外國統治的第一個部分。後來他又遊歷到奧地利和摩爾多瓦公國的塞爾維亞人社區，而他的精神能量和愛國情操非常吸引年輕的塞爾維亞人，而當時在卡爾洛夫奇（Karlovci）讀書的卡拉季奇也是他的信仰者之一。（Wilson, 1970）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十九世紀初東正教教會還是在外地的塞爾維亞社區中扮演著守護傳統價值和避免當地的塞爾維亞人受到奧地利或是匈牙利文化的影響。但塞爾維亞人的民族主義是由其他方式發展出來的，如「新教徒歐布拉多維奇」就將歐洲各國文學和新思潮翻譯成塞爾維亞語，他的作品影響許多年輕、識字的塞爾維亞人。但生長於布達或是維也納的年輕塞爾維亞人並不滿足於此，他們希望有自己的文學，而且要用自己的語言寫，也因此他們不可避免地反對東正教的保守和傳統，也反對教會使用的塞爾維亞教會斯拉夫語和字母。教會使用的字母和語言不足以應付口說的語言、語言和文法也不夠清楚明確，可以使用的方法實在有太多了。更重要的是，教會使用的語言和一般的塞爾維亞人說的語言的關聯非常小，也無法傳達日常或是複雜的思想。此時他們也受到赫德的浪漫民族主義思想的刺激，赫德提倡的民族文化、民族或是「民俗」語言是一個文化最純粹的表現。也因此不只是語文學家和文法學家對語言和字母改革有熱情，年輕又愛國的知識份子更是有熱忱。這種想法不只是對保守的東正教會的反對，更是一種積極的主張塞爾維亞人異於土耳其人、奧地利人和俄羅斯人的思想。

農民人家出身的卡拉季奇在這樣的思想潮流中剛好到布達療傷，雖然他無法融入當地塞爾維亞知識份子的圈子中，但他對他們來說，他有新聞報導的價值。年輕一輩的塞爾維亞人和匈牙利人都對卡拉喬傑反抗土耳其的起義感到興奮與好奇，正好卡拉季奇有第一手資料可以告訴他們，也因此與其中一些人結為好友。

米洛凡諾夫（Luka Milovanov）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一位文法學家和批評家，在 1810 年時出版一書介紹「受歡迎」的語言和文學，在書中他寫道「任何有塞爾維亞母親的兒子，若是想要用自己的母寫作，應該先出版一本自己語言的指導手冊。」此外，剛好在卡拉季奇待在布達時，塞爾維亞語言學家及詩人穆爾卡利（Sava Mrkalj）正出版一本書批評塞爾維亞教會斯拉夫語字母中一些表示「硬音」的字母在塞爾維亞語中沒有起到作用，但卻和俄羅斯基督宗教的語言有關聯，這明顯是和親俄羅斯的牧師有關。穆爾卡利用簡化的字母寫作，也因此引起東正教會的極大反彈。卡拉季奇在布達的短暫停留對他的未來人生有重大影響，他有了革命性重要意義的文學目標，當然他也想到了嘗試達成這個目標會引起什麼樣的反彈，特別是來自於東正教會的壓力。但是他也逐漸了解到自己對現今塞爾維亞口語和來自他家鄉的口述詩的經驗以及知識對這個改革會有多少貢獻，也因此他決定要改革塞爾維亞字母，並且最後能重建塞爾維亞人的民族意識。（Wilson, 1970）

1813 年卡拉季奇旅行至維也納，並在那裡結識了斯洛維尼亞語言學家葉爾奈伊・科比達爾（Jernej Kopitar）。科比達爾研究斯拉夫語系的語言、文法，並和許多當時不論是在奧匈帝國境內的還是在其他國家顯著的斯拉夫學家結識且

DOI:10.6814/NCCU201900758

一同討論語言和語文學。他也不只對語言學有興趣，他對「人」也有興趣，也因此他經常接觸從東南歐來的旅人或是難民。此外他希望奧匈帝國境內的斯拉夫人能對自己的文化以及根源有興趣，所以他致力於發展奧地利斯拉夫人能在政治上扮演何種角色的點子。他的目標之一就是要將維也納變成斯拉夫人的文化中心，並且保證奧地利斯拉夫人能得到應有的教育和政治權力，他是奧地利斯拉夫主義的提倡者。他也希望中東歐的斯拉夫人能盡量不受俄羅斯的影響，基於他所受的天主教教育，他認為俄羅斯是落後且野蠻的。他對南斯拉夫人和俄羅斯人的看法可以用下面一段話總結，這是他對卡拉季奇的作為的想法：「讓奧地利的南斯拉夫人擁有政治上的快樂和有科學系統的教育系統的時刻將會到來，到時候和對以自己為榮的俄羅斯人相比，南斯拉夫人看起來會是更高等和更幸運的生物。」藉由教育，南斯拉夫人可以發展自己的潛能和構成奧地利中最重要的民族元素，這是身為奧地利愛國主義者科比達爾的信念。（Wilson, 1970）

由於受赫德的影響，科比達爾認為要了解大眾的語言就要先收集民間故事、民俗歌曲等，此外，他剛好停聞有卡拉季奇這號人物，而且知道他擁有豐富的民俗文學和大眾語言的知識，於是他便很想與他會面。而卡拉季奇也一樣，因為他認為若是要推廣他的語言改革以及民俗文學的知識，那麼他必定需要一個能在文學改革和政治改革上都能幫忙他的人，而在當時的奧地利，這樣的一號人物就是科比達爾。而在往後的人生當中，卡拉季奇一直都認為是因為有妻子和科比達爾的幫助，他才能達到今天的成就。科比達爾在看到卡拉季奇描寫塞爾維亞的現況時，他對他使用的語言很有興趣，他認為這是真正的塞爾維亞語，儘管其他塞爾維亞人認為卡拉季奇使用的語言是牧羊人和養豬戶等人使用的語言。也因此科比達爾想見卡拉季奇，而當他們認識了之後，科比達爾認為卡拉季奇擁有的民間歌曲的知識更顯珍貴，便鼓勵他寫下來，然後他要幫他出版。

但其實就為何科比達爾為何會對卡拉季奇感到興趣，這還是有疑問的。因為科比達爾並不是塞爾維亞語的專家，而且當時卡拉季奇在維也納寫的有關塞爾維亞現況的文章，他是用偏向東正教會的塞爾維亞斯拉夫語寫的，和他後來發展的大眾語言有很大的不同，也因此就對共產主義及南斯拉夫有研究的英國外交官文鬱生（Duncan Wilson）的看法，他認為是卡拉季奇文章中對卡拉喬傑爾過度依賴俄羅斯的不滿和憎恨俄羅斯簽署布加勒斯特條約（Treaty of Bucharest）[7]，讓塞爾維亞人再次淪陷於鄂圖曼土耳其的手中吸引住科比達爾的。科比達爾原本就企盼奧地利能取代俄羅斯成為斯拉夫人的文化和文明中心，而且當時的奧地利塞

[7] 布加勒斯特條約（Treaty of Bucharest，1812）：1812 年布加勒斯特條約，是 1812 年 5 月 28 日鄂圖曼土耳其和俄羅斯帝國的條約，此次條約終結 1806 年到 1812 年第七次的俄土戰爭。從 1804 年塞爾維亞人開始起義反抗鄂圖曼土耳其，俄羅斯就一直不停提供援助，但在此條約的第八條中，俄羅斯放棄對起義的干涉，讓鄂圖曼土耳其得以放手鎮壓起義，重新奪回自 1806 年就被逐出的貝爾格勒。Retrieved 23 May fro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布加勒斯特條約（1812 年）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爾維亞人對於奧地利政府並沒有支持塞爾維亞起義普遍感到不滿[8]，也因此卡拉季奇的文章對於實現他的奧地利斯拉夫主義是有作用的。但不論原因為何，最終他們兩個相識並結為好友。科比達爾除了鼓勵卡拉季奇發展塞爾維亞語文法和收集民間詩歌外，他還跟他介紹赫德的德意志民俗歌曲選集，讓卡拉季奇了解這不只是為了發展民族意識，也是一種歐洲的流行。（Wilson, 1970）

儘管柯比達爾認為卡拉季奇的作為可以團結奧地利境內的南斯拉夫族群，但卡拉季奇可能並不這麼認為，他認為真正的塞爾維亞人是住在被土耳其統治底下的塞爾維亞，而不是住在維也納。真正的塞爾維亞語存在於德里納河和摩拉瓦河間，還有一些則是在多瑙河和薩瓦河流域，主要在鄂圖曼土耳其統治底下的新帕札爾（Novi Pazar）到赫塞哥維納。但從馬切萬州（Mačva）到波士尼亞的語言已經受到土耳其語的影響，而從波札雷瓦茲（Požarevac）到蒂莫克河（Timok）流域則是受弗拉赫人（今羅馬尼亞人）語言的影響，但他們還是有著斯拉夫來源的名字，而不是猶太人、希臘人或是其他民族的名字。十九世紀初就移民至奧地利的塞爾維亞人，雖然受到比較好的對待，但是他們還是暴露在太多的外來文化和宗教當中，而被土耳其壓迫的塞爾維亞人卻是更純粹的塞爾維亞人，卡拉季奇的想法儼然是對奧地利塞爾維亞人的一種反抗宣言。奧地利塞爾維亞人認為他們是受過教育的，然而卡拉季奇覺得他們是對自己民族和語言都很無知的人。（Wilson, 1970）

原本卡拉季奇對於科比達爾的文法規則建議感到猶豫，因為卡拉季奇缺乏語言學的相關背景知識，但是之後他在科比達爾和友人米羅凡諾夫（Luka Milovanov）[9]的幫助下，還是著手於此項工程。卡拉季奇的寫作範本為十八世紀由哈布斯堡王朝塞爾維亞貴族作家穆拉柔維奇（Avram Mrazović）出版的塞爾維亞斯拉夫語文法，由科比達爾提供，然後由卡拉季奇寫作，最後讓米羅凡諾夫修改。

在卡拉季奇寫給訂閱者有關文法問題的廣告中提到他認為塞爾維亞語文法的最大問題，就是哪種才是真正的塞爾維亞語。「塞爾維亞人終於從無知的黑暗中走向文學的領域，但卻很快就遇到障礙，最大的障礙就是哪種才是真正的塞爾維亞語？有些人用純正的塞爾維亞斯拉夫語寫作；有些知道一般塞爾維亞人不識塞爾維亞斯拉夫語的作家就用簡單的塞爾維亞語寫作；還有一些認為簡單的塞爾

[8] 奧地利政府在塞爾維亞反抗鄂圖曼土耳其的起義中完全沒有表現出支持或是提供援助，甚至還不允許維也納的塞爾維亞新聞報導有關塞爾維亞的政治情勢。

[9] 米羅凡諾夫（Luka Milovanov）在 1810 年出版他研究塞爾維亞韻詩和韻腳研究的成果。他的父親從波士尼亞移居布達並成為奧地利的志願軍，而他則成為塞爾維亞語教師。後來他因受風寒而聾，只能教幾位俄國歌手數學，並且還染上酗酒的習慣。最後布達的塞爾維亞人組織聘他為翻譯，並給他最低工資、勉強可以過冬的衣物和可以溫飽的食物以及酒。他 1828 年因過於貧窮而死亡。（Wilson, Duncan., 1970, p.99）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維亞語是不得體的作家則混合著塞爾維亞斯拉夫語和一般民眾的塞爾維亞語來寫作。而正因為我們缺乏塞爾維亞語的文法規則，所以阻礙著這些想像其他歐洲作家一樣用自己母語寫作的塞爾維亞作家。」總的來說，卡拉季奇希望他的文法改革能減低作品寫作的難度。

1727 年莫斯科東正教主教派遣使者到匈牙利的塞爾維亞社群中授業，因為匈牙利是天主教國家，而信仰東正教的塞爾維亞族群像是孤立其中。這些俄國使者帶來有關宗教儀式的書都用俄文寫作，而其他更古早的禮拜儀式的書則用教會斯拉夫語寫作，儘管不只匈牙利的塞爾維亞人看不懂，其他地區的塞爾維亞人也無法理解，但礙於俄羅斯的壓力之下，塞爾維亞東正教的掌權者選擇將教會斯拉夫語、俄語和塞爾維亞語混合著使用，成為塞爾維亞斯拉夫語，但實際上這個語言更接近俄語。而且當時大眾有一個錯誤的認知，就是最純粹的塞爾維亞語應該是要與古斯拉夫語更接近的，如法語、義語和西班牙語都是從拉丁語分裂而來，那最純粹的塞爾維亞語也應該要更接近古斯拉夫語，所以在知識份子之間，一般民眾講的塞爾維亞語成了落後的語言，是「匈牙利語、土耳其語、德語和塞爾維亞語的混合語」，而塞爾維亞斯拉夫語才是享有特殊地位的，連奧地利境內的塞爾維亞知識份子都將講塞爾維亞斯拉夫語蔚為風尚。

語言問題後來也演變成宗教派系和國家的問題，奧地利政府為了削弱塞爾維亞人和俄羅斯的關聯，鼓勵在學校教授一般平民講的塞爾維亞語而非塞爾維亞斯拉夫語，此外政府也希望可以用拉丁字母取代西里爾字母，在 1779 年政府頒佈法令更禁止使用西里爾字母，除了教堂文學之外。但在東正教會的嚴正抗議下，此條法令撤除。而歐布拉多維奇用大眾的塞爾維亞語寫作的作品出版為學校教材時，東正教會更視他為基督教、天主教派來的敵人，而且這是奧地利要使塞爾維亞人天主教化的政策。

改革語言初期，卡拉季奇認為所謂的「大眾的」語言應該是要被修正但不能失去它原本的特色，如有新的概念或是事物出現時，那必定要創新詞，可是必須是從斯拉夫根源出發，而非直接借用外來語。例：「正式的、官方的」應為 zvanično，而不應該是 oficialno。如果塞爾維亞語中已經有相同的概念的詞了，那就應該要直接採用；也可以採用其他斯拉夫根源的詞，但必須要改成塞爾維亞語的形式。他早期的改革語言想法在後來被他自己視為是「斯拉夫化」。

此外字母也是個問題，以前塞爾維亞語是直接採用古斯拉夫語的字母，至少有 45 個以上，但其實很多在塞爾維亞語中是沒有作用的。而教會推行的塞爾維亞斯拉夫語也用了 40 個字母，而且很多是在俄文中有作用，但在塞爾維亞語中沒有作用的，所以卡拉季奇便決定要根據發音的原則來簡化字母。1779 年斯洛維尼亞語言學家庫梅爾戴伊（Blaž Kumerdej）提出：「我們的語言中任何一個被聽到的聲音都不應該被定義為超過一個以上的符號或字母。我們的語言中不應該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存在要寫出來，卻不發音的字母。」[10]科比達爾在他 1808 年發表的斯洛維尼亞文法中採用這套標準，然後穆爾卡利在他試圖改革的塞爾維亞正字法中也採取此項準則。他於 1810 年發表的 26 個字母如下：

А/ а	Б/ б	В/ в	Г/ г	Д/ д	Е/ е	Ж/ ж	З/ з	И/ и	J/ j
К/ к	Л/ л	М/ м	Н/ н	О/ о	Р/ р	С/ с	Т/ т	У/ у	Ф/ ф
Х/ х	Ц/ ц	Ч/ ч	Ш/ ш	Ь/ ь					

卡拉季奇的字母是依據穆爾卡利的字母修正而成，他 1814 年發表的第一套字母除了上面 26 個外，還有 ѣ、я、ю 和 ть（如 ch 的發音）。後來他和米羅凡諾夫討論過後，決定刪掉 ѣ、я 和 ю，改用 э、ia、iy 取代。在此階段有些複合音字母他也找了其他字母取代，如 льа、ньа 和 ть 被 ль、нь 和 ħ 取代，然後又想出另外的字母 ц 和 ђ 取代 дь。儘管他做出了改革，他還是時有猶豫，在 1815 年到 1818 年他跟科比達爾的通信中，他還是會使用 ю、я、ы、й 和 ѳ。1815 年出版的第二套字母還回復了 ѣ。當時他同時受到修到祭司穆須斯基（Lukijan" Mušicki）[11]和奧地利塞爾維亞移民的影響，他們反對他將塞爾維亞字母拉丁化好以切斷與俄羅斯的連結，但柯比達爾鼓勵他做出自己的判斷，並建議他使用 j 做為軟音符。

1818 年卡拉季奇在他的字典中首次採用他的塞爾維亞語字母，這次他從穆爾卡利的字母中刪掉 й、і、ь，加上了 j 和他創的新字母 ль、нь 和 ђ。為了區別"dj"這個音，還使用了 ц（如英文中 giraff 的 gi）以和 ђ（如英文中 James 的 j）做出差別。他在前言還附註了兩個字母 x 和 ф，表示在塞爾維亞的詞彙中實際上是不太會使用到這兩個字母的。多年以後，在他遊歷完達爾馬提亞和蒙特內哥羅後，於 1852 年出版第二版字典，在此他最後一次修訂字母，之後這套字母就一直作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和塞爾維亞語的西里爾字母標準。字母如下：

А/ а	Б/ б	В/ в	Г/ г	Ђ/ ђ	Е/ е	Ж/ ж	З/ з	И/ и	J/ j
К/ к	Л/ л	Љ/ љ	М/ m	Н/ н	Њ/ њ	О/ о	П/ п	Р/ р	С/ с
Т/ т	Ћ/ ћ	У/ у	Ц/ ц	Ч/ ч	Џ/ џ	Ш/ ш	Х/ х	Ф/ ф	

不過儘管卡拉季奇所創造的字母被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使用，但是他本

[10] 原文：' Any sound heard in our language should not have to define it more than one sign, one letter. It does not suit our language that a single letter should be written that is not pronounced. '（Wilson, Duncan., 1970, p.386）

[11]穆須斯基（Lukijan" Mušicki）：塞爾維亞詩人、散文作家和東正教僧侶。他曾試圖用方言講道，但卻被東正教會威脅要解除其職務。此外，他也被斯洛伐克作家薩法里克稱為是「塞爾維亞詩的王子」、塞爾維亞哲學家丹尼齊奇稱作「塞爾維亞文學界的當代之父」、科比達爾則說他是「塞爾維亞的賀拉斯」，他的詩作在當時享有極高的評價。

DOI:10.6814/NCCU201900758

人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塞爾維亞主義的支持者，他認為所有說 Štokavian 的人都是塞爾維亞人，只是有些是天主教徒、有些變成穆斯林了。因此他的改革也可以說是不只為了「塞爾維亞人」，他認為這套字母改革是給所有使用 Štokavian 的人。所以當後來克羅埃西亞人－柳德維特・蓋伊發起伊利里亞運動，並積極邀起卡拉季奇參與時，他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因為他認為伊利里亞運動的目標是為了要提升克羅埃西亞人的民族意識，但是他的目標是希望可以重現杜山時期的塞爾維亞王國。但當時的克羅埃西亞人還是很景仰他，首都薩格雷布甚至賦予他「榮譽市民」的勳章。

卡拉季奇視所有講 Štokavian 的人都為塞爾維亞人是有其原因的，因為著有《帝國行政論》的君士坦丁七世所劃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版圖正好是 Štokavian 和 Čakaivan 的分界線，因此他認為講 Čakavian 的人才是克羅埃西亞人，而斯洛維尼亞人是講 Kajkavian 的人。出於這樣的觀念，他也寫過頗具爭議的文章批評不講 Čakavian 的人就是忘了自己是克羅埃西亞人的人以及《四海皆是塞爾維亞人》（Srbi svi i svuda）。就算卡拉季奇曾經被伊利里亞運動的發起者蓋伊在其所辦的雜誌稱讚「他的文字改革讓我們能團結起來。」但是「卡拉季奇」這個名字在之後對克羅埃西亞人來說就是「大塞爾維亞主義」的一個象徵或者是這樣的聯想。

後來他也曾嘗試從語言或是宗教的態度來解釋「誰是塞爾維亞人？」和「誰是克羅埃西亞人？」，他所得的結論就是「信東正教的為塞爾維亞人」、「信奉天主教的為克羅埃西亞人」。儘管這個理論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但在第三南斯拉夫時期的克羅埃西亞的著名旅遊城市杜布羅夫尼克和蒙特內哥羅的科托，確實是按照宗教在區分克羅埃西亞人和塞爾維亞人的。（Corović, 1938）

就筆者的觀點來說，卡拉季奇是個有爭議的人物，但是他和他的語言改革可謂象徵了兩件事：第一、農民、或可稱為底層人民的勝利。因為出身農家、學歷也不高的他成功地改革了語言。十八世紀在杜布羅夫尼克也曾經有模仿義大利的學術機構要改革語言，但沒有人像他一樣成功；第二、他確實讓今日的塞爾維亞人、波士尼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有一個共同的語言基礎。儘管今日這個共同的語言已經因為「政治正確」而更名為「塞爾維亞語」、「波士尼亞語」和「克羅埃西亞語」，但在南斯拉夫時期，它皆可以稱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

第四節：伊利里亞運動

十九世紀克羅埃西亞仍舊臣屬於奧匈帝國之下，而在當時的克羅埃西亞最顯著的階級為身兼地主的貴族，但這些地主幾乎皆是義大利人、德意志人和匈牙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利人，因此對於提升克羅埃西亞人的民族意識沒有什麼作用。接下來一級的貴族主要是克羅埃西亞人，但這一群人是打擊克羅埃西亞民族權力最兇的人，也是之後克羅埃西亞地方政府和議會裡主導的人。

綜觀當時的匈牙利領土，行政和教育的語言皆是拉丁語。拉丁語也是歐洲受過教育的人士使用的語言和天主教會使用的語言。然而十九世紀開始，匈牙利的民族主義主張者開始對政府施壓，要求行政和教育的語言要從拉丁語改成匈牙利語。這項主張是對奧地利政府使用德語的政策的一項反應，而且極有可能引起其他民族的迴響。但是匈牙利語並不是一個世界性的語言，而且芬烏語系的匈牙利語對使用斯拉夫語系、德意志語系和羅曼語系的人來說都很難學，更不用說在文學或是宗教的意義遠遠不及於拉丁語，因此這項運動並沒有掀起極大的波瀾。

然而義大利革命給了匈牙利民族主義主張者找到了機會，因為神聖羅馬帝國的最後一任皇帝、也是奧地利帝國的第一位皇帝—法蘭茲二世為了要鎮壓義大利的革命，而需要匈牙利國會同意讓他部署軍隊在靠近義大利的縣，因此民族主義份子藉機施壓，要求要把官方語言從拉丁語變成匈牙利語。而克羅埃西亞議會為了抑制奧地利的權威，因此在 1827 年和 1830 年也通過了匈牙利語作為克羅埃西亞學校的必修科目。

這個有關語言的決定引起了大眾反彈，特別是那些在奧地利維也納或是格拉茲留學的年輕學子們，因為在大城市接受教育的他們也受到了由赫德發起的浪漫民族主義的影響，此外也會接觸到泛斯拉夫主義的斯洛伐克學者，諸如薩法里克和科拉爾等人的思想。而在那些克羅埃西亞年輕知識份子之中，最重要的當屬柳德維特・蓋伊。（Jelavich, 1983）

出身於德語家庭的柳德維特・蓋伊很早就到布達和格拉茲留學，除了接觸到泛斯拉夫主義的學者薩法里克和科拉爾，他也有機會先接觸到卡拉季奇的語言改革作品，而且當時在當時的知識份子之間，塞爾維亞民歌和民詩蔚為風尚，蓋伊也沉浸於其中。當時奧匈帝國境內的斯拉夫學者們致力於要將斯拉夫文化提升至和馬札爾文化、德意志文化能相比擬的地位，蓋伊從其他民族的經驗中看到他人都強調語言和歷史的重要性，因此他也決定從這個方向著手。他宣稱南方斯拉夫人是古代伊利里亞人的後代，而且是這塊土地最早的居民，不過後來連蓋伊都親自改變了這樣的說法，也不是所有人都持有這樣的看法，但這項復興民族意識的運動還是被稱為伊利里亞運動。

既然要強調克羅埃西亞人是這塊土地上最早的居民，那麼就要先定義：這塊土地的範圍是哪裡？蓋伊用浪漫而模糊不清的語言表示「從維拉賀到瓦爾納」（From Villach to Varha），這就包括了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蒙特內哥羅、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北部和匈牙利南部。蓋伊最重要的支持者為貴族德拉施科維奇（Janko Drašković），他就寫到「伊利里亞人是古代希臘羅馬時

DOI:10.6814/NCCU201900758

期古伊利里亞人的後代，但是後來他們分裂成克羅埃西亞人、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和斯洛維尼亞人。」不論主張為何，這項運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強調所有的南部斯拉夫人有著相同的根源，所以應當要聯合起來成為一個政治實體。（Jelavich , 1983）

變成一個政治實體的目標沒有實現，但是蓋伊卻也對語言造成了影響。既然他的目標是要讓所有南部斯拉夫人聯合起來變成一個政治實體，那麼就應當讓彼此的語言距離縮小，他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先修訂正字法。他除了借用捷克字母的改革法將克羅埃西亞語字母做修訂，譬如增加附加符號，更重要的是他選了 Štokavian 作為克羅埃西亞文學語言，讓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蒙特內哥羅人和未來的波士尼亞人有了相同的語言基礎。

第五節：第一南斯拉夫成立前和後的南斯拉夫各國歷史簡述

壹、「南斯拉夫」的概念起源：

「南斯拉夫」這個概念是在十九世紀逐漸形塑出來的，此時後來構成「第二南斯拉夫」的國家—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波士尼亞、馬其頓和蒙特內哥羅分屬在奧匈帝國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底下。自十八世紀開始，就分屬於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和奧匈帝國底下的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為最重要的勢力，試圖復興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人民族意識的起頭者都有想過要結合其他同樣講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但不同宗教信仰的勢力。最早提出「南斯拉夫人」的概念為塞爾維亞學者歐布拉多維奇，他在 1783 年的書信中曾提到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斯雷姆……等地的人是講同一種語言和擁有同一個根源的，儘管宗教不同，但是語言和根源是不能被抹滅的。[12]之後發起伊利里亞運動的柳德維特・蓋伊也試圖拉攏塞爾維亞語的改革者卡拉季奇一同爭取在奧匈帝國內自治的權力，並且柳德維特・蓋伊將此運動視之為是南斯拉夫人政治和文化同盟的象徵。南斯拉夫主義的主要提倡者史特勞斯梅葉（Josip Strossmayer）主教，1866 年他在札格雷布建立南斯拉夫科學研究院，這是第一所以南斯拉夫為名的機構，然而他的構想大致仍限定在哈布斯堡王朝之下，

[12] Obradović, Dositej.: Pismo Haralampiju (Leters to Haralampie Selected works). Novi Sad, Belgrade: Matica srpska & SKZ, 1969,p.49. (引自 Rudić, Vujadin. The Yugoslav idea, the former Yugoslavia and its Social and Geographical Features. Retrieved 4. June, from https://www.rastko.rs/istorija/srbi-balkan/vrudic-yugoslavia.html)

DOI:10.6814/NCCU201900758

他想要把南斯拉夫諸民族統一成一個單一的國家，置於聯邦制的哈布斯堡王朝君主政體之下，他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聯邦制的南斯拉夫國家。這個國家是以哈布斯堡君主國維的廢墟為基礎，涵蓋了塞爾維亞和蒙特內哥羅。這是第一次出現聯合所有南斯拉夫民族成為一個聯邦的觀念，目的是建立一道更寬廣的陣線，以對抗非斯拉夫的佔領者，並贏得自由。但此早期的南斯拉夫建國主義並沒有成功，因為史特勞斯梅葉（Josip Strossmayer）的建國構想中，他將所有巴爾幹半島西部的民族都劃進來，這表示著波士尼亞也在其涵蓋範圍內，但是當時領導塞爾維亞人起義反抗鄂圖曼土耳其政權的加拉沙寧（Ilija Garašanin）也企圖要將波士尼亞劃進他的塞爾維亞版圖內（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1999，頁 72-73）。

從 1866 年開始塞爾維亞也開始考慮起與克羅埃西亞聯合建立一個獨立的南斯拉夫王國，即由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達爾馬奇亞、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和塞爾維亞—蒙特內哥羅的三元制王國；另一方面，塞爾維亞也積極和保加利亞共同爭取獨立建國運動，但最終因爭奪馬其頓領土而撕裂。

雖然沒有結果，但是建立一個南斯拉夫國的想法並沒有消逝。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這個觀念起起落落，先是 1875 年塞裔試圖藉由一場叛變取得波士尼亞，然後是奧地利佔領波士尼亞，造成奧地利和塞爾維亞之間的緊張情勢。1875～1876 年保加利亞先向鄂圖曼土耳其宣戰，1876 年雖然塞爾維亞以及蒙特內哥羅也對鄂圖曼土耳其宣戰，同為東正教國家的俄國也有數百名志願均參戰。1876 年 1 月在奧匈帝國調停下，簽訂《巴黎條約》，各簽約國通過一項促進鄂圖曼土耳其在統治地區的改革方案，試圖化解危機。從 1875 年～1878 年的塞爾維亞對抗土耳其的戰爭也稱為「東方危機」，但這場危機卻讓奧匈帝國和俄羅斯開始注意到巴爾幹半島的重要性，奧匈帝國認為若是戰爭繼續下去，那麼斯拉夫人的團結最終必定會影響到其領土的安寧；俄國則是認為現在正是團結所有斯拉夫人的最佳時機，體現大斯拉夫主義和團結。因此俄羅斯和奧匈帝國私下約定其內容：1、如果土耳其人在這場戰役中獲勝，塞爾維亞和蒙特內哥羅保持現狀；2、如果土耳其人戰敗，塞爾維亞不能佔領達爾馬堤亞以及塞爾維亞與克羅埃西亞間的領土。3、俄羅斯恢復 1856 年克里米亞戰爭前的邊境；4、奧匈帝國保留波士尼亞和赫塞哥維納的兼併權，但不得佔有原屬於塞爾維亞的一小塊土地。（洪茂雄，2005，頁 76-78）1877 年發生俄土戰爭、1878 年召開「柏林會議」，在柏林會議的協商之下，波士尼亞和赫塞哥維納由奧匈帝國佔領和管轄，而各國解決定承認塞爾維亞和蒙特內哥羅為獨立國家，在這過程中，它們一直是奧匈帝國境內在巴爾幹爭取獨立的先驅。（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著、許綬南譯，1999，頁 73）

DOI:10.6814/NCCU201900758

貳、波士尼亞在第一南斯拉夫成立前的簡史

波士尼亞在中古時期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其後斷斷續續受到克羅埃西亞人或匈牙利人的統治，或者臣屬於他們。這些插曲頗為重要，畢竟今天有一些關於這塊領土的主權聲稱，就是憑藉著這些插曲。波士尼亞在特瓦克一世（Tvrtko I）統治期間—1377 年特瓦克一世自立為波士尼亞兼塞爾維亞國王——政治和疆土達到鼎盛。1398 年時，特瓦克一世的軍隊支持塞裔這一方，投入著名的科索沃戰役。一個世紀後，土耳其人征服了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把這塊領土稱為鄂圖曼帝國的波士尼亞區（pašaluk）。這種情況維持了四個世紀，然後是俄國和土耳其締結了聖斯泰法諾條約（San Stefano Agreement，1878 年 2 月）。根據這項條約，敗戰的土耳其必須把自治權交給波士尼亞。也不過才過了六個月，柏林會議又修改了聖斯泰法諾條約的條件，把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轉交給奧匈帝國作為保護地。

奧匈帝國的統治在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非常不受塞爾維亞人和伊斯蘭教徒的歡迎。塞爾維亞人為了爭取宗教和文化自主奮戰了十年（1896－1906），穆斯林也是一樣。和奧匈這個雙元帝國的緊張關係，導致奧地利皇儲斐迪南大公（Ferdinand）遇刺，從而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著、許綬南譯，1999，頁 78）。

參、克羅埃西亞在第一南斯拉夫成立前的簡史

克羅埃西亞的歷史悠久而多變化。一般認為九世紀中葉的統治者特皮米爾（Trpimir）是克羅埃西亞第一個獨立的統治者，當時的克羅埃西亞並不包括斯拉夫尼亞（Slavonia，現今為北部一省）或達爾馬提亞（Dalmatia，濱海省）。到了十世紀前半葉，托米斯拉夫（Tomislav）為中世紀的克羅埃西亞國奠下穩固根基。十一世紀時，克羅埃西亞向外擴張，領地涵蓋了達爾馬提亞的部份地區，它同時在此際與拜占庭決裂，並斷絕了和東正教之間的關係。當時克羅埃西亞也統治了今天位於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境內的一個地區：尼雷特利安斯卡（Neretljanska oblast）。

才剛邁入十二世紀，克羅埃西亞便在匈牙利的科洛曼（Koloman）王朝手中喪失其獨立地位，此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克羅埃西亞皆臣屬於匈牙利或奧匈帝國的統治。奧匈帝國綿延達八世紀的統治，促成了兩種值得特別注意的模式，因為這兩種模式皆直接影響到今天的情勢。

DOI:10.6814/NCCU201900758

雖然事實上這些領土始終是匈牙利國王和後來的奧地利皇帝的所有地，不過克羅埃西亞的貴族和知識份子，卻一直致力於爭取並維持最高限度的自治權，在頭先幾個世紀，克羅埃西亞的自治權體現在克羅埃西亞人那個有名無實的領袖頭銜上，即總督（Ban）。十三世紀末，更進一步成立了克羅埃西亞貴族的第一個議會：撒伯（Sabor）。這個名稱仍為今日的克羅埃西亞國會所沿用。（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1999）1867 年奧地利重組為奧匈帝國，克羅埃西亞中部和斯拉沃尼亞皆是匈牙利的管轄範圍。在往後的五十年，克羅埃西亞方面一直認為匈牙利並無遵守 1868 年《憲法協定》，給予克羅埃西亞自治權和百分之四十五的財政經費控制權，導致雙方關係緊張，後又因語言的問題而引發前一章節所敘述的伊利里亞運動，在 1873 年維也納當局禁止「伊利里亞」一詞後，伊利里亞運動更名為民族運動，克羅埃西亞內部紛紛成立政黨，有堅持要克羅埃西亞獨立、也有主張要和斯洛維尼亞人和塞爾維亞人組成南斯拉夫聯盟的聲音。最具這兩種主張代表性的政黨分別為由史塔爾切維奇（Ante Starčević）主導的民權黨（Stranka prava）和主教史特勞斯梅葉（Josip Juraj Strossmayer）為領導人的人民黨（Narodna stranka）。人民黨認為克羅埃西亞人應該跟塞爾維亞人還有斯洛維尼亞人聯合，所以在 1850 年先派出黨內重要人士丹尼齊奇、庫庫列維奇－薩克勤斯基（Ivan Kukuljević Sakcinski）和馬朱拉尼奇（Ivan Mažuranić）與塞爾維亞文人卡拉季奇等人簽署〈維也納文學協定〉（將在下一章節詳述），為未來可能出現的南斯拉夫先定下一個共同的語言－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並在 1866 年於薩格雷布建立南斯拉夫科學研究院，這是第一所以「南斯拉夫」為名的機構。（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著、許綬南譯，1999，頁 50；洪茂雄，2005，頁 83-84）

民權黨則屬於極端右派政黨，不僅主張克羅埃西亞獨立，更主張要恢復克羅埃西亞領土面積最大的時期，支持「大克羅埃西亞主義（Pan-Croatianism），認為其他南斯拉夫民族不過是東正教或是伊斯蘭教的奴隸。這一政黨在日後變形成二戰後令人聞之喪膽的烏斯塔夏運動（Ustaša Movement）。（洪茂雄，2005）史塔爾切維奇本人就不認為有塞爾維亞這個民族，因此他大力反對卡拉季奇的語言改革和主張，甚至在 1870 至 1880 年間，出版了大批主張建立克羅埃西亞民族國家的專刊。

在克羅埃西亞人和克羅埃西亞歷史上第二個特別值得一提的事實，就是軍事邊境的建立。這個地帶是匈牙利（克羅埃西亞）和鄂圖曼帝國的分水嶺，也就是名副其實的邊界。十六世紀初，哈布斯堡家族把這個地區組織成一個獨立的軍事指揮區，直接受奧地利君主節制。由於這個地區的克羅埃西亞貴族和人口數目不足以構成有效的防衛力量，哈布斯堡王朝軍事當局遂招來大批想要離開土耳其佔領區的塞裔，將他們定居於此。這些塞裔擁有特殊地位，直接向奧地利君主負責，而不必對克羅埃西亞的貴族、總督或議會負責，也不需盡任何義務。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克羅埃西亞人一直致力於爭取這些地區的政治統治權，塞裔也始終不願意放棄他們自由和自治的地位。今天情況的荒謬之處在於：塞裔現在所定居的土地，正是中世紀克羅埃西亞王國的心臟地帶。雖然當時的軍事邊境在今日大體上是一塊荒蕪未開發的地區，但該地的象徵意義和民族價值卻遠超過任何物質或商業考量。（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著、許綬南譯，1999，頁 50-51）

肆、蒙特內哥羅在第一南斯拉夫成立前的簡史

蒙特內哥羅是這塊土地上第一次出現有記載的由斯拉夫人建立的獨立國家，這個國家是十一世紀的澤塔（Zeta），它獨立了一個多世紀，然後再將近兩個世紀當中，成為擴張中的中古塞爾維亞的一部分，。隨著塞爾維亞中古王國的結束，蒙特內哥羅淪入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的交替統治，十六世紀獲得相當程度的自治權，十八世紀完全獨立。

蒙特內哥羅人自古以來就為他們悠久的獨立歷史感到驕傲，他們是南斯拉夫諸民族當中，在中世紀結束後第一個取得自由的民族，不過他們當時仍是個部落，而非現代國家。一直要到 1878 年的柏林會議，蒙特內哥羅獨立的事實才獲得國際承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蒙特內哥羅國會通過蒙特內哥羅併入賽爾維亞的表決。 蒙特內哥羅人對於他們在戰場上的傑出紀錄極端驕傲。這個由強健山地居民所組成的小民族，花在爭取時間、鞏固自由的時間遠超過任何其他的南斯拉夫民族。這項傳統使得蒙特內哥羅人在二次大戰時表現出眾。（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著、許綬南譯，1999，頁 54）

伍、斯洛維尼亞在第一南斯拉夫成立前的簡史

斯洛維尼亞這支斯拉夫部落在七世紀時來到阿爾卑斯山南端和亞德里亞海之間的地區，但是在九世紀中葉前，一般來說，他們並未被冠上斯洛維尼亞人的統稱。這主要是因為斯洛維尼亞人跟其他南方斯拉夫人不同，他們不曾在中世紀建立自己的國家，承受了一千多年的不斷壓迫與瓜分，主要的迫害者是德意志和奧地利的統治者。（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1999）他們在八世紀時就被查理曼帝國征服，變成德意志民族的屬地，初期屬於神聖羅馬帝國，之後屬於奧匈帝國直到 1918 年。（洪茂雄，2005，頁 85）

斯洛維尼亞人幾乎都信羅馬天主教，他們使用斯洛維尼亞語，以拉丁字母書寫。在歷史上，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這個唯一與其接壤的斯拉夫國家，從來沒有發生過領土或種族方面的紛爭。（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著、許綬南譯，1999，頁 57）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在 1848 年奧匈帝國發生革命運動，部分充滿民族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一方面主張提高斯洛維尼亞語的法律地位，使其成為學校教育的合法語言；另一方面要求在奧匈帝國境內實行自治。但是在匈牙利獨立戰爭失敗後，維也納當局就對屬地的自治運動就加強制止，因此斯洛維尼亞的自治夢想並未實現。到十九世紀末，斯洛維尼亞的民族運動產生一種新路線，就是所謂「三元論」（Trialism），亦即在奧匈雙元帝國中，再加上斯拉夫一元，而此斯拉夫就是由斯洛維尼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塞爾維亞人、波士尼亞人和蒙特內哥羅等民族共同組成和奧匈帝國有相同平等地位的南斯拉夫國。然而贊成的其他人並不多，尤其以塞爾維亞人特別反對，因為他們想建立自己的大塞爾維亞。（洪茂雄、2005，頁 85-86）

陸、塞爾維亞在第一南斯拉夫成立前的簡史

中世紀的塞爾維亞王國是尼滿雅（Nemanja）國王在十二世紀建立的。要瞭解今天的局勢，不能忽略一項重要的事實，那就是這個塞爾維亞中世紀王國是以科索沃及其附近為中心，也就是以這個今天有九成人口是阿爾巴尼亞人的自治省為中心。跟克羅埃西亞的克拉伊納（Krajina）一樣，科索沃也是種族紛爭最激烈的地區之一。在當時，科索沃是塞爾維亞精神和俗世生活的首要之地。在與保加利亞、匈牙利以及拜占庭進行了一連串的戰爭（和間歇的聯盟）之後，塞爾維亞王國開始向南方和東方擴張，在強大的杜山皇帝統治期間，不論是疆土的面積或國家的安定，都達到巔峰。當時的塞爾維亞王國涵蓋了今天的蒙特內哥羅、波士尼亞的一部分、達爾馬提亞海岸、整個馬其頓和希臘北部的一大部分。不過當時的北界不像今天伸展的那麼遠。

在杜山皇帝統治前後，家族鬥爭削弱了塞爾維亞君王和統治者的權威。杜山過世後，這種爭鬥的影響更形顯著，因為塞爾維亞的封建君主和統治者，並沒有聯合起來對抗鄂圖曼帝國的征服行動。塞爾維亞在土耳其人手中嚐到一連串的失敗，最重要的是 1398 年的科索沃戰役，該役為獨立的塞爾維亞中世紀王國敲響喪鐘。土耳其人又花費了六十年才徹底征服所有的塞爾維亞土地，但是在這項征服完成之前，包括塞爾維亞在內的巴爾幹諸國，都已淪入鄂圖曼帝國的主宰之下。

關於科索沃戰役，有一點應該補充。雖然塞爾維亞人以戰敗收場，但這場戰役的傳奇不僅撐過了近五個世紀的土耳其統治，甚至還化為一則神話以及塞爾維亞人精神生活的推動力。關於塞爾維亞英雄的傳奇事蹟，以韻文的方式代代口耳相傳，這種情形在十八和十九世紀尤其明顯，那時主張獨立和反抗土耳其人的新精神正開始成形。正因如此，科索沃戰役和科索沃這個地區對塞爾維亞人可說真有極其崇高的象徵價值。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儘管歷經漫長的土耳其統治，大體來說，塞爾維亞人並未皈依伊斯蘭教。（鄰接波士尼亞和蒙特內哥羅的）桑札克（Sandžak）地區是個重要的例外，該地處於波士尼亞伊斯蘭教大公的行政統轄範圍，有相當高比例的人口信仰伊斯蘭教。由於宗教和經濟的壓力，有許多塞爾維亞人北遷到匈牙利，或西向遷往奧匈帝國境內的克羅埃西亞，這也大致說明了何以這個民族會分散到斯洛維尼亞以外的每一個南斯拉夫共和國。（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著、許綬南譯，1999，頁 58-59）

在 1804 年和 1815 年分別爆發了第一次（不成功）和第二次（成功）塞爾維亞叛變，這些叛變贏得了 1830 年的塞爾維亞自治，真正獨立則要到 1845 到 1878 年間，最後在 1878 年的柏林會議上得到國際承認其為主權國家。獨立後的塞爾維亞接連進行了三場區域性戰爭。第一場敗給保加利亞，當時的仇恨至今仍未消散。不過，在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當中，塞爾維亞卻加入，或可說是促成了保加利亞、蒙特內哥羅以及希臘之間的聯盟，共同逐退歐洲的土耳其人，把他們侷限在伊斯坦堡周圍的狹長土地上。從土耳其人那裡取得的土地引發了第二次巴爾幹戰爭，塞爾維亞和希臘組成的聯盟擊敗保加利亞，瓜分了馬其頓的領土。塞爾維亞得到了約略相當於今天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的地區，有一陣子，這塊土地就被稱為南塞爾維亞。

居住在匈牙利或說奧匈帝國境內多瑙河北岸的塞爾維亞人，在十九世紀興起了強烈的民族情感，他們支持塞爾維亞叛變，更積極參與 1848 年的革命事件。接著是為後來稱為伏伊伏丁那的地區進行政治奮鬥，奮鬥期間，他們和同樣臣屬於奧匈帝國的克羅埃西亞人締結了政治聯盟。伏伊伏丁那的塞裔也是民族精神勃發的指標，他們鼓動並協助居住在塞爾維亞本土的塞裔對抗土耳其佔領者所殘餘的最後力量。雖然在多瑙河南北的塞裔之間有著強固的民族關聯，然而一直要到一次大戰之後，他們才共同組一個國家。

塞爾維亞的語言歧異情形最為嚴重，即使是在那兩個自治省裡，仍有兩種字母並存的必要。雖然東正教信徒佔有壓倒性的多數，但西南部的穆斯林以及北部的天主教徒都是不可忽視的少數。（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著、許綬南譯，1999，頁 59-66）

柒、第一南斯拉夫的成立及殞落

在十八和十九世紀的民族覺醒時期，以及今日的民族復興浪潮中，激勵了某些「民族鬥士」。由於南斯拉夫是由六個共和國構成，自然會形成許多內部邊界，而這些邊界絕少是沒有爭議的。

南方斯拉夫民族彼此征伐領土的行為，因為兩個外來的征服力量而中輟：來自北方的奧匈帝國，以及進攻南部和中部的土耳其人。在被緬懷為「黃金時代」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的獨立王國時期結束後，南方斯拉夫人接連幾個世紀臣服於外來統治。這兩個瓜分南方斯拉夫人領土的地國，皆反對民族國家的觀念，因此唯有訴諸兇殘血腥的對抗，才能夠爭取到建立（或者某些相關人士可能會說，恢復）獨立國家的地位。

要了解促成南方斯拉夫民族攜手合作，藉以提升抗拒外族統治力量的這種南斯拉夫（Yugoslav）觀念，必須先明瞭在十八世紀最後那一季開始形成的民族覺醒和民族意識。

南方斯拉夫民族間的關係調整，不論是在過去或現在，都是由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扮演主要的角色。再後來成為南斯拉夫的那些地域，這兩個族群主宰了民族覺醒的過程。但是就民族覺醒的力量、性質和方向而言，他們的貢獻非常不同，要了解南斯拉夫成為一個國家後所面臨的種種問題，這是關鍵之一。（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著、許綬南譯，1999，頁 59-66）

十九世紀塞爾維亞人的居住地要比中世紀或一百年後的塞爾維亞王國小得多。這兩次叛變的主要目的，都是為了取得自治和自由，最終則是在這塊土地上建立國家。雖然居住在多瑙河對岸奧匈帝國境內的塞爾維亞人不但為這些叛亂者打氣，並且還積極支持塞爾維亞叛變，但沒有證據顯示卡拉喬傑或奧布雷諾維奇曾企圖把所有的塞爾維亞人聯合成一個國家。他們足夠精明，曉得這樣做完全沒有成功的可能，因為這麼做等於是要獨力同時對付兩個強大的帝國。（俄國可憐同為東正教徒的塞爾維亞人，但是沒有提供多大的實質幫助。）事實上，奧布雷諾維奇甚至還積極向奧地利尋求援助，支持他對付土耳其人，此舉自然使他無法向奧匈帝國統治的塞爾維亞人鼓吹民族主義。

從中世紀到民族覺醒時期，塞爾維亞人的民族意識一直和東正教息息相關。東正教信仰是塞爾維亞民族精神的重要成份之一，正因如此，儘管塞爾維亞人分散各地，他們還是具有高度的民族自決。此外，就在兩次塞爾維亞叛變過後，知名的塞爾維亞語言改革者卡拉季奇，開始成為以新語言學重新定義塞爾維亞世界（Serbdom）的決定力量。

卡拉季奇正確地觀察到，農民已經為自治的塞爾維亞公國打好了基礎。雖然那些反叛者對民族性的定義可能相當模糊，但叛變成功對提升塞爾維亞人自尊心的效用，要遠超過幾十篇學識淵博的論文。因此，創建獨立的塞爾維亞的工作若仍倚賴教會作為唯一的民族機制，顯然不是最契合時勢的做法。

卡拉季奇開啟了這個革命能源，團結了塞爾維亞文化，擴大了民族覺醒的範圍。他同時違反了一切傳統標準，盡可能擴大塞爾維亞世界的定義，不論宗教，把所有講 Štokavian 的人都包括進來。根據他的說法，塞爾維亞民族並不侷限於東正教信徒。只要他們講這種語言－按照卡拉季奇的說法，這種語言是塞裔民族的文化遺產－天主教徒和穆斯林也是塞爾維亞人。就這樣，卡拉季奇激發了一種新的塞爾維亞民族意識，目的在於把數量龐大的克羅埃西亞天主教徒和所有的波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士尼亞穆斯林皆融入塞爾維亞的民族定義之下。（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著、許綬南譯，1999，頁 67-68）

加拉沙寧繼承了這項任務，他成為把民族意識轉化成民族政策的樞紐人物。1884 年時，他把他的想法寫在一份當時不能公開、稱之為「大綱」的文件中。跟許多同時代的人一樣，加拉沙寧相信塞爾維亞的民族使命是完成塞裔叛變所揭始的解放行動。這個新國家的疆界必須涵蓋所有塞爾維亞人居住的地區。他遵循卡拉季奇的做法，以語言作為疆界的判準。「解放並統一」所有塞爾維亞人以組成一個大塞爾維亞國，逐漸成為塞爾維亞政策的主要原則。於是在建立一個南方斯拉夫民族的這個目標上，舉凡與塞爾維亞利益無關的部分，都變得不重要，也因此遭到縮減。（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著、許綬南譯，1999，頁 68）

1905 年，克羅埃西亞人領袖杜倫比契（A. Trumbić）和塞爾維亞人領袖蘇比洛（F. Supilo），在克羅埃西亞城市里耶卡（Rijeka）商獲協議，成立「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聯盟」（Croato-Serb Coalition），成為克羅埃西亞地方議會中的主要政黨，取得多數席位，這是第一次克族人和塞族人共組政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這些政治領袖經國義大利逃往倫敦，於 1915 年成立了一個「南斯拉夫委員會」（Yugoslav Committee），以建立包括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等三支民族在內的一個國家為奮鬥目標。不過當時塞爾維亞王國的政府，最初只想將塞國的領域擴大，將波士尼亞兼併，並沒有進一步聯合其他民族共組「南斯拉夫國」的意圖，對共組聯邦的態度比較積極的是克羅埃西亞人。1917 年 7 月間，早已逃亡到希臘科基拉島（英文：Corfu，又譯為科孚島）上的塞爾維亞王國總理巴什契（N. Pasić）終於同意與「南斯拉夫委員會」代表杜倫比契等在科基拉島集議，會後發表〈科孚宣言〉（Declaration of Corfu），聲明願於戰後在塞爾維亞的黑喬治王朝領導下，由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等三支民族共組聯合王國，實行君主憲政。至於聯合王國的組織型態，採取中央集權或聯邦制，則尚無定論。（李邁先、洪茂雄，2012，頁 278）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奧匈帝國宣告瓦解，克羅埃西亞與斯洛維尼亞、塞爾維亞共組聯合王國。（洪茂雄，2005，頁 84）1918 年 8 月他們推派代表在斯洛維尼亞首都盧比安那集會，組成「南斯拉夫國家委員會」（Yugoslav National Council），11 月 23 日國家委員會宣布願與塞爾維亞王國和蒙特內哥羅王國共組聯合王國，並派代表二十四人晉見塞國攝政亞歷山大親王請其出任新國元首。12 月 1 日亞歷山大在貝爾格勒正式宣告「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斯洛維尼亞人的王國」（下文將稱為第一南斯拉夫）成立。同時，蒙特內哥羅王國也迅速召開國會，決議廢除該國國王，加入新的聯合王國。不過，三族同享平等權利、共創平等和諧國家的夢想不出十年便告破碎。頗具聲望的克羅埃西亞農民黨（Hrvatska seljačka stranka 或 HSS）領袖拉狄奇（Stjepan Radić）即因聲望從隆，

DOI:10.6814/NCCU201900758

被當局視為眼中釘，而在 1928 年遭蒙特內哥羅議員暗殺。1929 年國王亞歷山大一世下令解散議會及各政黨，廢除 1921 年制訂的《維多斯坦憲法》（Vidovdan Constitution），集軍政大權於國王一身，建立一個超越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和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之上的「南斯拉夫民族主義」國家—南斯拉夫王國（Kingdom of Yugoslavia）（簡稱為第二南斯拉夫），並在 1931 年更正式頒佈新憲法，使其獨裁合法化。（李邁先、洪茂雄，2012，頁 278）然而 1934 年亞歷山大國王被刺殺身亡後，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份子與塞爾維亞民主派合作贏得 1939 年選舉，克羅埃西亞取得自治地位。

而兩次大戰期間，納粹德國攻入南斯拉夫，成立「克羅埃西亞獨立國」的親德國傀儡政權。該政權以「烏斯塔夏」秘密警察惡名昭彰，有計畫地大量屠殺塞爾維亞人、猶太人和其他民族，在此種下種族間的深仇大恨成為未來衝突的伏筆。（洪茂雄，2005，頁 84）

第一和第二南斯拉夫的失敗可以從以下幾點來看：

第一，在兩個淪亡帝國的廢墟上所建立的這個新國家，不論就政治體系或政治結構而言，都沒有多少傳統基礎可幫助它應付國內的複雜情況，因為鄂圖曼和奧匈帝國都沒有留下任何有利於多元政治文化多元政治文化—更遑論有彈性的政治文化—發展的政策先例。這說明了何以南斯拉夫這個名副其實的多元理論及多樣的文化，會這麼難以被接納。

第二、統一之後所採行的否定南方斯拉夫諸民族之民族個別性的做法，對其使中央集權制成為一種國家組織的形式，產生相當大的催化作用。塞爾維亞人自然樂於擁有他們夢寐以求的國家，但是此舉卻在這個新國家的基礎上造成了一道大裂痕。

第三，「民族統一」的課題及其意識形態的基礎—南斯拉夫統合主義－抗拒不了多民族國家的現實。南斯拉夫統一後所需要進行的工作是穩定國家、承認國內的差異性。這樣做只會強化、而不會削弱這個國家。可是一直要到一九三九年政府才開始正視這種作法，同意克羅埃西亞巴諾維納成立。雖然政府可以、也可能已經從這種漠視民族願望的做法中學到重要教訓，但卻為時過晚，起不了什麼作用。

第四，國家政策嚴重錯誤。這項政策沒有考慮到不同的政治需求，和不同的民族認同。而且，國王和政府還堅持把一元式的「超民族」模式套用在所有事物上，這麼做只會突然刺激民族情感，催化個別的民族認同過程，即使是在那些民族情感還只處於萌芽階段的地方。

儘管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間的確存在著嚴重不和的情形，但是各民族在這段期間還是培養出不少關係，基於這項事實我們可以大膽假設若是打從一開始就實施成熟民主的治國方式，這個國家的今日結局或許會不同。（米哈伊洛・塞諾布恩

DOI:10.6814/NCCU201900758

雅著、許綬南譯，1999，頁 106-108）

第六節：狄托和第二南斯拉夫

二戰後，第二南斯拉夫面臨毀滅，南斯拉夫王國境內的諸多土地紛紛給劃給德國、義大利、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手中。當時的塞爾維亞政權是個傀儡政權、波士尼亞和赫塞哥維那則交由法西斯主義的烏斯塔沙組織的克羅埃西亞獨立國。克羅埃西亞獨立國在帕維里契（Ante Pavelić）掌權後下達了反塞爾維亞和反猶太的法律，針對塞爾維亞人和猶太人的大屠殺因此爆發。

此時塞爾維亞、波士尼亞和蒙特內哥羅以及少部分克羅埃西亞境內的塞爾維亞人組織了自己的民族主義團體—南斯拉夫祖國軍（Chetniks）。波士尼亞當時臣屬於克羅埃西亞下，民族和信仰多元的波士尼亞因此經常成為烏斯塔沙、穆斯林或是烏斯塔沙和祖國軍的衝突發生地。

南斯拉夫祖國軍在 1941 年夏天組織游擊隊，揚言對抗佔領的德軍和義軍。起初他們和狄托的民族解放軍合作，但是雙方才勉強合作六個月，他們就和狄托的民族解放軍分道揚鑣，最後更成為死敵。由於長遠目標並不同，也因此作戰時的戰術也大相徑庭。南斯拉夫祖國軍的原則是以塞爾維亞人的利益為最優先，而當時還甚不起眼的狄托的南斯拉夫解放軍則是真正的南斯拉夫作戰部隊，在第五次南斯拉夫共產黨大會的會議上奠定下「為一場全南斯拉夫的奮戰」的基礎。和烏斯塔沙還有祖國軍不同，狄托的民族解放軍遍布南斯拉夫各地，而且狄托本人為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的混血兒，他的民族解放軍卻主要是塞爾維亞人和部分來自達爾馬堤亞的克羅埃西亞人以及其他各民族。

二戰結束後，狄托和其領導的共產黨在南斯拉夫境內獲得極大歡迎，而狄托為了建立一個更穩定的國家架構，他詳加研究第一南斯拉夫的問題，並試圖做出改變。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是一個本質性的問題，於是他提出「友愛團結」（brotherhood and unity）的口號，因為若是成員不想團結，那麼就不會有南斯拉夫；此外，如亞歷山大一世追求的「單一性」是毫無意義的，狄托的統一是族群之間的行動統一，而非假裝維持一個超民族的「民族」。狄托的「友愛」指的是民族平等、相互尊敬。

狄托和南斯拉夫共產黨還從前兩個消逝的國家中得到另一個教訓，也就是要反對中央集權，也因此新政權假定會是由各個平等的共和國所組成的一個聯邦，而忽略最小的組成國人口數不到五十萬人、最大者則超過七百萬人。而且新政權假設各共和國會目標一致、團結合作，因此根本不曾認真考慮該由政府決定邊界，並以法律加以界定。（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著、許綬南譯，1999，頁 109-116）

南斯拉夫雖然名義上是個聯邦，但幾乎一直到它瓦解之前，它都有一個非國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家的權力中心：南斯拉夫共產黨。也正因為如此，在之後狄托危機達到高峰時，才會對中央集權的程度問題，出現完全相反的看法，而且雙方都「言之有據」。那些從國家結構著眼的人認為南斯拉夫的聯邦化—也就是中央集權—還需要中央集權—還需要加強；而從權力結構著眼的人則認為南斯拉夫太過中央集權。

兩次大戰期間所學到的第三個教訓，是跟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人地位有關。數量最高、分布最廣的塞爾維亞人有主宰政治議程的傾向，狄托的想法是多少降低他們做為一個團體的規模，如此一來，雖然他們實際上是多數，卻能和其他民族居於較為平等的地位。要實施這個計畫，最方便的方法就是讓居住在塞爾維亞土地上的匈牙利人和阿爾巴尼亞人建立自治省。不過克羅埃西亞境內的義大利人和塞爾維亞人卻沒有這樣的機會，因為狄托認為這樣會削弱可以和塞爾維亞人相抗衡的力量—克羅埃西亞人。（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著、許綬南譯，1999，頁116）

南斯拉夫共產黨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一樣，同為俄國共產黨一手建立。狄托政權也和其他中東歐附庸一樣，得力於紅軍的支持。俄國和南斯拉夫或更確切地說，是塞爾維亞的關係可以追朔至十九世紀的泛斯拉夫主義以及同為東正教國家等因素。在中東歐附庸當中，南共最受莫斯科重視，但第一個叛離蘇聯的國家也是南共領導的南斯拉夫。（李邁先、洪茂雄，2012，頁 408）而後來狄托為了鞏固地位，曾對共黨內部進行清算，清算的目標就是那些認為「偉大的蘇聯和史達林是社會主義的父母」的黨員。這些「正統的」黨員中，以蒙特內哥羅人和塞爾維亞人的人數最多，也因此這兩國之後所蒙受的損失最為慘重。但最諷刺的是，負責這項整肅行動的內政部長正是塞爾維亞人。（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著、許綬南譯，1999，頁 117-118）

狄托主持了一連串的經濟和政治變革，使得這個國家和最初的共產主義模式距離越來越遠。他雖然追求改變，也支持改變，不過如果某項改變會影響到南斯拉夫共產黨的主宰地位，他的態度就會完全不同。（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著、許綬南譯，1999，頁 118）

南斯拉夫成為第一個引進自營企業（Self-Management）經濟體系的共產國家。這套體系上名義是在 1950 年發起，實際上是藉由 1950 到 1965 年間的一連串經濟改革制定出來的。這些改革轉化了經濟決策的方式，也轉移了決策權力的位置。中央計畫的作法逐漸遭到棄置，改為鼓勵自營企業獨立決策，在這些企業中，工人擁有重要的決定權。價格越來越不受操縱，越來越仰賴一種特殊的市場經濟形式—之所以特殊，是因為它具有發展商品和服務就業市場的傾向，卻沒有發展勞動和資金市場的傾向，在當時，後者對社會主義國家而言，仍被視為邪說。

所有權逐漸由國家性質轉移為社會性質，這意味企業或財產在名義上沒有固定的所有者。如此一來，除了土地之外，國家的生產工具成為「每個人的，也不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屬於任何一個人的」，工人受託負責使用這些工具，以促進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著、許綬南譯，1999，頁 119）

在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初期，南斯拉夫的經濟改革對該國的經濟發展確實起了積極的作用，明顯超越其他由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然而，南國的經濟改革有流於表面化的傾向，有時為改變而改變，並施行社會共產而沒有考慮消費者心理，也沒有衡量經濟真正需求。儘管曾為狄托心腹的共產黨員吉拉斯（Milovan Đilas）[13]曾經提出這套制度的弱點，但狄托不予採納，導致 1980 年代開始，南斯拉夫的經濟狀況明顯惡化，暴露出狄托體制的極限性，而狄托後期出現外債激增，經濟困難層出不窮的情況，雖然政府當局曾試圖採取某些因應對策，諸如改變生產結構、放慢經濟發展速度、減少消費、增加出口減少進口、壓縮投資，以縮小國際收支的逆差，不過緩不濟急，成效不彰。

造成南斯拉夫經濟危機日益嚴重的主要原因，除了共黨體制欠缺靈活性之外，外債過高、赤字龐大、通貨膨脹和失業率升高都是主要原因。此外，投資不當、計畫錯誤，加上國際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也是促使南斯拉夫經濟衰退的因素。（洪茂雄，2005，頁 115）

狄托最成功的政策或許是在他的外交政策上。在 1948 年狄托公然違抗史達林和蘇聯之後，他就被史達林給排除在共產主義聯盟之外。（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1999，頁 117）他提倡的不結盟運動，使他聲望大增，不但提升南斯拉夫的國際地位，也獲得西方經濟上的支援，加速國家建設，從而亦建立起狄托個人屹立不搖的政治地位和威權體系。在 1950 年代美蘇冷戰時期，由於南斯拉夫的地理位置，使其獲得微妙的平衡。狄托在這樣的處境中，選擇採取「中庸」路線，意識形態上傾向中東歐共產主義，而物質和財政上，則趨近西方的資本主義。此外，他還擔任雙方的傳聲筒，甚至從東西雙方接受援助，吸取利益。

大體上，他把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重心放在歐洲以外的戰場，與許多剛剛獨立，或正在為獨立而奮鬥的國家合作，至此形成所謂「不結盟國家」。不結盟國家集團中的成員大多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所謂「第三世界」的國家。自 1950 年代初期，狄托即與印度總理尼赫魯（J. Nehru）、印尼總統蘇卡諾（Sukharno）和埃及總統納瑟（G. A. Nasser）等人密切接觸。（洪茂雄，2005，頁 115-116）

南斯拉夫以不結盟為標榜，獲得西方國家支持，並予以鉅額金援，以解除因中斷與蘇聯及東歐貿易所引起的財政危機。1951 年杜魯門認為，美國必須加強

[13] 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Đilas；1911.06.14~1995.04.20）:蒙特內哥羅出生的共黨黨證三號黨員，曾為狄托的心腹，曾擔任過南共聯盟中央書記和副總統。一九五零年代初期他公開主張要將南共聯盟變成議會民主制的國家，實行多黨制和西方的民主制度，結果被南共聯盟中央開除中央委員會，之後更將他從南共聯盟逮捕，並予以判刑。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南斯拉夫的軍力，以阻止蘇聯東南歐的侵略。這項政策一直延續到 1953 年艾森豪接任仍維持不變。

1961 年在貝爾格勒舉行首次不結盟國家高峰會議，共有二十五個國家參加。這些國家剛脫離帝國統治，民族意識非常強烈，而狄托為代表性的人物，因此受到這些新興國家的尊重，成為「不結盟國家」的領袖，而南斯拉夫的地位也隨之提高。然而在狄托死後，南斯拉夫在「不結盟國家」的地位也隨之低落。（洪茂雄，2005，頁 115-116）

而狄托過世後，原先南斯拉夫的穩定情勢也隨著他的逝世開始分崩離析，最後在共產黨崩潰之後，所有的問題，特別是民族和領土紛爭都立即爆發，難以收拾，最終導致南斯拉夫分裂的場景。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第四章 南斯拉夫的語言政策及國族認同

第一節：南斯拉夫的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

在提及南斯拉夫的語言政策和規劃之前，必須要先說明南斯拉夫境內有關民族的用詞和語言使用情形。根據美國學者內羅爾指出在南斯拉夫憲法明確定義中有兩個與「民族」相關的用詞，narod（nation）和 narodnost（nationality），前者指稱組成南斯拉夫的主體民族（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馬其頓人和斯洛維尼亞人）；後者則是指組成這個國家的其他非主體民族（如阿爾巴尼亞人、匈牙利人、羅馬尼亞人、斯洛伐克人、土耳其人和羅姆人）會提到這個分類主要是因為 narod 和 narodnost 在語言政策實施的位階上有所不同。（Naylor, 1992）根據 1981 年的人口普查，約有 27 種語言在南斯拉夫境內被使用超過一個世紀。以下可以分做個分類（請見表格二），第一類為南斯拉夫的主體民族（nation）使用的語言：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斯洛維尼亞語和馬其頓語。第二類強勢的非主體民族（strong nationality）的語言：匈牙利語和阿爾巴尼亞語。前面這兩類為聯邦政府正式承認的語言。第三類非主體民族（nationality）的語言：土耳其語、斯洛伐克語、羅馬尼亞語、保加利亞語、盧森語（Rusyn）、義大利語、捷克語和烏克蘭語，以上幾個語言主要在地方使用，他們被官方承認，且在體制上被支持。最後是自成一類的羅姆語（吉普賽語），使用數量上相對多數，但缺乏正式地位的族群（ethnic group）的語言。這十四個是出現在語言政策中的語言。剩下十三個則是不出現在語言規劃中的語言，包含德語、俄語、波蘭語、猶太西班牙語（Ladino）、意第緒語、土庫曼語、希臘語、亞美尼亞語、切爾克斯語（Circassian）、伊斯特羅-羅馬尼亞語（Istro-Romanian）、伊斯特羅-羅曼語（Istro-Romance）、梅格雷諾-羅馬尼亞語（Megleno-Romanian）、弗拉赫語（Vlach）。值得一提的是，弗拉赫語的使用人數與其他少數民族相比，算是相當多的，但是使用者的數量一直搖擺不定。（Bugarski, 1992）

南斯拉夫的語言可以用語言學的語系分類法分類成表 2（表格如下）

表 2 按語系的語言分類表

斯拉夫語系的語言	保加利亞語、捷克語、馬其頓語、盧森語、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斯洛伐克語、斯洛維尼亞語、烏克蘭語
其他印歐語系語言	阿爾巴尼亞語、義大利語、羅姆語、羅馬尼亞語
非印歐語言語言	匈牙利語、土耳其語

DOI:10.6814/NCCU201900758

提到語言政策時，以非印歐語系和其他非斯拉夫語系的印歐語系母語者就會有所差別，因為他們得要重新學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這對以非斯拉夫語系的語言為母語者來說相當困難。下面表 3 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與其他斯拉夫語言的對照，可以看出是非常相近的。

表 3 斯拉夫語系同詞類比表

語言 單字	俄文	波蘭文	捷克文	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文
父親	отец	ojciec	otec	otac
角/角落	угол	węgieł	úhel	ugao
拿	взять	wziąć	vzít	uzeti
水獺	выдра	wydra	vydra	vidra
教	учить	uczyć	učít	učiti

資料來源：Townsend, Charles E.& Janda, Laura A (1996). *Common and Comparative Slavic.* p.68

（以下表格皆取材自 Škiljan Dubrvko 於 1992 年寫作的文章，統計資料為 1981 年的人口普查和統計。因第一和第二南斯拉夫的資料在臺灣並不好取得，無奈筆者只能使用二手資料，請見諒。）

表 4 及表 5 則是南斯拉夫在 1981 年人口普查的有關語言的統計，從表格四可以看出，就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使用面積遠遠大於其他語言。表格五也顯示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使用面積不只很大，以該語言為母語的人口也遠多於其他語言，這都可以顯示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在南斯拉夫的通用程度。

表 4 語言使用面積分類表

	語言使用區域（以平方公里為單位）	佔南斯拉夫土地的比例（南斯拉夫面積：255804 平方公里）	使用範圍
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	225350	88.09	大
阿爾巴尼亞語	27429	10.72	

DOI:10.6814/NCCU201900758

馬其頓語	26847	10.50	中
斯洛維尼亞語	20561	8.04	
匈牙利語	18717	7.32	
土耳其語	14676	5.74	
羅姆語	14065	5.50	
斯洛伐克語	5578	2.18	小
羅馬尼亞語	5414	2.12	
盧森語	1951	0.76	
保加利亞語	1681	0.66	
義大利語	1278	0.50	
捷克語	1045	0.41	
烏克蘭語	631	0.25	

表格引用自：Dubravko, Škiljan (1992). Standard Languages in Yugoslavia. *Language Planning in Yugoslavia.* p.30

表 5 以各語言為母語者分類表

	母語人士	佔南斯拉夫人口的比例：22424711	使用範圍
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	16342885	72.88	大
斯洛維尼亞語	1761393	7.85	中
阿爾巴尼亞語	1756663	7.83	
馬其頓語	1373956	6.13	
匈牙利語	409079	1.82	
羅姆語	140618	0.63	
土耳其語	82090	0.37	
斯洛伐克語	74033	0.33	小
羅馬尼亞語	59869	0.27	
保加利亞語	37268	0.17	
盧森語	19413	0.09	
義大利語	19409	0.09	
捷克語	16197	0.07	
烏克蘭語	7058	0.03	

表格引用自：Dubravko, Škiljan(1992). "Standard Languages in Yugoslavia." *Language Planning in Yugoslavia.* p.31。）

DOI:10.6814/NCCU201900758

表 6 和表 7 則分別是 1974 年訂定的語言分類圖和語言憲法位階圖，在南斯拉夫境內使用人數最多的三個語言：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馬其頓語和斯洛維尼亞語皆屬於南斯拉夫語支，其他的則分屬其他斯拉夫語、非斯拉夫的印歐語系和非印歐語系的語言。最常被使用的五種語言：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馬其頓語、斯洛維尼亞語、阿爾巴尼亞語和匈牙利語分別使用拉丁字母和西里爾字母。斯洛維尼亞語、阿爾巴尼亞語和匈牙利語使用拉丁字母、馬其頓語使用西里爾字母，而塞爾維亞－克羅埃西語則兩種字母都使用。在南斯拉夫境內，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斯洛維尼亞語和馬其頓語不只是民族語言，在各語言使用的領域裡，也是族際間交際的語言，特別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在全南斯拉夫境內都通用。在表格六的主體民族語言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和蒙特內哥羅的語言－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和斯洛維尼亞的斯洛維尼亞語以及馬其頓的馬其頓語。

表 6 南斯拉夫 1974 年憲法語言分類表

主體民族語言（narod）	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馬其頓語、斯洛維尼亞語
非主體民族語言（narodnost）	阿爾巴尼亞語、保加利亞語、捷克語、匈牙利語、義大利語、羅馬尼亞語、盧森語、斯洛伐克語、土耳其語、烏克蘭語
族群語言	羅姆語

表格引用自 Dubravko, Škiljan (1992). "Standard Languages in Yugoslavia." *Language Planning in Yugoslavia.* p.32。）

表 7 同時也顯示出塞爾維亞兩個自治省的權力變大了，因為自治省伏伊伏丁那的官方語言－匈牙利語和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語都變成了聯邦語言。

表 7 南斯拉夫 1974 年憲法定義的語言位階表

聯邦語言	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馬其頓語、斯洛維尼亞語、阿爾巴尼亞語、匈牙利語
共和國或省級語言	羅馬尼亞語、盧森語、斯洛伐克語、土耳其語
地方級（communes）語言	保加利亞語、捷克語、義大利語、羅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姆語、烏克蘭語

表格引用自：Dubravko, Škiljan (1992). Standard Languages in Yugoslavia. *Language Planning in Yugoslavia.* p.32

根據 1974 年的聯邦憲法，南斯拉夫境內的所有民族或族群的語言都是平等的，不論是使用者的數量或是有其他考量。即使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全南斯拉夫境內有四分之三的人口都使用的語言，同時也是其他民族的第二語言，也沒有享受到特別的地位。語言的使用位階也可參照表格二，在南斯拉夫有五個聯邦級別的政府使用的語言：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斯洛維尼亞語、馬其頓語、阿爾巴尼亞語和匈牙利語，在斯洛維尼亞和馬其頓共和國的官方語言為斯洛維尼亞語和馬其頓語，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及赫塞哥維納和蒙特內哥羅的官方使用語言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但根據國名的不同而有相異的標準形式和官方名稱。在塞爾維亞境內的自治省伏伊伏丁那則有五個官方語言：塞爾維亞－克羅埃西語、匈牙利語、斯洛伐克語、羅馬尼亞語和盧森語；科索沃境內也有兩種和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地位相當的語言：阿爾巴尼亞語和土耳其語。此外，根據各地的人口組成結構，族群混居地區的當權者可以自行宣布增加官方語言。政府利用這些措施來保障南斯拉夫境內所有民族、族群和每一個公民的語言權利。

憲法保障語言的使用權利，不只是寫在紙上，也確實在現實社會中實施。所有聯邦的作為或行動都會有七種語言的版本（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三種版本、斯洛維尼亞語、馬其頓語、阿爾巴尼亞語和匈牙利語），所有需要口語溝通的聯邦委員會的活動都會備有以上語言的口譯員，教育、文化和其他活動也都用各種語言進行。唯一的例外是軍隊的使用語言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而領土防禦的單位則是使用守衛地當地的語言。不只是省級單位會提供多樣的語言版本，如伏伊伏丁那的省級委員會，就常備有五種官方語言的翻譯，其他更低階的政府層級則也會根據狀況，使用各種不同的語言。

民族語言在各自使用的領土裡也是媒體、印刷和學校（包括大學）裡的語言。此外，也有雙語學校和讓學生學習非母語的機會。不只是少數民族的學童學習主要的使用語言，也讓使用主要語言的學童學習少數民族的語言。(Bugarski, 1992)

雖然南斯拉夫的語言政策非常民主，但還是具有以下幾個缺點，就塞爾維亞語言學家布加爾斯基的看法，南斯拉夫的語言政策（一）過於強調權利，而不是機會。南斯拉夫境內的人都有權利在學校學習母語，並可以選擇不學居住地區主要的使用語言，但這卻導致某種程度的文盲出現，甚至影響少數人的就業權利，因為他們不會說居住地通用的語言；（二）官方過於強調「民族的權利」，而不是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個人的權利」，這也就是說，個人會傾向于作為一個群體中的成員來使用語言權利，而不是作為一個南斯拉夫公民；（三）執行的效果與官方的構想並不一致，如缺乏口譯和有資格的教師；（四）沒有足夠的科技和資金來維持多語言的溝通現象；（五）憲法所保障的「平等」應該要是可以自由解釋，而非按照「字面上」來解釋。這導致語言的使用變成齊頭式的平等而非真的平等。（Bugarski, 1991, pp.20-21）此外，即使憲法中並沒有指定官方語言，並賦予所有的語言平等的權利，但久而久之還是有特定的語言佔上風，在南斯拉夫裡就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有關這點將在後文詳加說明與討論。

總的來說，南斯拉夫的語言政策出發點是非常民主的，而且不只是書面上的形式，而是有實際作為，例如每個小孩都能在學校用母語學習，讓每個語言在聯邦裡都能平等的使用，以推行國家境內的各語言為例，但出發點和推行經常有所差距，特別是在推行標準語的層面上，以初等教育的教材為例，可以看到表 8 仍有三個語言缺乏正字法，這三個語言分別是烏克蘭語、羅姆語和土耳其語；文法上則是除了烏克蘭語之外，其他皆不缺乏教材。最後還有一項在推行標準語很重要的指標，就是字典，而盧森語、羅姆語和土耳其語也尚缺乏教材。

表 8 以各語言的教材分類為例

語言	正字法	文法	字典
阿爾巴尼亞語	✔	✔	✔
馬其頓語	✔	✔	✔
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	✔	✔	✔
斯洛維尼亞語	✔	✔	✔
匈牙利語	✔	✔	◎
義大利語	◎	✔	◎
斯洛伐克語	◎	✔	◎
捷克語	✔	◎	◎
保加利亞語	◎	◎	◎
羅馬尼亞語	◎	◎	◎
盧森語	✔	✔	×
烏克蘭語	×	×	✔
羅姆語	×	✔	×
土耳其語	×	✔	×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符號說明：
✔為在南斯拉夫有自己的教材和編法
◎採取母語國的教材和編法
✕缺乏教材和編法

表格引用自：Dubravko, Škiljan (1992). Standard Languages in Yugoslavia. *Language Planning in Yugoslavia.* p.37。

在南斯拉夫境內，儘管所有語言都有相同的地位，但還是有一個語言佔上風，從前文的使用面積和使用人口數量看來，這個語言就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是四個共和國內使用的語言，分別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及赫塞哥維納和蒙特內哥羅，在南斯拉夫百分之七十三的人口都使用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這個多民族、多語言的國家裡，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成為全國通行的通用語（lingua communis）[14]。這個情形就如同其他的多民族國家，例如蘇聯。蘇聯境內的各個加盟國皆有自己的語言，但當需要跨語言或是跨國溝通時，大家會選用俄語。此外，還有一個讓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與其他語言地位不同的因素，就是在南斯拉夫境內，認為自己是南斯拉夫人的數量增加許多。在 1971 年認為自己的民族是南斯拉夫人的數量為 247,000 人，到了 1981 年的人口普查（Sekulic, Massey& Hodson: 1994），多了近四倍的人數（1,217,000 人）認為自己是南斯拉夫人。這個族群的成長成了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南斯拉夫人」這個族群的認同標準不是依據宗教、文化或者是傳統，而是對南斯拉夫和語言的認同。這些認同南斯拉夫概念的人大部分都居住在族群混居的地區，如貝爾格勒、伏伊伏丁那等，儘管也有馬其頓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和保加利亞人也認同自己是南斯拉夫人，但絕大多數認同自己是南斯拉夫人的人主要是說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族群。（Isailović, 2011）

在南斯拉夫內有許多民族，但必須要強調的一點是，並沒有哪一個民族的人數超過總人口的一半，根據 1981 年的調查，塞爾維亞人佔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三十六，為比例上最高的民族。可以看出，在南斯拉夫內沒有一個佔支配地位的民族，但卻有一個優勢的語言－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這個語言不只是境內數個民族的母語，在國家裡也扮演族際溝通語的角色。還有一點也值得一提，在 1970 年代末期和 1980 年初期，政府開始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制定四種不

[14] 美國學者內羅爾認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在南斯拉夫的位置等同於"lingua communis"，而非一般指通用語的"lingua franca"。因為他認為這個詞傳達美國語言學家 Fishman 的一個觀念：「在一個國家中廣泛使用的語言，但並不表示這個語言最終會取代國家內的其他語言或是成為國內的主導語言」。但 Naylor 也指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在南斯拉夫會成為通用語的狀況是預先可知的，因為它是國內 73%人口的母語，同時南斯拉夫政府有意發展「一個多樣性的國家」的意圖，讓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與其他通用語在國家裡的狀況顯得不同。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同的標準化形式或是半標準化變體，以區分同是說這個語言的數個民族。這些「標準化」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在各自的共和國內的地位與功能就如同斯洛維尼亞語和馬其頓語在斯洛維尼亞和馬其頓社會主義共和國內的狀態。（Naylor, 1992）

克羅埃西亞語言學家布羅柔維奇在〈The Yugoslav Model of Language Planning: A Confrontation With Other Multilingual Models〉一文中表示，語言情形(language situation)、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是三個獨立，但又經常有交互關係的三個概念。語言政策是一種企圖改變或是維持現在的語言情形而出現的政治評估。語言規劃則是語言政策的實現，主要在處理語言標準化或是維持已經被標準化的語言的功能（而南斯拉夫的語言規劃可以說是非常多元的）。

如果要討論南斯拉夫的語言政策，就要先看語言政策企圖改變的是南斯拉夫的什麼語言情形？但他也在此時指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最早的語言政策是無法被討論的，因為在南斯拉夫並無專門制定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政府機構，處理語言政策的是共產黨，而他們只有提出一些基本的、概述性的原則，而實際執行的是個共和國政府，而各共和國只有針對維護傳統做規劃。也因此，在南斯拉夫內，語言規劃是有差距和代溝的，所以可以說南斯拉夫的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是被定義的不夠好的、發展不完全且經常有矛盾的。但也不需要完全否定南斯拉夫的語言政策，因為在維持語言的社會位階和語料庫的計畫中，它在執行方面還是有些可取之處。

接著他對比較南斯拉夫與其他國家的語言政策做出限制，他只比較（一）一國裡存在著兩種標準語言或是至少有兩種標準語言在國家裡是有實際功能的，但（二）不包含除了主導國家的語言之外，還有那些具有不同地位的標準語言的國家。而第一個條件就排除了大部分的第三世界的國家。第三世界的語言政策有相同的特點，就是他們使用殖民者的語言，而缺乏標準化或是甚至沒有發展書寫系統的本土語言則沒有被賦予位階。而第二點則排除了如芬蘭或是西班牙等國家。這些國家具有一個強勢的國家標準語言，但國內還有其他具有位階的語言存在。

也因此，他認為可以跟南斯拉夫語言政策做比較的下列數個國家：捷克斯洛伐克、蘇聯、瑞士、比利時、加拿大和印度。

在語言政策中有幾個關鍵的問題，就是語言政策的執行可能是會和國家的組成是相衝突的。語言規劃或許可以協助民族融合但也有可能加速自治權的發展。在這個層面上，語言政策就牽扯到國家裡的民族和語言問題了，在這種情況下，語言政策是要採取中央集權或是各行政區域有各自的語言就很重要了。

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問題比較接近國家內部的政治問題，這可以跟摩爾多瓦語和羅馬尼亞語、塔吉克語和波斯語還有印地語和烏爾都語的問題做討論。他認為是在語言標準化的發展過程中出現差異，因為上述有語言爭議的語言皆有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相同或是非常相近的基礎。

語言政策還有內部和外部的政治面向，這也就是說，國家內的少數民族語言和國家邊界的關係，還有少數民族和母國的關係以及對一個國家來說，屬於自己國家的國民在別國被視為少數民族的語言問題。此外，還有一個語言在不止一個國家被使用，然而它並不被賦予少數民族的位階或是也不被視為是少數語言，但這和南斯拉夫的情形沒有關聯。南斯拉夫的情形完全不同，而南斯拉夫模式的語言規劃可以提供一些有趣且重要的觀點。

南斯拉夫的語言規劃實際上是在制定科學、學術和科技的術語上最有表現，然而在編撰的過程中，也有受到要融合還是要自治權的壓力干擾。他認為這個情形就像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然而捷克斯洛伐克早已將語言分開，而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還在試圖走向融合一途。從另一方面來看，沒有必要將國內的少數民族的語言和母國的語言做出區別。還有在南斯拉夫內既沒有試圖讓標準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或是東方變體的塞爾維亞語變成俄語在蘇聯的地位，也不試圖讓南斯拉夫的語言如「俄羅斯化(руссификация)」一般的同化其他語言。

而在南斯拉夫和蘇聯各共和國內，皆有要保護每個語言的想法。在瑞士、比利時和加拿大基本上將同時存在數種標準語的問題處理得非常好，而這幾個國家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把語言政策和規劃是否該中央化還是要讓各行政單位自行處理的問題拿捏得宜，特別是瑞士，中央政府的功能在語言政策上比較像是象徵性的，實際上是由各自治省決定，然而蘇聯和印度則傾向中央化。

回到南斯拉夫的情形，其實和上述的各國模型都不相同，因為南斯拉夫的語言政策缺乏原則和協議，而且經常發生衝突。但同時南斯拉夫的語言政策卻也給其他同樣有多族群的國家一個好的例子，特別是針對少數民族的部分，如保存盧森人的語言和為羅姆人的語言標準化，而且這標準化的計畫是非常活躍的。（Brozović, 1992）

從語言政策和規劃中可以看出，南斯拉夫政府非常致力於打造一個「多樣性」的國家，因此在語言政策的發想上可以說是非常多元和民主的。

第二節：塞爾維亞語和克羅埃西亞語

塞爾維亞語、克羅埃西亞語、波士尼亞語和蒙特內哥羅語皆是斯拉夫語系中南方分支的語言。這四種語言有相同的基礎，他們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四種標準形式。使用人數約有兩千一百萬人左右。（Sussex & Cubberley, 2011）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許多方言在巴爾幹半島上形成方言連續體（dialect continuum），其中可分為三大方言：Čakavian、Kajkavian 和 Štokavian，分類的

DOI:10.6814/NCCU201900758

依據是「什麼」的發音。「什麼（What）」念為”Ča”，為 Čakavian；念為”Kaj”，則為 Kajkavian；念作”Što”，則為 Štokavian。（本文為避免翻譯不精準，所以將在下文以各方言的英文表示）

這三大方言又可依照發如何發古西里爾字母的中的"ѣ"（jat/yat）的方式分為 ekavian、ijekavian 和 ikavian[15]。現代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基礎是從 Štokavian 下的 Neo-Štokavian 發展而來。基本上在塞爾維亞大部分人使用 ekavian，也有部分人使用 ijekavian；克羅埃西亞用 ijekavian（達爾馬提亞南部和克羅埃西亞中部）和 ikavian（達爾馬提亞的大部分區域）；波士尼亞也使用 ijekavian（波士尼亞及赫塞哥維納的大部分區域）和 ikavian（波士尼亞中、西部和赫塞哥維納西部）、蒙特內哥羅使用 ijekavian。

圖 2 南斯拉夫境內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下各方言的分佈圖

圖片來源：http://www.pinteric.com/ste_sslq.html

[15] “ѣ”是古西里爾字母中的一個字母，在古教會斯拉夫語中唸作 jět’（ѣть）或是 iat’（□ть），在現代的拉丁字母中寫作 ě（借用自捷克語字母）。這個音轉變到現代斯拉夫語系的各語言中，已用其他的音取代。保加利亞語：ja（西部方言：e）、捷克語：í 或 ě、波蘭語：ie 或 ia、俄語：je （有些地區 ja、jije 或 ji）、斯洛伐克語：ie、烏克蘭語：i 或 ji 及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e、ije 或 i。

DOI:10.6814/NCCU201900758

表 9 三大方言的差別

	Ekavian	Ikavian	Ijekavian
時間	vreme	vrime	vrijeme
美麗的	lep	lip	lijep
女孩	devojka	divojka	djevojka
真實的	veran	viran	vjeran
坐（動詞）	sedeti (sèdeti)	siditi (sìditi)	sjediti
長白頭髮（動詞）	sedeti (sédeti)	siditi (síditi)	sijediti
加熱（動詞）	grejati	grijati	grijati

資料來源：擷取日期 2019 年 6 月 4 日，檢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htokavian

塞爾維亞語和克羅埃西亞語皆是由古教會斯拉夫語演變而來，這兩個語言有各自的演變脈絡，基本上塞爾維亞語在發展的過程中受到比較多東方語言（如土耳其語）的影響；而克羅埃西亞語主要則是受日耳曼語系語言（如德語）的影響。

關於塞爾維亞語早期的發展（七至十二世紀）眾說紛紜，有些學者認為在這段時間內就已經是一個獨立的斯拉夫語言，然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塞爾維亞語在完成發音都結尾在母音的時候（十至十一世紀）才算一個獨立的語言。塞爾維亞人在西元 867 年到 974 年間從保加利亞第一帝國的文化發展中心：奧赫里德文學學校（保加利亞語：Охридската книжовна школа）取得了古教會斯拉夫語的書籍，當時同時使用兩種字母：格拉哥里字母和西里爾字母，之後西里爾字母逐漸佔上風。自十世紀下半葉開始，塞爾維亞人開始用古教會斯拉夫語作為他們的文學語言，這個語言在之後被加上一些塞爾維亞語的特點，被稱為塞爾維亞斯拉夫語（Српскословенски），這是第一個塞爾維亞文學語言，這個語言被使用到十八世紀三零年代。

1459 年塞爾維亞成為鄂圖曼帝國的附庸，也因此語言開始受土耳其語影響，很多借詞是從土耳其語而來。

18 世紀中期到 19 世紀初期在塞爾維亞使用一種名為斯拉夫塞爾維亞語（Славеносрпски језик）的語言，主要在現今的伏伊伏丁那還有哈布斯堡王朝的塞爾維亞人使用。這個語言融合了俄羅斯的教會斯拉夫語、塞爾維亞語方言

DOI:10.6814/NCCU201900758

（Štokavian）和俄語。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這個語言主要是受過教育的人在使用。此外，當時的社會一般民眾使用的是塞爾維亞土語，教會使用的是教會斯拉夫語，於是語言學家兼文學家吳克・卡拉季奇便出來改革語言，使塞爾維亞語標準化。

他採用 Neo-Štokavian 方言的 ijekavian 和 ekavian 當基礎，還有以原則「一個字母對一個音（jedan glas – jedno slovo）」和「書寫你所說的（пиши као што говориш, а читај као што је написано.）」來改革塞爾維亞的西里爾字母，藉此讓這個語言更靠近人民的口說語言。（Tošović, 2011）

早期的克羅埃西亞人也是使用古教會斯拉夫語，這個語言主要在做禮拜時使用。九世紀開始，克羅埃西亞人用 Čakavian 當基礎，開始發展書面克羅埃西亞語。在中世紀，克羅埃西亞人主要使用格拉哥里字母（Glagoljica）、波士尼亞西里爾字母（Bosančica）和拉丁字母。格拉哥里字母主要在教堂使用直到二十世紀初。自十四世紀以來，拉丁字母的使用率越來越高，但有一個例外，就是在北部沿海地區，格拉哥里字母被天主教神職人員使用到二十世紀。

在西元八、九世紀之後，克羅埃西亞人將拉丁語作為書面及官方語言，隨著時間發展，就如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克羅埃西亞人也用拉丁語作為書面語言，從中世紀到十九世紀，克羅埃西亞人用拉丁語書寫許多文學及學術作品。然而到 1847 年，克羅埃西亞也成為最後一個拒絕將拉丁語作為官方語言的歐洲國家。然而從中世紀開始，克羅埃西亞人也同時使用古教會斯拉夫語寫作，這個語言主要用在禮拜禱文。

克羅埃西亞的語言改革如同塞爾維亞語的改革，出現在十九世紀，由柳德維特・蓋伊發起。十九世紀在克羅埃西亞出現伊利里亞運動，這個運動是克羅埃西亞的民族復興運動。在這個運動中，Štokavian 方言被視為是文學語言的基礎。此外，柳德維特・蓋伊也依照捷克文的正字法來改革克羅埃西亞語的正字法。伊利里亞運動也提議所有南斯拉夫人應該使用同一種文學語言（以 Štokavian）為基礎。在伊利里亞運動中也建造出伊利里亞科學院（Matica ilirska），也就是（後來的克羅埃西亞文化及科學院（Matica hrvatska）。 十九世紀三零、四零年代，柳德維特・蓋伊和其他運動份子在克羅埃西亞民族復興運動中，看到改革文學語言是團結南斯拉夫人，以爭取自由和國家進步的有效工具，於是便選定塞爾維亞人、蒙特內哥羅人、穆斯林[16]的共同語言－Štokavian 中的 Neo-Štokavian 作為改革克羅埃西亞文學語言的基礎。也因此，現代的塞爾維亞語和克羅埃西亞語是有共同的基礎的。（Tošović, 2011）

[16] 在 1991 年以前，並沒有波士尼亞人這個民族，居住在波士尼亞的穆斯林被視為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塞爾維亞或是克羅埃西亞人。1971 年在人口普查的選項上首次出現「穆斯林」這個選項，穆斯林在南斯拉夫被視為是一個民族。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這個複合語的名稱是出現在 1850 年簽署的「維也納文學協定（Bečki književni dogovor）」，當時代表塞爾維亞的語言學家、文學家吳克・卡拉季奇和朱拉・丹尼齊齊以及代表克羅埃西亞的作家、語言學家伊凡・庫庫耶維奇・薩克欽斯基、德米特里亞・德門特爾（Dimitrija Demeter）和伊凡・馬朱拉維奇還有斯洛維尼亞的哲學家法蘭克・米克洛斯奇（Franc Miklošič）企圖要創造一個共同的文學語言，所以出現了對塞爾維亞人來說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語」和克羅埃西亞人稱為「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語」的語言。1867 年，在薩格雷布成立了南斯拉夫科學與藝術學院，這是第一個有關這個複合語的機構，當時創辦人和院長的構想是要藉由「一個語言和一本書」來建立一個南斯拉夫人聯盟。1901 年以前，科學與藝術學院就已經創建具有權威性的文法、數冊大字典和無數的小本字典，還有正字法守則。這些作為都被視為是編撰的工具，以確保在文學協定中簽署的標準語地位。

1954 年 12 月 8 日至 10 日在塞爾維亞城市諾威薩德（Novi Sad）舉辦的會議，主旨為討論統一的語言的地位和語料庫規劃的問題，其目標是為了建立正字法規範。這場會議由塞爾維亞文學、文化及科學院年鑑（Letopis Matice srpske）的編輯委員會發起，參與者主要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的語言學家和作家。在這場會議作出以下十個結論：

（一）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蒙特內哥羅人使用有兩個地位相同的變體的單一（single）的語言，這兩種變體分別在薩格雷布（西方）和貝爾格勒（東方）發展。

（二）官方的語言名稱必須包含其兩個組成部分，也就是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

（三）拉丁字母和西里爾字母的地位相同，並期許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能在學校學會這兩套字母。

（四）兩套發音系統：ijekavian 和 ekavian 在所有方面都有相同的地位。

（五）塞爾維亞文化及科學院（Matica srpska）會和克羅埃西亞文化及科學院（Matica hrvatska）合作為共有的語言編撰字典。

（六）將為所有經濟、學術和文化生活領域建立術語。

（七）雙方將合作編寫正字法守則。

（八）必須制止會阻礙自然且正常發展的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語的人為障礙。應該制止有害的、武斷的「翻譯」及尊重作者的原文。

（九）制定正字法和術語的委員會將由三所大學（位於貝爾格勒、薩格雷布和薩拉耶佛）、兩間學院（在貝爾格勒和薩格雷布）和位於諾威薩德的塞爾維亞文化及科學院、薩格雷布的克羅埃西亞文化及科學院共同決定。

（十）結論將由塞爾維亞文化及科學院提交給聯邦行政委員會（即南斯拉夫

DOI:10.6814/NCCU201900758

聯邦政府）、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和蒙特內哥羅政府、各大學和薩格雷布的克羅埃西亞文化及科學院還有日報和期刊。（Greenberg, 2008）

1967 年克羅埃西亞學者在報上發表「克羅埃西亞文學語言的地位與名稱宣言」（Deklaracija o nazivu i položaju hrvatskog književnog jezika），內容包含：

（一） 應在憲法中清楚的表明四種文學語言：斯洛維尼亞語、克羅埃西亞語、塞爾維亞語和馬其頓語的地位相同。（二）應當保證在學校、媒體、公共生活、廣播和電視中使用克羅埃西亞語；而公務人員、教授和官員們在與克羅埃西亞人溝通時，都有義務要使用克羅埃西亞語。（Tošović, 2011）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宣言？因為克羅埃西亞人認為在國家行政體系中、聯邦軍隊、聯邦理事機構、立法機構、外交和政治組織的語言，總之用公共和大眾傳播的手段，將克羅埃西亞語推入不平等的地位，然後強加一種「國家語言」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Kačić, 2001）

1967 年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與蒙特內哥羅的文化部達成協議出版了一部權威性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辭典時引爆克國知識界的極大不滿，克國學者認為這部著作中將許多常見的克羅埃西亞字彙不是排斥，就是被當作方言或是古字處理，連發音都以塞爾維亞讀音為正宗，引起了克羅埃西亞人的文化危機意識，批評此為塞爾維亞沙文主義的表現、企圖抹殺克羅埃西亞的民族性。（左婭，2007）還有學童在學校同時學習西里爾字母和拉丁字母，而通常使用西里爾字母的人可以毫無障礙地使用拉丁字母，然而使用拉丁字母的克羅埃西亞人卻認不太得西里爾字母，因為他們認為學習西里爾字母是塞爾維亞想要主導克羅埃西亞文化的表現。此外，在狄托時期的南斯拉夫，改革塞爾維亞文字的吳克・卡拉季奇被視為是民族的英雄，而且將他當作是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人群體的象徵。他的改革讓許多南斯拉夫的人民識字，還有他的作為被視為體現南斯拉夫政府的口號：「兄弟情與統一」。（Greenberg, 2008）

因為這項宣言，所以南斯拉夫在 1974 年發布的憲法中特別提及，在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裡，所有語言都是平等的，這裡面提及的語言也包含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各種變體（如下表一〇）。克羅埃西亞人和蒙特內哥羅人決定使用民族的名稱來為國家使用的語言命名，於是名稱分別變成克羅埃西亞標準方言和蒙特內哥羅書面方言。然而波士尼亞境內的各民族則使用國家名稱來指稱官方語言，語言名稱為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標準方言；最後，塞爾維亞是繼續固守諾威薩德條約中使用的名稱，稱作自己的語言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東方變體之 ekavian。而克羅埃西亞更改語言名稱一舉顯示出他們不願意再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西方變體」。

DOI:10.6814/NCCU201900758

表 10 南斯拉夫 1954 年到 1974 年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聯合語言名稱

說明語言狀態的正式文件	1954 諾威薩德條約	1974 憲法
現今的克羅埃西亞語	西方變體	克羅埃西亞標準方言（idiom）/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書面語
現今的塞爾維亞語		
方言	Ekavian	東方變體－ekavian /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書面語
方言	Ijekavian	東方變體－ijekavian /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書面語
現今的蒙特內哥羅語	Ijekavian	蒙特內哥羅書面方言（idiom）/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書面語
現今的波士尼亞語	西方變體加東方變體 /ijekavian	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標準方言（idiom）/ 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書面語

表格引用自：Greenberg, Robert.（2008） Serbo-Croatian/ United or not we fall,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the Balkans.* p.31）

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這個名稱一直持續到 1991 年，內戰開始以後，這個語言也就不在被由前南斯拉夫分裂出的數個國家使用。

克羅埃西亞語在 1990 年就被克羅埃西亞定為國家語言，在 1991 年以後開始進行克羅埃西亞語的標準化，但經常為人詬病，因為克羅埃西亞政府希望他們的語言能成為「純粹」的克羅埃西亞語，將語言中原本有的東正教斯拉夫和東方伊斯蘭元素去除，進而用一般人民少用的古語取代。（Greenberg, 2008）

克羅埃西亞宣布克羅埃西亞語為官方語言，這件事就一般人來說，是非常正常的，國家的官方語言和國名相同是很普遍的事情，如俄羅斯的官方語言稱為俄語、法國的官方語言為法語。但從南斯拉夫的發展脈絡來看克羅埃西亞宣布國語為克羅埃西亞語，這件事就變得非常複雜了。因為在南斯拉夫時期，克羅埃西亞語被視為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西方變體，不是一個獨立的語言，而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被視為是族群融合的關鍵之一。而南斯拉夫的瓦解，伴隨著克羅埃西亞的獨立，克羅埃西亞語也和塞爾維亞語分道揚鑣，這對克羅埃西亞人的政治民族自決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卡其奇（Miro Kačić），克羅埃西亞語言及語言學院的指導，即在 1996 年的報紙專訪中表示：「克羅埃西亞語和克羅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埃西亞軍隊，是克羅埃西亞人的存在和克羅埃西亞人身份認同的保障。」克羅埃西亞人也嘗試執行語言的改變，主要從字彙方面下手，但正字法和文法的部分層面也有更動。出於一種願望，克羅埃西亞語希望被還原到一種「純粹」的狀態，也就是在南斯拉夫時期受到太多塞爾維亞語影響前的狀態，同時也再加強調兩種語言的區別，以支持克羅埃西亞語和塞爾維亞語是不同的語言的說法。而那些對「純粹」的克羅埃西亞語存有疑問的人，經常遭受到敵意，並且被質疑他們是否認同自己是克羅埃西亞人，這些人也被稱作「共產份子（communists）」、「南斯拉夫懷舊者（Yugo-nostalgics）」和「南斯拉夫秘密黨員（Crypto-Yugoslavs）」。克羅埃西亞政治週刊 Feral Tribune 在當時報導，根據學術研究，事實上只有四個詞是純粹的克羅埃西亞語，而這四個詞也是以後在國會只能使用的詞。

只有克羅埃西亞的特殊情形能理解語言的重要程度和持續激發的熱情。在南斯拉夫時期，語言是高度政治化的，表現出對克羅埃西亞語的語言認同被視為是民族主義份子和分離主義者，是危害到南斯拉夫團結的人。當代克羅埃西亞語言學家馬他修維奇（Matasović）表示，今天使克羅埃西亞語扮演克羅埃西亞人民族認同和語言認同的角色的關鍵在於共產黨極權體制下的壓迫。此外，關於克羅埃西亞獨立後關於語言問題的討論隨著戰爭的發生而更加激烈，關於語言方面的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傾向甚至比克羅埃西亞脫離南斯拉夫的問題產生更多爭論。（Langston&Peti-Stantić, 2014）

塞爾維亞語從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獨立出來後，在標準化的進行中，專家們有許多不同意見，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個派系：（一）維持現狀派：認為現代的塞爾維亞語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延續，應該讓它繼續自然地發展。（二）新吳克・卡拉季奇派：恢復回吳克・卡拉季奇改革的塞爾維亞語。（三）東正教塞爾維亞語派：追求民族主義，認為應該要尋求「東正教塞爾維亞語」還有其正字法。至今，政府採取維持現狀派的作法。此外，塞爾維亞語的標準化還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該用 ekavian 還是 ijekavian？塞爾維亞境內的人主要使用 ekavian，但是塞族共和國境內的塞爾維亞人使用 ijekavian，於是在 1997 年塞爾維亞語標準化委員會決定這兩種發音方式都是標準語。（Greenberg, 2008）此外，西里爾字母和拉丁字母都一樣被官方使用。

第三節：一個名字內包含了幾個語言？

語言經常超越語言的本質，依照政治的意識被使用作為國家和族群認同的手段與工具。

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這個名稱實際上只出現在第一南斯拉夫和第二南斯拉夫時期，第三南斯拉夫（塞爾維亞和蒙特內哥羅）時期他們的官方語言稱做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塞爾維亞語。塞爾維亞語言學家波波維奇（Ljubomir Popović）提出十九世紀出現的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標準語是一個 štokavian 的標準語通變系統（diasystem），因為它們有一個共同的 Neo-štokavian 的基礎和共同發展在大部份相同的 štokavian 的字彙上。

在第一南斯拉夫時期，確實讓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書面語[17]結合在一起，成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依循的就是 1850 年的維也納文學協定。從一開始，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就有明顯的意識形態，並引起了克羅埃西亞語言界的緊張。標準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存在和演變有幾個重要因素。其中之一就是為語言提供政治框架以結合兩個南斯拉夫－一戰後建立的王國和二戰後建立的聯邦共和國。事實上，標準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只出現在這兩個國家存在時，正如南斯拉夫王國被佔領和被分解以及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解體之後的標準語情形。

然而，為了了解現今塞爾維亞語的特性，首先我們必須分開語言現實的層面、語言分析的層面和重現事實。在語言現實的層面上，我們還必須考慮到，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在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言社群的框架內，卡拉季奇的改革所帶來的標準塞爾維亞語的延續問題， 以及標準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本質。在概念層面上，重要的是要注意這種語言的兩種概念的存在：一種是單一的同類文學語言的傳統概念，另一種則是六零年代創建的由變體組成的單一標準語言的社會語言學概念。

這兩個語言變體的差異體現在字彙方面，分別可以從土耳其語和德語的借詞數量來區別，此外，文法上也有些微差異。如克羅埃西亞語可以直接在一些動詞後加上動詞不定式，然而塞爾維亞語卻要加上一個附屬子句才能加上動詞不定式。還有在外國人名翻譯上也沒有取得共識，但這些細節都不影響這兩個語言變體的人在閱讀另一個語言變體時的流暢度，因為這兩個語言畢竟是在同一個語言系統中發展出來的。

總結來說，第一和第二南斯拉夫這兩個國家標準語言被結合了、但不是融合。（Popović, 2004）

在第一南斯拉夫時期，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名稱就曾經引起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人社群的緊張，但最大的爆發是在 1941 年克羅埃西亞的傀儡納粹政權－克羅埃西亞獨立國（Nezavisna Država Hrvatska，簡稱 NDH），這個短暫的獨立國家打破了 1850 年出現了聯合語言名稱，並且堅稱他們講的是「純粹的克羅埃西亞語」，並堅持要消除語言內所有可能的塞爾維亞因素。而在第二南斯拉

[17] 在二十世紀八零年代以前，塞爾維亞語和克羅埃西亞語不用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標準語」這樣的用詞，而是用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書面語」。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夫時期，為了國家的宗旨「兄弟情與團結」，「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這個名稱也是手段之一，只是這個名字按照塞爾維亞語言學家布加爾斯基的看法，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有著「極強的外部認同、極弱的內部認同」。（Bugarski, 1997）因為即使到二十世紀末期，北美洲和西歐在教學上和圖書館目錄的編法仍繼續使用「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這個名稱。在語言的名稱上也可以用向心力和離心力來解釋：向心力為南斯拉夫聯邦政府以及語言事實、離心力為南斯拉夫聯邦內各自獨立的共和國政府和日益升高的民族衝突。（Greenberg, 2008）在兩向的拉力之下，最終終於在第二南斯拉夫的內戰爆發之下，語言名稱也隨之分裂，甚至不只分裂成塞爾維亞語、克羅埃西亞語，更出現波士尼亞語和蒙特內哥羅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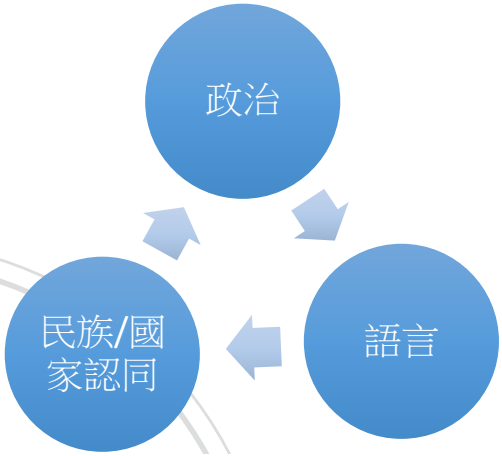

圖 3 語言、認同與國家關係圖

圖片來源：筆者自繪

其實一個有多樣中心的語言並不少見，如英語，底下就還有英式英語、美式英語、印度英語等；中文就有更多的不同的發展中心了，閩南語、客家話、粵語、北京官話和臺灣華語等，複雜程度甚是超過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和其後來的分之。但在一個廣義的大架構下，所有語言都被放在「中文」和「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這個框架下，這個框架不只是語言上的分類，更是政治的分類，政治、語言和民族認同的關係圖就如圖形 3。

以第二南斯拉夫的情況為例，當時二戰後為了聯合起來抵抗外敵，於是合併了所有講 Štokavian 的人和斯洛維尼亞人、馬其頓人等組成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而 Štokavian 這個語言也就被稱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這個語言的本質並沒有改變，但是語言的「名稱」改變了，從二戰時期短暫分裂的塞爾維亞語和克羅埃西亞語又再次變回聯合的語言名稱。而這個名稱也影響了第二南斯拉夫境內的南斯拉夫認同。認為自己是南斯拉夫人的數量增加許多。在 1971 年認為自己的民族是南斯拉夫人的數量為 247,000 人，到了 1981 年的人口普查多近四倍的人數－1,217,000 人。(Sekulic, Massey& Hodson., 1994)會認為自己是南斯拉夫人的人多半以「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作為母語。以德籍波裔作家沙夏・史丹尼奇（Saša Stanišić）的半自傳體小說《士兵修好了留聲機》為例，主角是個講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南斯拉夫人。父親是塞爾維亞人、母親是波士尼亞穆斯林。

「歷史書上說，那些解放軍游擊隊也像打倒納粹、查特尼克和墨索里尼軍隊

DOI:10.6814/NCCU201900758

一樣，把烏斯塔沙民兵也殲滅了，或者乾脆說，他們把所有反對南斯拉夫和反自由的人都擊敗了。.....我是個混血兒，也就是一半一半。我是南斯拉夫人—也就是說，我會崩潰瓦解。」(頁 73)

「一同在等的人也說著我們的語言，不過現在已經不再叫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頁 170)

這兩個段落的背景分別是第二南斯拉夫內戰發生時和主角逃到德國以後發生的事情，剛好可以映證在第二南斯拉夫時期，確實推廣的這個語言叫做「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而認為這是「我們的語言」的主角是個南斯拉夫人。他的國族認同在「南斯拉夫」上。而從認同影響到政治，這又可以從書中的另一個段落來驗證。

「我們故意集體用俄文字母來寫第一篇作文，雖然在狄托死了第三次之後，老師就告誡我們：『不要再用俄文字母寫字了。』」(頁 106)

身在波士尼亞的主角，在狄托死後，「南斯拉夫」開始動搖了之後，老師就開始不再允許他們使用「俄文字母」，也就是「西里爾字母」。從這個稱呼開始，可以看出波士尼亞當時已經開始跟塞爾維亞交惡。而南斯拉夫和各共和國的關係對比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和其他語言的關係也可以從圖形 4 見端倪。

在南斯拉夫境內下每個共和國應當要是平等的，而國家的語言也要是平等的，但是塞爾維亞語、克羅埃西亞語、波士尼亞語和蒙特內哥羅語卻還是在「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框架之下，這樣能說是國家的語言和國家處在一樣平等的地位上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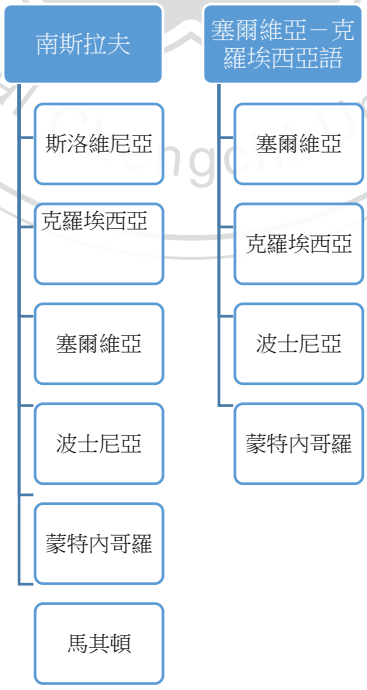

圖 4 南斯拉夫與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對比圖

圖片來源：筆者自繪

DOI:10.6814/NCCU201900758

除了斯洛維尼亞和馬其頓這兩個語言確實和其他四個國家的語言都不同外，其他四個國家都是講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國家。而原先在強調「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之下，南斯拉夫的認同是逐步上昇的，但在內部開始出現爭吵之後，語言和國家都隨之一個、一個獨立。

在第一南斯拉夫時期，亞歷山大親王的目標是打造一個超出「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等民族」的「南斯拉夫民族」，有一個這樣的超民族，那這個超民族的語言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應當是最佳的選擇，因為除了斯洛維尼亞和馬其頓外，其他該領域上的人都講這個語言或是其方言。但這樣的超民族架構忽略了原先的民族差異以及民族紛爭，像是一廂情願的作法自然很快就垮台。第二南斯拉夫時期，特別是狄托還在世時，他清楚地知道忽略差異的超民族作法並不適用於這個新國家，而是需要重視個體的不同，因此在南斯拉夫時期，語言政策可以說是非常寬容，甚至還有為羅姆人做語言標準化。唯獨有個追求一統的就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這個語言的名稱從前面的歷史的源由來看可以說是體現了狄托的口號：兄弟情與統一。這個語言的兩個選項都是 Štokavian—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中最多人講的方言；都受到卡拉季奇的影響，在語言本身確實有差異，但是差異卻又不夠大到足以變成兩個語言。

這兩個語言的差異可以從下面的例子來看：

（一）你為什麼咬他？

塞爾維亞語：Što ga biješ?

克羅埃西亞語：Zašto ga tueš?

（二）一月我決定要去做我之前覺得沒有做過的事。

塞爾維亞語：U januaru sam rešio da uradim sve što me ranije mrzelo.

克羅埃西亞語：U siječnju sam odlučio učiniti sve što mi se ranije nije dalo.

（三）火車準時在五點鐘抵達。

塞爾維亞語：Voz je stigao na stanicu tano u pet asova.

克羅埃西亞語：Vlak je stigao na kolodvor tono u pet sati.

（四）我想告訴你我不會跳舞，我一定要上課。

塞爾維亞語：Hteo sam da ti kažem da ne umem da igram, treba da idem na kurs.

克羅埃西亞語：Htio sam ti reći da ne znam plesati, moram ići na tečaj.

在塞爾維亞語中，動詞多用過去式；然而，克羅埃西亞語則幾乎不用過去式，而是用動詞的簡單式。克羅埃西亞語的月份是沿用古斯拉夫語的月份；而塞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爾維亞語則用國際通用的月份名稱。兩個語言的最大差別應該是在未來時態的表述。克羅埃西亞語可以直接用助動詞加上動詞原型表示未來式、塞爾維亞語則不能直接加上動詞原型，要加上附屬子句"da"，例子如下：

（五）我要去讀書。
塞爾維亞語：Ja ću da studiram.
克羅埃西亞語：Idem učiti.
（Kovačić, Marko, 2005）

若是延伸至加上波士尼亞語的差異和蒙特內哥羅語的差異，就如下列兩表：

表 11 BCS 的對話差別

語言 翻譯	塞爾維亞語（拉丁字母）	塞爾維亞語（西里爾字母）	克羅埃西亞語	波士尼亞語
嗨！	1. Ćao!	1. Ћао!	1. Bok!	1. Zdravo!
哈囉！你是誰？	2. Ćao! Ko si ti?	2. Ћао! Ко си ти?	2. Bok! Tko si ti?	2. Zdravo! Ko si ti?
我是大學生，名字叫做.....。那你叫做什麼名字？	1. Ja sam stùdent i zòvem se ..... . A kàko se ti zòveš?	1. Ја сам стȕдент, и зòвем се. ..... . А кàко се ти зòвеш?	1. Ja sam stùdent i zòvem se ..... . A kàko se ti zòveš?	1. Ja sam stùdent i zòvem se ..... . A kàko se ti zòveš?
我叫.....。	Zòvem se..... .	2. Зòвем се	2. Zòvem se	Zòvem se ..... .

資料來源：Alexander, Ronelle.(2010) *Bosnian, Croatian, Serbian, a Textbook: With Exercises and Basic Grammar.* p.1

表 12 四種語言同詞對比表

DOI:10.6814/NCCU201900758

語言名稱	塞爾維亞語	克羅埃西亞語	波士尼亞語	蒙特內哥羅語
公車站	автобуска станица autobuska stanica	autobusni kolodvor	autobusna stanica	автобуска станица / autobuska stanica
女孩	devojka	djevojka	djevojka	đevojka
河流	reka	rijeka	rijeka	rijeka
明天	sutra	sjutra	sjutra	śutra
非常感謝	Хвала лепо! / Hvala lepo!	Hvala ljepa!	Hvala ljepo!	Hvala lijepo!
麵包	хлеб / hleb	kruh	hljeb	хљеб / hljeb
咖啡	kafa	kava	kahfa	kafa

資料來源：Савченко, Александр.（2017），未出版之講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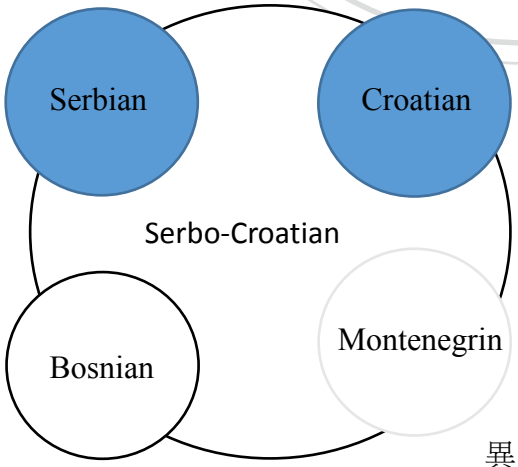

圖 5 四種語言狀態圖

資料來源：Bugarski, Ranko(2004): What's in a name: the case in Serbo-Croatian In: *Revue des études slaves*, tome 75, fascicule 1, 2004. pp. 11-20，經筆者彙整而成。

可以看出這四個語言確實是有差異，不過彼此的差異是不影響互相理解的程度，因此這個語言的狀態圖就如圖形5，黑線大圓形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而藍色實心圓形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兩個變體：塞爾維亞語和克羅埃西

DOI:10.6814/NCCU201900758

亞語。波士尼亞和蒙特內哥羅語之所以不是實心，是因為在第一和第二南斯拉夫時期，它們被視之為方言，而不是一個語言，特別蒙特內哥羅語是在第二南斯拉夫分裂之際、第三南斯拉夫分裂後才獨立出來的語言，因此用灰線表示。在第二南斯拉夫之前，蒙特內哥羅語一直被視為是塞爾維亞變體的方言，而波士尼亞語則是兩個變體以外的方言，因此用黑線表示。這四個語言都亟欲逃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大框框。總而言之，從語言學的觀點來看，這兩個甚至可以說是四個的語言是非常相近的，但並不表示它們就一定要是同一個語言，它們也可以是四個不同的語言。

第四節：「南斯拉夫人」的認同

從南斯拉夫的歷史脈絡中，我們看到卡拉季奇和蓋伊的語言改革，讓「南斯拉夫」成為了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以外的一個可能性。而在狄托建立了南斯拉夫之後，哪個語言成為統治的語言並沒有成為話題，但是語言在第二南斯拉夫中確實是重要的，因為它讓我們可以看出哪個語言代表了「南斯拉夫人」。

在第一節的語言規劃中可以看出，南斯拉夫其實並沒有決定哪個語言是國家的官方語言，而是實施多種語言並用的方式，在語言規劃的術語中，可以說地位規劃關注的是如何選擇國家官方語言，在南斯拉夫的例子中，一開始國家當局並沒有決定哪個語言是國家的官方語言，而是在憲法中保障每種語言都有平等被使用的權力，以 1963 年南斯拉夫憲法中與語言相關的法條為例。

1963 年憲法第四十三條：「為了實現公民表達其國籍和文化的自由，每個民族都有權自由使用其語言，發展自己的文化，從而建立組織並享有其他憲法規定的權力。」

（原文： *"Radi ostvarivanja slobode građana na izražavanje svoje narodnosti i kulture, zajemčeno je i svakoj narodnosti — nacionalnoj manjini pravo da slobodno upotrebljava svoj jezik, razvija svoju kulturu i da radi toga osniva organizacije i uživa druga ustavom utvrđena prava."*）

在 1963 年的憲法中，提到語言都不特別指定哪個語言，而是強調每個人都有自由使用自己語言的權力，也有母語受教權和學習權。原先南斯拉夫的語言政策鼓勵多元族群共存，且不特別賦予哪個語言不同的地位，可以說是相當平等。但從前文看來，在推行「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時，過度偏向塞爾維亞一方，從而導致衝突產生。在 1974 年的憲法中便保證了語言的標準化形式可以用國家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的名稱，例如克羅埃西亞的國家語言就是克羅埃西亞語，而非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西方變體。從 1954 年簽署了《諾威薩德條約》之後便開始了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標準化過程，而且伴隨著南斯拉夫的公共電視台和廣播放送，讓全南斯拉夫的人民都通曉這個語言。隨後，在 1974 年的憲法改革上，則是讓語言不再限於「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這個框架下，而是可以跟隨著國名更改語言名稱。因為憲法保障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且每個語言也是平等的。[18]因此在地位規劃上，可以說是盡量讓每個語言都有了被保障的地位。之後的本體規劃上則如前面第三章所言，基本上是考量到每個語言，然而，後來隨著國家分裂，語言的名稱就直接脫離「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這個名稱。

綜觀狄托時期的語言政策，筆者認為最大的問題是在一開始在推行這個聯合語言的同時，需要公平、公正地不偏頗塞爾維亞或是克羅埃西亞語任何一方，且要說明清楚各自發展的脈絡。也就是回到前面塞爾維亞語言學家拉多萬諾維奇的圖 1（頁 20），筆者認為南斯拉夫在推行標準語時，在「擴散」這個階段，也就是習得規劃上出現了極大的問題，因而導致之後的階段都無法實現。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名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語言在第一南斯拉夫和第二南斯拉夫時期的習得規劃非常成功，且成功地使得南斯拉夫認同人數增加，增加的數據可以從表格一的人口普查看出，從 1971 年的百分之一點三（約二十七萬人）增加到百分之五點四（約一百二十萬人），增加了四點一的百分比。不過遺憾的是，該表缺乏塞爾維亞境內以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為母語者的資料，目前的人口普查已經不將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列為母語普查的項目之一。筆者認為在推行「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同時，「南斯拉夫民族」的認同也隨之升高。儘管不是所有講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人都會認同自己是南斯拉夫人，但大多認同自己是南斯拉夫人的人會認為自己講的語言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

如表 13，可以看出在南斯拉夫尚未分裂前，「南斯拉夫」的民族認同是隨著年份增加的，從 1971 年的百分之一點三增加至 1981 年的百分之五點四。

表 13 南斯拉夫 1971 與 1981 的南斯拉夫民族人口數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1971		1981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南斯拉	273,077	1.3	1,216,463	5.4

[18] 1974 年憲法第一百五十四條：「不論國籍、種族、性別、語言、宗教、教育或是社會階級，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原文："Građani su jednaki u pravima i dužnostima bez obzira na nacionalnost, rasu, pol, jezik, veroispovest, obrazovanje ili društveni položaj. Svi su pred zakonom jednaki."）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夫民族				
總人口數	20,522,972	100	22,438,331	100

表格引用自：擷取日期 2019 年 6 月 4 日，檢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the_Socialist_Federal_Republic_of_Yugoslavia

表 14 則是將南斯拉夫人認同數的百分比依照南斯拉夫境內各個共和國來檢測，可以看出南斯拉夫民族的認同是隨著年份增加的，除了波士尼亞及赫塞哥維納和科索沃之外。而波士尼亞及赫塞哥維納的南斯拉夫民族認同在 1971 年大幅下降與 1971 年頭一次將「穆斯林」放進人口普查的選項有關。在這之前波士尼亞穆斯林只能勾選的身份認同為克羅埃西亞人或是塞爾維亞人。而科索沃人則傾向勾選阿爾巴尼亞人或是塞爾維亞人做為他們的身份認同。（Sekulic, Massey& Hodson., 1994）如克羅埃西亞從 1961 年的百分之零點四、1971 年的百分之一點九到 1981 年的百分之八點二；塞爾維亞在 1961 年的百分之零點二、1971 年的百分之一點四道 1981 年的百分之四點八；波士尼亞及赫塞哥維納則是從 1961 年的百分之八點四到 1971 年大幅下降至百分之一點二，到 1981 年又上升至百分之七點九。而民族混居之處如伏伊伏丁那則是從 1961 年的百分之零點二一路上升至 1971 年的百分之二點四，最後到達 1981 年的百分之八點二。

表 14 南斯拉夫民族認同分布

共和國及自治省	1961	1971	1981
克羅埃西亞	0.4	1.9	8.2
中央塞爾維亞	0.2	1.4	4.8
波士尼亞及赫塞哥維納	8.4	1.2	7.9
科索沃	0.5	0.1	0.1
馬其頓	0.1	0.2	0.7
蒙特內哥羅	0.3	2.1	5.3
斯洛維尼亞	0.2	0.4	1.4
伏伊伏丁那	0.2	2.4	8.2
全南斯拉夫	1.7	1.3	5.4

表格引用自：Sekulic, Massey& Hodson(1994) Who Were the Yugoslavs? Failed Sources of a Common Identity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9, No. 1(Feb., 1994). pp. 83-97

DOI:10.6814/NCCU201900758

表 15 則是克羅埃西亞共和國的南斯拉夫民族人口統計。在 1981 年戰爭尚未爆發時，有百分之八點二的人認為自己是南斯拉夫民族，到了 1991 年就大幅下降至百分之二點二，到了 2001 年更只剩下百分之零點零一。2011 年的人口普查則未將南斯拉夫民族列入選項之中。原先會認為自己是南斯拉夫的人大多都是像波裔德籍作家沙夏・史丹尼奇的半自傳體小說（2008）《士兵修好了留聲機》的主角一樣的混血兒或是族群混居之處的人、共產黨黨員和少數民族。（Sekulic, Massey& Hodson., 1994）

表 15 克羅埃西亞南斯拉夫民族人口數

克羅埃西亞共和國						
	1981		1991		2001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南斯拉夫民族	379,057	8.2	106,041	2.2	176	0.01
總人口數	4,601,469	100	4,784,265	100	4,437,460	100

表格來源：

1.江秉彝（2008）〈南斯拉夫疆界與民族衝突 （1991-2006）〉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頁 116。

2.擷取日期 2019 年 6 月 4 日，檢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Croatia

表 16 則顯示在克羅埃西亞則是從 1991 年戰爭爆發的該年百分之三點四九開始，到 2001 年認為自己是以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語為母語的人大幅下降到百分之零點零五，然而很有趣的是，十年過後的 2011 年比例卻又稍稍上升至百分之零點零七。顯示了自從 1974 年克羅埃西亞使用了「克羅埃西亞語」做為國語之後，「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語」這個名稱並沒有隨著時間而被遺忘，反倒還是存在於部分人的心中。

表 16 以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語為母語者

克羅埃西亞共和國						
	1991		2001		2011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DOI:10.6814/NCCU201900758

以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語為母語者	166,837	3.49	2054	0.05	3059	0.07
總人口數	4,784,265	100	4,437,460	100	4,284,889	100

表格來源：Croatian Bureau of Statistics(2013). *Census of Population, Household, Dwellings 2011*. p.12.

表 17 則是塞爾維亞的南斯拉夫民族認同。跟克羅埃西亞相反，克羅埃西亞在 2011 年的人口普查已經不再將「南斯拉夫民族」放進選項之中，但還是將「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語」放在母語普查的項目內。塞爾維亞則是不再將母語普查中放入「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但卻還保有「南斯拉夫民族」這個身份認同的選項，只是隨著時間的推進，認同自己是南斯拉夫人的人已經微乎其微。

表 17 塞爾維亞南斯拉夫民族人口數

塞爾維亞共和國 （包含中央塞爾維亞和伏伊伏丁那，不包括科索沃）								
	1981		1991		2002		2011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南斯拉夫民族	441,941	4.75	312,595	0.032	80,721	0.008	23303	0.003
總人口數	9,313,677	100	9,778,991	100	9,468,001	100	7,186,862	100

表格來源：

1.擷取日期 2019 年 6 月 4 日，檢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_history_of_Serbia

2.江秉彝（2008）〈南斯拉夫疆界與民族衝突 （1991-2006）〉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頁 113-114。

3. Риспублика Србија. Републички завод за статистику. *Становништво према националној припадности и полу, по општинама и градовима.* Retrieved 11 June, from http://www.stat.gov.rs/sr-cyrl/oblasti/popis/popis-2011/popisni-podaci-eksel-tabele/

從上述數個表格可以看出，南斯拉夫民族的認同在第二南斯拉夫時期確實是上升的，而且筆者認為這與國家推行「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是息息相關的，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特別是在族群混居的地區，例如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和伏伊伏丁那等地區，只是南斯拉夫人的認同不限於說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人，也包括認為一些民族上被列為馬其頓或是匈牙利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人。但不能因此說語言不是重要的因素，例如今日克羅埃西亞還將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語列為人口普查的一個項目，筆者認為語言仍舊是影響一個人國族認同重要的一部份。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758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民族認同下的語言和語言政策

「民族」是什麼？這個問題迄今仍有很多爭論，「想像的共同體」的安德森認為是因為印刷術和資本主義的擴散加深了「想像」因而有「民族」的出現；另一位學者霍布斯邦則認為是先有「民族主義」才有「民族」的出現。（霍布斯邦著、李金梅譯，1997，頁 12-13）除了「民族」的本質是什麼這個難以一言以蔽之的問題之外，「民族主義」或是「國族主義」是什麼也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當代著名的人類學家蓋爾納（Ernest Gellner）則主張是由國族主義產生出國族的。而國族主義是指政治與國族的組成單元，兩者必須等同一致。國族主義乃是關於政權正當性的理論，其基本主張在於種族的界限不得超越政體的疆界而他所指稱的政體的疆界也就是今日我們所討論的「國家」。簡單來說，國族主義的問題並不會出現在沒有國家的社會中。因為如果沒有國家的存在，就無需質問國族的界限是否會跟國家的疆界兩相會和。（Gellner 著、李金梅、黃俊龍譯，2001，頁 1-5）

南斯拉夫試圖要打造一個「多元民族、團結相愛」的聯邦制國家，也小心地試圖要打造一個民族「南斯拉夫人」，為什麼說要小心地？因為南斯拉夫的口號就是「多元民族」，南斯拉夫人可以也是蒙特內哥羅人、波士尼亞人、斯洛維尼亞人、匈牙利人和馬其頓人等。而每個加入南斯拉夫聯邦的共和國有著相對應的邊界，但擁有了相對應的邊界是否就沒有爭議？不是的，疆界是南斯拉夫分裂的一個重要因素。（江秉彝，2008，碩士學位論文）

至於南斯拉夫在實行語言政策的出發點也非常民主，但當一個聯邦國家裡有四個國家都用一個語言，中央卻明顯偏袒哪個國家的語言時，語言也就成了分裂的原因的之一。這個語言就是最能代表「南斯拉夫」這個國家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它的分裂是南斯拉夫分裂的催化劑也是分裂的後果。

一開始南斯拉夫並沒有制訂語言政策的相關公部門，而是將此權力交由下面的每個共和國自行處理。而在以下四個國家—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和蒙特內哥羅主要講的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也就是講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人可能是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波士尼亞人或者是蒙特內哥羅人，而沒有存在著所謂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人」。一個語言等於一個民族等於一個國家這樣的「語言國族主義」公式在南斯拉夫並不成立，特別是當南斯拉夫境內有四個共和國使用的是同一個語言，但我們也看到，如混血兒或是族群混居

DOI:10.6814/NCCU201900758

之處的人比較傾向於表示自己是「南斯拉夫人」。

從第三章歷史的脈絡來看，南斯拉夫的語言出現是十八到十九世紀的事情，經由卡拉季奇和蓋伊的語言改革，才出現所謂的「塞爾維亞語」和「克羅埃西亞語」，而且語言是在思考「民族」時開始出現的，這一點就符合蓋爾納的先有民族主義才有民族，然後才有「民族語言」，不然就只是方言或是「我們說的話」，而不是一個語言。

先有塞爾維亞學者歐布拉多維奇開始思考開始思考南斯拉夫人是哪些人，他認為從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到斯雷姆等地的人都是講同一種語言和擁有同一個根源的人，儘管宗教不同，但是語言和根源是不能被抹滅的，也就是這些人是跟他同一個民族的人。之後他試圖想要將他所說的語言不只是書上的語言，也是一般普羅大眾可以使用的語言，於是改革語言。但在改革語言上，最成功的是卡拉季奇，他收集民間歌謠、改革字母，讓一般大眾說的話成為「塞爾維亞語」，而不是教會和知識份子使用的「教會塞爾維亞語」成為「塞爾維亞人」的語言。在他們找尋「塞爾維亞人」是誰的這條路上，他們先找回了「塞爾維亞語」該是什麼樣子。

在克羅埃西亞方面，則有蓋伊的語言和字母改革。他用卡拉季奇改革的語言作為基礎，繼續在字母上做改革，讓克羅埃西亞人和塞爾維亞人有相同的語言基礎，也讓後來的南斯拉夫，除了斯洛維尼亞之外，能有相同的語言基礎。但克羅埃西亞人是誰？蓋伊則是先決定了疆界。因為他先強調了克羅埃西亞人是這塊土地上最早的居民，那麼就要先定義：這塊土地是哪裡？他認為「從維拉賀到瓦爾納」（From Villach to Varha），就包括了今日的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蒙特內哥羅、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北部和匈牙利南部的人都是同一個民族的人。支持這個看法的還有貴族德拉施科維奇（Janko Drašković），他寫到「伊利里亞人是古代希臘羅馬時期古伊利里亞人的後代，但是後來他們分裂成克羅埃西亞人、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和斯洛維尼亞人。」不論主張為何，這項運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強調所有的南部斯拉夫人有著相同的根源，所以應當要聯合起來成為一個政治實體。（Jelavich, 1983）克羅埃西亞人也在找尋民族的路上，先找到民族的重要核心之一－語言。

這個共同的語言基礎讓他們有了建立「南斯拉夫人」的第一個政體的機會，但第一南斯拉夫很快就消失。之後狄托建立了第二南斯拉夫，這個國家看似和平許久，但狄托死後就原形畢露，最終以血腥內戰做為一個國家的結局。論南斯拉夫的分裂，可以從很多因素來解讀，但從一開始，這個國家可能本來就是注定悲劇的結局。因為不論是塞爾維亞人也好、克羅埃西亞人也好，在十八世紀找尋民族主體時都曾經思考過另一個民族和自己是同樣的人。例如卡拉季奇認為講 kajkavian 的人才是克羅埃西亞人，其他講štokavian 人是轉去信仰天主教和伊斯

DOI:10.6814/NCCU201900758

蘭教的塞爾維亞人；而克羅埃西亞則有史塔契維奇（Ante Starčević）和克瓦特尼克（Eugen Kvaternik）。他們主張克羅埃西亞的領土是從阿爾卑斯山延伸到德里納河（Drina）（塞爾維亞和波士尼亞的天然邊界），以及自阿爾巴尼亞延伸至蒂莫克河（Timok）（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的接壤處），簡單來說，巴爾幹半島上只有克羅埃西亞人和保加利亞人。（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著、許綬南譯，1999，頁 72）而且在狄托時期並沒有做所謂的轉型正義，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的心結是沒有機會打開和和解的。也因此，筆者認為南斯拉夫可能本來就注定是一場悲劇。

儘管南斯拉夫的語言政策出發非常理想，但是最終語言還是敵不過民族的分裂，甚至也成了分裂的原因。從南斯拉夫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民族主義是如何影響語言政策，但同時語言政策又是如何地影響國族認同。自狄托的「兄弟情與團結」開始，各個共和國自行處理語言政策到四個同用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國家紛紛開始用自己的國家名稱為語言命名。民族在形塑語言的過程中，語言也同時在形塑著民族。到最後，國家的分裂也讓語言分裂了。

第二節：關於給臺灣的借鏡

巴爾幹半島，為亞洲要進入歐洲的門戶，東西方文化和民族在此匯集，來自不相關的脈絡，卻在此交融出豐富多采的文化。南斯拉夫作為近代巴爾幹半島上一個出現的強權國家，由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及赫塞哥維納、蒙特內哥羅、斯洛維尼亞和馬其頓組成，境內民族多達二十七個，要如何讓這個國家維持和平是一大學問，政策該如何實施更是考驗領導者的智慧，其中語言政策更是我們要關注的焦點，因為語言是人權，是人民是否擁有自由民主的象徵。

狄托時期的南斯拉夫語言政策看似非常和平，給最常見的十四族語言不同的位階，在不同的區域使用，每個人皆有權利用自己的母語接受教育，也可以說自己的母語。但為語言訂定位階，實際上也就限制了這個語言在一個地區的發展，而且後期在南斯拉夫境內擁有最多使用者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發展更是有偏向塞爾維亞語的傾向，這嚴重導致克羅埃西亞人的不滿。例如國家科學院出版的字典中出現將塞爾維亞語列為正統、克羅埃西亞語卻列為「方言」或是「過時」一事。之後隨著強人狄托的逝世，各加盟國之間的嫌隙加深，且受民族主義的影響，連帶語言的衝突都變多，特別是在南斯拉夫境內作為通用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最終在 1991 年的獨立潮中，語言也成了民族分裂的一項結果。

而作為同一個時代，但遠在東方的臺灣上，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卻是為了

DOI:10.6814/NCCU201900758

讓所有臺灣人迅速變成執政者想像中的「中國人」，而進行高壓的國語政策，即便執政者自己連「國語」都講不好，但好像大家都說同一個語言就會對國家有相同的向心力一般，卻忽略了臺灣島上各個民族能使用母語的權利、更忽略了原先在中國就有許多不同的語言存在。這個強迫性的國語政策，成功地讓人變成了說國語的人，特別是下一代，甚至母語可能都還沒有國語流利，例如筆者就是這樣的例子。解嚴過後，國語政策仍沒有消失，但已經不用國民黨時期的高壓手段，母語運動也隨著時代開放而蓬勃發展。搶救原住民語言、恢復客家語和維繫臺語的活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但卻也出現另一個問題，臺灣人究竟該認同哪個語言？是臺灣主體民族－閩南人的閩南語，還是客家語，或是最早出現在台灣的住民－原住民的語言抑或是幾乎所有人都會使用的國語？

臺灣的情形與南斯拉夫相差甚大，儘管臺灣和南斯拉夫一樣都是一個多語的環境，但是長久以來臺灣都是獨尊「國語」的狀態，而國家政府在推行語言時，也經常忽略國語以外的語言，甚至認為多學國語和英語以外的語言會影響孩童其他科目的學習，但就筆者在新竹清華大學交換期間時常前往附近水源市場的經驗，當地的菜販彼此之間講客家話，據他們所稱，海陸腔、四縣腔以及其他腔調都可以溝通、但當他們遇到筆者時會自動地轉用閩南語或是國語來與筆者溝通。筆者認為，在語言的接觸上，就弱勢語言的族群會主動地學習強勢語言，因此若是為了要落實平等的話，應該要讓一地的強勢語言族群學習該地的弱勢語言。

此外，臺灣現在積極復育鄉土語言，並且在 2018 年 12 月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將所有鄉土語言列入臺灣的國語之中。但鄉土語言的復育就筆者的觀察還有一些問題：

（一）閩南語的教材紛多雜亂，沒有一套國家制訂的標準，而且大部分的閩南語教材教的是優勢臺灣腔，也就是彰泉混合腔，但是像是宜蘭的閩南語，俗稱的宜蘭腔就是較為純粹的漳州腔，而目前宜蘭地區推行的閩南語中以推行宜蘭腔為主，教材為宜蘭縣政府自行編譯。不過一樣很獨特的彰化鹿港腔，迄今尚未有自己的教材，這點實屬可惜。

（二）客家話的部分則是目前以保留南和北四縣腔、大埔腔、海陸腔、饒平腔和詔安腔，語言使用人數稀少的永定腔和長樂腔目前沒有教材，只剩家族內使用。

（三）原住民目前有十六族、四十五種方言，官方認定的十六族為泰雅、賽夏、布農、鄒、魯凱、排灣、卑南、阿美、雅美、邵 、噶瑪蘭、太魯閣、撒奇萊雅、賽德克、拉阿魯哇和卡那卡那富族。臺灣所有的原住民語言皆屬於南島語系，並可在分為泰雅語群、排灣語群和鄒族語群等三個語群。其中排灣與群又分為北排灣語、東排灣語、南排灣語和中排灣語區。而「北排灣語區」又可以再分成 Ravar 群、Vuculj 群和 Paumaumaq 群，這三個語言群聚部落的方言並不完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全相同，有很多的名詞、發音和語法的使用上，彼此間存在著差異。

從 2000 年開始臺灣政府開始辦理「臺灣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2000 年政府首次辦理「台灣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當時公布了現行的「排灣族語語音符號」，在北排灣族語的編輯教材中，為了拼音的方便，採取一致性的方式來解決，導致有些祖先遺留下來的讀音漸漸不再使用，一個族群的語言，象徵著該族群的文化與生命，語言的流失，也意味著族群文化的沒落。

排灣族部落方言之語系，分為 5 大系統：一、ravare 系統，主要分布在屏東鄉三地門鄉；二、paumauma 系統，分布在屏東縣瑪家鄉；三、pavuavua 系統，分布在屏東縣泰武鄉、來義鄉、春日鄉；四、palilalilave 系統，分布在屏東縣獅子鄉、牡丹鄉、滿州鄉；五、paqaluqalu 系統，主要分布於臺東縣境內的排灣族部落。然而，部分排灣族語音符號的問題並沒有因「排灣族語語音符號」而得到滿足和解決。若以同被劃分為北排灣語區之屏東縣三地門鄉和瑪家鄉為例，在北排灣語的教材中，把「太陽」拼音為“qadaw”，其實，Ravar 群和大部份的 Vuculj 群是不發“q”音的。若一定要根據北排灣語的發音「太陽」的拼音應作“'adav”。而瑪家鄉瑪家村有 Tjanavakung、Makazayazaya、Vavikar 和 Paljur 四個部落，每一個部落的發音和腔調也不盡相同。（白惠蘭，2014）

目前有關排灣語的分類大致上是依照地理位置來分，但其實每個支系、細至每個部落的發音都有所不同。現行臺灣所使用的母語教材也編譯十餘年，希望能在重新編撰的時候重視每個部落的不同，在編撰教材時有幾種發音就編幾種教材，不然被忽略的發音按照現行臺灣的排灣族語使用人數，可能就會消失。利用考試來保存族語固然是一種有用的方法，但在考試之餘更重要的還是要保存臺灣的語言。

南斯拉夫雖與臺灣距離遙遠，但從兩國的語言政策經驗都可以看出，平等對待每個語言、保護自己的母語，但對其他族的族語也要懷著接納的心，或許才是一個人對待國內所有民族和語言最好的方式。或者更精確地說，接受另一個民族與自己民族是不同的存在，才是尊重他人的方式。就如同作家林蔚昀所云：「台語雖不是我的母語，但它是我生活的土地上的語言，我可以選擇它成為我在國語之外的另一個母語。如果行有餘力，我也想要讓客語、原住民語成為我其他的母語。兒子學校的課程有教台語。回到家，他常會念台語兒歌「掩咯雞，走白卵，隨你吃，隨你舔」給我聽。我很驕傲，他可以教我說我不會的台語。在台語的母語教育上，兒子反而成了我的母親—我和他一起學習，希望有一天，我們能用台灣的許多母語溝通。」[20]

[20] 林蔚昀：母語 Język ojczysty——你居住土地上的那些語言。天下雜誌－獨立評論。擷取日期：2019 年 6 月 11 日，檢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09/article/5577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回到語言與認同的關係，筆者認為說閩南語的人、說客語的人和說各種不同原民語言的人都可以認同自己是臺灣人，因為臺灣是一個多元開放的國家，只是希望當執政者在推行語言政策時，別忘記將各個民族和語言的脈絡交代清楚，並且能不偏不倚其中任何一個語言，以避免走向南斯拉夫的後路。

第三節：後續研究建議

目前臺灣在南斯拉夫領域的關注仍放在政治、經濟的研究上較多，大部分的學術文章仍屬於社會科學範疇。但筆者在研讀相關文獻的過程中，認為若是可以從歷史、宗教哲學或甚至是大眾傳播的角度來討論前南斯拉夫，相信可以為南斯拉夫的研究加深加廣。

南斯拉夫衝突是社會科學常見的討論主題，但礙於臺灣與前南斯拉夫國家的交流不多，資料也難以取得，目前臺灣所常見的研究不出政治哲學的研究方法和理論，不過綜觀巴爾幹半島的歷史，前南斯拉夫的紛爭可以追溯至鄂圖曼土耳其和奧匈帝國的角力紛爭，甚至筆者認為，是天主教、東正教和伊斯蘭教的紛爭，因為這剛好代表幾個發生內戰的國家－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和波士尼亞。而且在筆者研讀南斯拉夫相關資料的過程中，經常可以看到上述三個國家的人認為另外兩個國家的人是跟我同民族或是同語言，但是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因此筆者認為未來有志之士若是希望可以為南斯拉夫分裂的研究盡一份心力的話，可以從宗教和歷史的角度著手。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758

參考文獻

壹、中文文獻

一、書籍

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譯（2000）《國族與國族主義》。臺北市：聯經。

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黃俊龍譯（2001）《國族與國族主義》。臺北市：聯經。

Fishman, Joshua A.著、黃希敏譯（民 80）《語言社會學》。臺北市：巨流。

W.Lawrence Neuman 著、朱柔若譯（2000）《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臺北市：揚智出版社。

艾瑞克・霍布斯邦著、李金梅譯（1997）《民族與民族主義》。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朱躍、朱小超、鮑曼（2016）《語言與社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米哈伊洛・塞諾布恩雅著、許綬南譯（1999）《南斯拉夫分裂大戲》。臺北市：麥田出版。

李邁先、洪茂雄（2012）《東歐諸國史（當代完備版）》。臺北市：三民書局。

沙夏・史丹尼奇著、李雪媛譯（2008）《士兵修好了留聲機》。臺北：商周出版。

施正鋒編（1996）《語言政治與政策》，臺北：前衛出版社。

施正鋒著（2002）《各國語言政策：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臺北：前衛出版社。

DOI:10.6814/NCCU201900758

施正鋒、張學謙著（2003）《語言政策及制定『語言公平法』之研究》。臺北：前衛出版社。

洪茂雄（2005）《南斯拉夫史-巴爾幹國家的合與分》。臺北市：三民書局。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2010）《想像的共同體》。臺北市：時報文化。

陳原（2000）《社會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陳新仁譯、蘇・賴特著（2012）《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從民族主義到全球化》。北京：商務印刷館。

黃宣範（1993）《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研究》。臺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黃瑞琴（1991）《質的教育研究方法》。臺北：心理。

葉玉賢（2002）《語言政策與教育—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比較》。臺北市：前衛出版社。

葉志誠、葉立誠（2002）《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千華數位文化。

二、期刊及會議論文

田鵬（2009）〈文化民族主義與前南斯拉夫地區的民族語言問題〉，《世界民族》，西安：頁 14-22。

杜子信（2010）〈由前南斯拉夫的解體案例看中國對民族主義浪潮的應對態度〉，國際研討會《社會主義國家政經轉型》，2010 年 11 月 16 日，頁 29-42。

DOI:10.6814/NCCU201900758

——（2012）〈錫安主義的形成、演變及猶太人的復國〉，《興大歷史學報》第 25 期，台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頁 107-148。

楊聰榮（2002）〈香港的語言問題與語言政策—兼談香港語言政策對客語族群的影響〉，《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609-648。

蔡芬芳（2008）〈語言與國族認同〉《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42 期（2008.06.30），頁 110-121。

三、論文

江秉彝（2008）〈南斯拉夫疆界與民族衝突 （1991-2006）〉，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杜子信（1998）〈德意志民族東向移民運動之探討－希特勒生存空間論之歷史緣起〉，臺北：淡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林倩宇（2015）〈團結工聯與波蘭民主化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葉俊呈（2012）〈土耳其語言改革與民族認同—從語言邊界切入分析〉，臺北：政治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四、網路資料

左婭（2007）《克羅地亞》。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擷取日期：2019 年 5

DOI:10.6814/NCCU201900758

月 25 日，檢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B%E7%BD%97%E5%9C%B0%E4%BA%9A

白惠蘭（2014）〈「本土語言之教學迷思」系列〉。未出版之原始資料。

擷取日期：2019 年 6 月 11 日，檢自

http://210.240.193.239/TMMVF02/files/archive/44_ebf6885e.pdf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種族、民族與族群〉，未出版之講義。擷取日期：2019 年 6 月 11 日，檢自

http://www1.geo.ntnu.edu.tw/~moise/Data/Books/Social/03%20race%20and%20ethnic%20groups/race%20and%20ethnicity.doc

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族群〉。擷取日期：2019 年 6 月 11 日，檢自

http://dict.concised.moe.edu.tw/cgi-bin/jbdic/gsweb.cgi

語言政策，維基百科頁面。擷取日期：2019 年 6 月 11 日，檢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A%9E%E8%A8%80%E6%94%BF%E7%AD%96

貳、英文文獻

1.Books

Armstrong, Nigel, MacKenzie , Ian E. (2012). *Standardization, Ideology and Linguistics*, Palgrave Macmillan.

DOI:10.6814/NCCU201900758

Bastardas-Boada, Albert. (2012). *Language and Identity Policies In The 'Global' Age - New processes, effects, and principles of organization,* Generalitat de Catalunya. Institut d'Estudis Autonòmics.

Bugarski, Ranko., Hawkesworth, Celia. eds. (1992). *Language planning in Yugoslavia*, Ohio: Slavica Publisher, Inc

——(2004). *Language in the Former Yugoslav Lands*, Ohio: Slavica Publisher, Inc

Cooper, Robert L.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scher, Bernd J. eds. (2007). *Balkan Strongmen- Dictators and Authoritarian Rulers of South Eastern Europe*, West Lafayette,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Greenberg (2008).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the Balkans: Serbo-Croatian and its disinteg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lmes, Janet. (1999).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Group

Jelavich, Barbara. (1983). *History of the Balkans-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pović, Mate. (2011). *Language,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roatia.* Slavia Centralis

DOI:10.6814/NCCU201900758

Kohn, Hans. (1953). *Pan-Slavism: Its History and Ideology*. US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Langston, K.&Peti-Stantic, A. (2014) *Language Planning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roatia.*Palgrave

Milojković-Djurić, Jelena. (1994). *Panslav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 and in the Balkans 1830-1880: Images of the self and oth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Milroy, James and Milroy, Lesley. (1992). *Authority in language - investigating language prescription and standardisation - 2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Sussex, Roland., Cubberley, Paul. (2011). *The Slavic Languages*. Cambridge Language Surveys, Cambridge.

Townsend, Charles E.& Janda, Laura A. (1996). *Common and Comparative Slavic: Phonology and Inflection: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Russian, Polish, Czech, Serbo-Croatian, Bulgarian.* Ohio: Slavica Publishers

Wardhough, Ronald. (1992).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Wilson, Duncan. (1970). *The Life and Times of Vuk Stefanović Karadžić*, *1787-186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758

2.Periodicals

Bellamy, Alex J. (2003). The formation of Croatian national identit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p. 138–140

Browne, Wayles. (1993). 'Serbo-Croat', *The Slavonic languages*, eds Bernard Comrie and Greville G. Corbett,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p306-387.

Bugarski, Ranko. (2000). Serbo-Croatian: How Many Languages? *Die Sprachen Südosteuropas heute: Umbrüche und Aufbruch*, ed. B. Kunzmann-Müller, Franfurkt/Main Peter Lang. pp. 192-199

——(2001). Language, nationalism and war in Yugoslav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51, pp. 69-87

——(2004). Language policies in the successor states of former Yugoslavia.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Volume 3, Issue 2, 2004, pp: 189 –207

Eerde, John Van. (1961). Language in Yugoslavia.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Vol. 45, No. 2, pp. 55-58

Greenberg, Robert D. (2000). Language Politics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The Crisis over the Future of Serbian, *Slavic Reviews*, Vol. 59, No. 3, pp. 625-640

Ivanova, Vanya.(2012). Language Policy and National Equality in Socialist

DOI:10.6814/NCCU201900758

Yugoslavia (1945-1974). European Studies: *A Journal of European Culture, History and Politics*, pp. 81-111

Kovačić, Marko. (2005). Serbian and Croatian: One language or languages? *Jezikoslovlje* 6.2, pp. 195-204

Magner, Thomas F. (1967). 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in Yugoslavia. C*anadian Slavic Studies*, v.1, n.3, p.333-347

Sekulic, Dusko., Massey, Darth., Hodson, Randy. (1994). Who Were the Yugoslavs? Failed Sources of a Common Identity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9, No. 1. pp.83-97

Sočanac, Lelija. (2012). Language policies in Croatia in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Jezikoslovlje*, 13.2, pp.299-325

Tollefson, James W. (2002). The language debates: preparing for the war in Yugoslavia, 1980–199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54, pp.65-82

Zabarah, Dareg A. (2012). The language that unites and the language that divides us: Why was Arabic kept and Serbo-Croatian abolished?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40, No. 4, pp.545-559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758

3.Conference Papers

Dubravko, Škiljan(1992). Standard Languages in Yugoslavia. *Language Planning in Yugoslavia.* eds R. Bugarski and C. Hawkesworth, Ohio: Slavica Publisher, pp.27-42.

Greenberg, Marc L. (1996).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the Creation of Identity: Myths in Linguistics among the Peoples of the Former Yugoslavia. *Facul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minar, University of Kansas: "Reinvention of Tradition,"*

Ivić, P.(1992). Language Planning in Serbia Today. *Language Planning in Yugoslavia*, eds R. Bugarski and C. Hawkesworth Columbus, Ohio: Slavica Publisher, pp.101-110

Katičić, Radoslav. (1997). 'Undoing a "Unified Language": Bosnian, Croatian, Serbian', *Undoing and Redoing Corpus Planning*, ed. Michael Clyn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165-191

Naylor, Kenneth. (1992). The Sociolinguistic Situation in Yugoslavia,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Serbo-Croatian. *Language Planning in Yugoslavia*, eds R. Bugarski and C. Hawkesworth, Ohio: Slavica Publisher, pp.80-92.

Rubin, J. (1989).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Education*, eds. Chris Kennedy, 1984, George Allen & Uwin,

DOI:10.6814/NCCU201900758

London

4.Documents

Croatian Bureau of Statistics(2013) *Census of Population, Household, Dwellings 2011*. Retrieved 11 June, from https://www.dzs.hr/eng/publication/stat_year.htm

5.Dissertations

Mitchell Young. (2011). *Language and nation: an analysis of croatian linguistic nationalism.* (Master's thesis) Retrieved 11 June, from http://sdsu-dspace.calstate.edu/bitstream/handle/10211.10/1223/young_mitchell.pdf?sequence=1

6.Internet

Demographic history of Serbia. *In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Retrieved 11 June,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_history_of_Serbia

Demographics of Croatia. *In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Retrieved 11 June,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Croatia

Greenberg(2011). *Language, Nationalism and Serbian Politics*. East Europe Studies, Report No. 182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Retrieved 11 June, from

DOI:10.6814/NCCU201900758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182-language-nationalism-and-serbian-politics

Seran Doğançay Aktuna(1995): *Language planning and education: An intertwined matrix.* Boğaziçi Üniversitesi, pp.77-95. Retrieved 11 June, from http://dad.boun.edu.tr/download/article-file/303119

Shtokavian. *In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Retrieved 11 June,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htokavian

Vesna Požgaj Hadži. *Language Policy and Linguistic Reality in Former Yugoslavia* and its Successor States. Retrieved 11 June, from https://journal.hass.tsukuba.ac.jp/interfaculty/article/view/87/155

參、俄文文獻

1.Books

Гамкрелидзе, Т.В.(Главный ректор)(1989).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Жеребило, Т.В.(2010). *Словарь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терминов*., Изд. 5-е, испр. и доп. Назрань: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ОО «Пилигрим».

Михальченко, В.Ю.(ред.)(2006). *Словарь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терминов*., Институт языкознания РАН., Москва

DOI:10.6814/NCCU201900758

Нещинеко, Г.П. (2003). *Языков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славянских странах*., Москва « Наука»

Тошович, Бранко.(2011). *Корреляцинная граматика сербского, хорватского и бощняцкого языков (Часть IФонетика — Фонология — Просодия).*,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ю., Москва

2.Periodicals

Катунин, Д.А.(2008). Статус языков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сербско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е как реализация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Томск

——(2008). Статус языков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сербско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е как реализация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0).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языково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Хорват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тенденции., *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Томск

——(2016). Равноправие этносов и языков в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е федеративн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Югославия (1946–1963 гг.) как один из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их принципов созда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усин* №.3(45)., Томск: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DOI:10.6814/NCCU201900758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Том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Хмелевский М.С. (2001). *Н.И. Толстой и его взгляд на проблему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языков сербского и хорватского народо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кафедра славянской филологии

Чжуан Хуйг Чжин, А.В. Савченко (Научный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2018): *Сербохорватский Языковой Континуу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Языков Сербии, Хорватии, Боснии и Черногории.* Ужгород: Студії З Філології Та Журналістики, Випуск 5, ст.281-285

3.Internet

Голованов, Василий.(2013). Язык и политика., журнал «*Русский мир.ru*». Декабрь. Retrieved 11 June, from http://www.russkiymir.ru/media/magazines/article/99190/

Джорджевич, К. (Франция) *Соци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 языков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странах бывшей Югославии.* Retrievd 11 June, from: http://www.my-luni.ru/journal/clauses/88/

Кузнецов, С.Н. *Язык и Политика.* Retrieved 11 June, from

DOI:10.6814/NCCU201900758

http://www.philol.msu.ru/data/programs/yazpolit.pdf

Судниченко, Д.С., науч. рук. Соловей Т. Г.: *Язык и политика: аспект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Retrieved 25 May, from http://elib.bsu.by/bitstream/123456789/89957/1/sudnichenko_sbornik11_tom2.pdf

Словарь и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 на Академике. Retrieved 11 June, from https://dic.academic.ru/

肆、其他外語文獻

1.Documents

Риспублика Србија. Републички завод за статистику. *Становништво према националној припадности и полу, по општинама и градовима.* Retrieved 25 May, from: http://www.stat.gov.rs/sr-cyrl/oblasti/popis/popis-2011/popisni-podaci-eksel-tabele/

2.Internet

Baština, Kulturna. (2017). Tribina "Hrvatski jezik ne može biti srpski – odgovor orjunašima" u četvrtak u Splitu. Retrieved 11 June, from http://www.hrsvijet.net/index.php/kultura/87-kulturna-batina/46099-tribina-hrvat

DOI:10.6814/NCCU201900758

ski-jezik-ne-moze-

Belić, Aleksandar. Leksikografskoga zavoda Miroslav Krleža. Retrieved 11 June, from: http://enciklopedija.hr/Natuknica.aspx?ID=6723

Isailović, Neven. (2011). Ko su（bili）Jugosloveni? Retrieved 25 May, from https://pescanik.net/ko-su-bili-jugosloveni/

Kačić, Miro. (2001). *Jezikoslovna promišljanja*. Zagreb: Pergamena. Retrieved 11 June,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claration_on_the_Status_and_Name_of_the_Croatian_Literary_Language

Rudić, Vujadin. The Yugoslav idea, the former Yugoslavia and its Social and Geographical Features. Retrieved 4. June, from https://www.rastko.rs/istorija/srbi-balkan/vrudic-yugoslavia.html)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758

附錄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ЧЖЭНЧЖИ
ФАКУЛЬТЕТ СЛАВИСТИКИ

Чжуан Хуйг Чжин

莊慧瑾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ВЛИЯНИЕ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НА ПРИМЕРЕ НОСИТЕЛЕЙ СЕРБОХОРВАТСКОГО ЯЗЫКА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магистра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

Научный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кандидат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Лин Ши-Хуйг

Тайбэй 2019

DOI:10.6814/NCCU201900758

Данная диссертационная работа посвящен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комплекса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проблем, связанных с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языковой ситуацией в странах бывшей Югославии,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оторых считавшийся едины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 языком – «сербохорватский» – в то же самое время был «родным» для их «корен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сербов, хорватов, боснийцев и черногорцев[21].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зучение язык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и тесно связанных с ней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проблем у сербов, хорватов, боснийцев и черногорцев, т.е. граждан появившихся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Югославии и последовавшей вслед за этим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независимых Сербии, Хорватии, Боснии и Герцеговине (далее – Босния) и Черногори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большой интерес для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из разных областе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 социологии, политологии, для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в обла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других сфер знаний. Освещению указанной проблемы посвящены, например, работы та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как: [Škiljan 1991; Kovačec 1991; Brozović 1991; Hawkesworth 1993; Greenberg 2008; Бугарски (1986а, 1993б, 2010в); Тошович 2011; Ivanova 2012; Катунин 2016 и другие.]. Из достаточно большого количества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работ можно выделить такие имена «югославских» и «запад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в трудах которых, на наш взгляд, данная проблема представлена наиболее комплексно, полно и объективно, в частност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Б. Тошовича, который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самых авторитетных ученых в сфере изучения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проблем в бывшей Югославии. Наиболее значительная его работа по данной проблематике – «Корреляцион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сербского, хорватского и бошняцкого языков». Изучением указанной проблемы давно и плодотворно занимается профессор Бел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Р. Бугарски, опубликовавший целый ряд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посвятивший ей свою монографию «Portret jednog jezika.».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ученый Robert D. Greenberg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в своих статьях изменение статуса «сербохорват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язык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Югославии в Сербии, Хорватии, Боснии и Герцеговине и Черногории. Назовём ещё имена некоторых авторитетных учёных, таких как D. Škiljan, A.

[21]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 наш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не включаются такие страны бывшей Югославии, как Словения и Македония, имевшими в тот период, помимо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общ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вои собственны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кодифицированные языки – македонский и словенский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DOI:10.6814/NCCU201900758

Kovačec, D. Brozović, чьи работы достаточно часто цитируются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ями в этой области.

В Тайване учёные, изучающие различный круг проблем на Балканах, как правило обращаются к сфере политики; упомянем, например, такие работы: [Peng (彭杰夫, 1979; Zheng (鄭佳欣), 1986; Huang (黃文宏), 1988; Wu (吳貞正), 1992; Chang (張珍瑜), 1993; Chang (張致涵), 2005; Chiang (江秉彝), 2008; Saša Istenič, 2009; Chang (張心怡), 2011; Chen (陳紀安), 2015; и др.] Saša Istenič – это словенская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ица, докторская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которой посвящен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 отношениям между Тайванем и балкан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Вместе с тем, следует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до сих пор в Тайване отсутствует комплексн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Югославии, а из-за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сти информации и сведений по истории, культуре,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а ученые часто допускают неточности и факт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шибки, например, путают две разных системы алфавита – кириллицу и глаголицу.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данная работа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первых комплекс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а Тайване, в котором систематизируется и упорядочивается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й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касающийся вышеуказанной проблемы; это одна из первых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научных работ на Тайване о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и языковом планировании в бывшей Югославии и тех странах бывшей Югославии, для которых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язык Югославии – «сербохорватский» – был языком этническим (Сербия, Хорватия, Босния, Черногория). Дан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 одна из первых попыток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и систематизировать современную языковую ситуацию в указанных странах (синхрон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на фон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Балк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диахрон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на базе чисто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и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подходов и анализа. Всё это составляет научную новизну диссертационной работы.

Цел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дать комплексное описание язык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ЯС) и вытекающих из неё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ЯП) в странах бывшей Югославии – Боснии, Сербии, Хорватии и Черногории, входящих в этнически единые языковой континиум «сербохорват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диахроническом

DOI:10.6814/NCCU201900758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и синхроническом(современном) уровне.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и поставлены следующие задачи:

(1) дать оценку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проводившейся в Югославии в период с 1945 по 1991 гг.;

(2) дать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у терминам «сербский», «хорватский», «сербохорватский» язык и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основные трактовки данных понятий с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и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3)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как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влия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Предмето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является языковая ситуация и её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влиявшие на языковую политику в Югославии, а также оказывающие своё влияние на ЯС и ЯП в «пост-югославский период» в ставших независимыми странах бывшей Югославии: Сербии, Хорватии, Боснии и Черногории.

Объекто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тали меры п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у языковому планированию, предпринимавшиеся в Югославии во время правления Иосипа Броза Тито.

Источники исследуем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для диссертацион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служили:

-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тексты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языках в Югославии;
- 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отражающие частные мнения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дискуссии вокруг языкового и культур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регионе;
- материалы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 друг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ая баз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еоретическую основу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оставляют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е труды «югославских» (сербских, хорватских, боснийских, черногорских), а также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таких как Н.И. Толстой, А.Н. Соболев, D. Škiljan, A. Kovačec, D. Brozović, R. Katičić, Robert D. Greenberg, P.

DOI:10.6814/NCCU201900758

Бугарски и др. Нами были привлечен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айвань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ких учёных, в частности, Hong (洪茂雄), Tu (杜子信) и др. При работе с фактологическим материалом применяется методология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роблем язык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и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Югославии и в ряде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пост-югославских стран.

Метод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используются некоторые методы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в частности, метод опроса и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анкетирования, а также, общенаучные методы изучения источников (устных и письменных, в т.ч. электронных): устные и письменные ответы респондентов, тексты конституций и законов Югославии, Сербии, Хорватии, Боснии и Черногории, официальных сай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рганов, сайтов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й СМИ и т.д.), методы анализа и синтеза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я и обобщения. Одним из основных является метод научного описания.

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значимость работы: данная диссертационная работа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й из первых попыток проведения на Тайван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области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ки, посвящённых вопросом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и язык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на Балканах, в частности, в бывшей Югославии (и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Сербии, Черногории, Боснии и Хорватии)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интроспекци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значимость состоит в попытке комплекс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и систематизации чисто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и отча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аспектов язык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и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Предлагаемые в работе методы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описани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и экстра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экс-югослав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принципы в явления ключевых (структурных,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х, а также историко-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их) различий также составляют теоретическую значимость настоящего диссертацион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учная новизна работы: работ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первую попытку комплексного анализа язык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Югославии и в ряде пост-югославских стран и сравнения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языкового планирования и

DOI:10.6814/NCCU201900758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Югославии при Иосипе Тито.

Материалы работы могут быть использованы в практике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дисциплин по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ю, балканистике, теории языка, в курсе сербского и хорватского (resp. черногорского и боснийского) языков, славянскому и балканскому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ю, а также в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курсах, посвящённых различным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м проблемам, и курсах по проблемам межкультурн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Структура работы**: Материал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логически определяет структуру работы, которая состоит* из Введения, трёх глав (глава 1 «Понятийно-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ппара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подходы к изучению языкового планирования и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глава 2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в Сербии, Хорватии, Боснии и Черногории», глава 3 «Принципы языкового планирования и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а фоне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язык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бывшей Югославии»), Заключения, списка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считывающего 101 наименование труд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на русском – 34,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 46, на английском – 15, на сербском/хорватском – 6), 1 приложение: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Положение, выносимые на защиту:

1. Целью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Иосипа Тито было объедение всех наций и этносов, входивших в состав Федератив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Югославия. Одним из них главных «инструментов» этой политике было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культивировавшая единый сербохорватский язык.

2. «Языковая проблема» и «языковой сепаратизм», т.е. стремление к языковой само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явилось одним из факторов и причин распада Югославии.

3.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ярко проявляется тенденция к «языково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всех пост-югослав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языки получили официальное название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названия страны (Босния-боснийский/бощняцкий, Сербия-сербский, Хорватия-хорватский и Черногория-черногорский) и статус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языка.

4. Главными тенденциями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ых странах

DOI:10.6814/NCCU201900758

являются 1) постоянная поддержка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язык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при которой титульный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язык имеет максимальные преференции на всех уровнях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х. 2) Стремление достигнуть максимального отличия от други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сербохорватского языка. 3) Усиление роли СМИ,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и учёных-филологов, - с другой, в усилении позиц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идиомов. Важную роль при этом зачастую играют «не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е лингвисты», т.е. политик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деятели.

ОБЩА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РАБОТЫ

Глава 1 начинается параграфом 1.1. «Понятия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языковое планирование”», параграфом 1.2. «Понятия “стандартный язык” и “стандартизация языка”», в которых говорится о том, что язык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ейшим инструментом соци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правовой сферы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В пункте 1.3 «Этническая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с отношениями языка» говорится о том, что язык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серьёзный фактор, оказывающий своё влияние, в частности, на единение или, наоборот, расслоение и последующий распад нации. Это причина, по которой ЯП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ым элементом внутренней (а в некоторых случаях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ЯП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мер, принимае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ей, правящим классом,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ой, для изменения или сохранения существующего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языков и языковых подсистем, для выделения новых или сохранения употребляющихся языковых норм, являющихся частью общей политики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их целям [Словарь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терминов 2006: 266].

Языков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мер,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позитивное изменение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татуса бытующих в нем языков: создание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введение языков в систему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массовую коммуникацию и т. п. Параллельно с этим обычно идет

DOI:10.6814/NCCU201900758

работа п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ю структуры языка – пополнение лексики, создание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 нормализация и кодификация [там же: 272, 273].

Стандартный язык – это нормализованный язык, обслуживающий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е культурные потребности народа, язык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периодической печати, радио, театра, наук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школы и т. д. «Деление языка 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и народный значит только то, что мы имеем, так сказать, “сырой” язык и обработанный мастерами» (Горький). Нормированность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состав словаря в нем отобран из общего лексического богатства общенародного языка, значение и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слов,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и правописание регламентированы, форм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подчиняются общепринятым образцам.[22] Стандартизация языка – сведение свобод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языковых единиц к одному; выбор предписываемого (рекомендуемого) образцового варианта с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й фиксацией в словарях, грамматиках и т. п. как основа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языка.[23]

В параграфе 1.3 «Этническая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с отношениями языка»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теория «Воображаемые общества». Воображаемые общества – это концепция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которую создал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ученый Андерсон Бенедикт. «Язык делает прошлое переживаемым в настоящем, прошлое и настоящее сливаются в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Эта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фиксируется актуальным озвучением (написанием и прочтением) символических форм, тем самым осуществляя в этой непрерывности реальность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воображаем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Язык — это то, что придает “естественность” нации,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ее фатальность, непроизвольность и бесконечность с ее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ью “начала” и “окончания”. Когда появился язык? Когда появилась нация как мораль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Вопросы эти —

[22] Retrieved 22 June, from https://dic.academic.ru/dic.nsf/lingvistic/684/%D0%BB%D0%B8%D1%82%D0%B5%D1%80%D0%B0%D1%82%D1%83%D1%80%D0%BD%D1%8B%D0%B9

[23] Retrieved 2 June, from https://sociolinguistics.academic.ru/253/%d0%9a%d0%be%d0%b4%d0%b8%d1%84%d0%b8%d0%ba%d0%b0%d1%86%d0%b8%d1%8f_%d1%8f%d0%b7%d1%8b%d0%ba%d0%b0

DOI:10.6814/NCCU201900758

риторические, точнее говоря, ответы на них не предполагаются риторико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Естественность языка как бы обосновывает правомерность забвения (науч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 установленных) истоков нации. “Забвение — существенный фактор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нации” — дается ей в языке» [24]

В главе 2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в Сербии, Хорватии, Боснии и Черногории» говорится о истории Балкан. Слово *Балканы* означает «много гор». Балканы также являются своеобразным мостом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 так как соединяют западную и восточную культуры [см.: Jelavich, 1983; Мартынова, 1998; 洪茂雄, 2005]. В параграфе 2.1«История древнейших югославянских народов»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история древнейших югославян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В параграфе 2.2 «Панславизм» говорится о панславизме. В период панславизма чешские, словацкие и югославские ученые стремились сохранить свои языки и собрать свои народные истории, а также реформировать свои языки, чтобы все люди могли говорить на своих народных языках. В параграфе 2.3 «Вук Караджич: реформа языка»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история реформы сербского языка. Вук Караджич – это сербский лингвист и педагог, который реформировал серб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язык и стандартизировал сербскую кириллицу. Он выбрал штокавский диалект как базу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серб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реформировал этот диалект, чтобы он стал более похож на речь обычных людей. При этом необходимо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в течение 18 века образованные сербы говорили на славяносербском языке, который был очень похож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о Вук Караджич считал, что этот язык – не язык сербов, поэтому он стал создавать язык, который был максимально близок к разговорному языку повседневного общения сербов, а это язык во многом основывался на базе штокавского диалекта. В параграфе 2.4 «Иллиризм» говорится о реформе хорват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Людвит Гай – это хорватский лингвист и поэт, который реформировал хорватский язык. Он тоже выбрал штокавский язык как базу хорват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том числе с опорой на чешский язык, и упрощал

[24] Андерсон, Бенедикт(1991), В. Г. Николаев, пер. с англ(2001), С. П. Баньковская, вступ. ст.(2001) *Воображаемые сообщества.* ООО «Кучково поле», 2016. стр.25

DOI:10.6814/NCCU201900758

хорватский алфавит. 2.5 «Королевство Югославии и его распад». В параграфе 2.6 мы анализируем, как Тито создал Югославию и распад Югославии.

В главе 3.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языковое планирование и народ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в Югославии» пишется о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торая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способов, оказывающим влияние на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 родины, культуры и народа. Кроме т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спользует ЯП, чтобы достигнуть особен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целей. В книге «The Yugoslav Drama» пишется о том, как возрастает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одной стране: во-первых,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местного язык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базисом развит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данный язык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в образовании,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и экономике; во-вторых,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 и следующий этап –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ь; в-третьих, декларирование монолингвализма. В параграфе 3.1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языковое планирование в Югославии» мы анализируем языковую политику и языковое планирование в Югославии. В параграфе 3.2 «Сербский и хорватский язык» пишется об истории сербского и хорват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параграфе 3.3 «Сколько языков в одном названии?»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тся результаты языков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Югославии при Тито; мы уделяем большое внимание вопросу языков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при Тито. В 1954 году подписали Новисадский договор, в котором был закреплён стандарт сербохорватского языка. По мнению ученого Mihailo Crnobrnja, автора книги «The Yugoslav Drama», в Югославии было 4 языка: сербский язык, хорватский язык, словенский язык и македонский язык, но сербский и хорватский язык очень похожи друг на друга, можно так сказать, существует сербохорватский язык, и считается, что политика Югославии старалась внедрять концепцию единого «сербохорватского языка» через образование.[25] В параграфе 3.4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в Югославии» говорится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проведенных мер по укреплению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 Югославии.

[25] Crnobrnja, Mihailo.: *The Yugoslav drama*,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nd ed. edition (April 29, 1996) p.19: "The Serbian and Croatian languages so similar (though they use different scripts) that one could speak of Serbo-Croatian language, thus reducing the number of language to three. In fact government policy through the educational system was to promote the idea of a single Serbo-Croatian language."

DOI:10.6814/NCCU201900758

Таблица1

Percentage identifying as Yugoslav

Republics and provinces	1961	1971	1981
Croatia	0.4	1.9	8.2
Central Serbia	0.2	1.4	4.8
Bosnia and Herzegovina	8.4	1.2	7.9
Kosovo	0.5	0.1	0.1
Macedonia	0.1	0.2	0.7
Montenegro	0.3	2.1	5.3
Slovenia	0.2	0.4	1.4
Vojvodina	0.2	2.4	8.2
All of Yugoslavia	1.7	1.3	5.4

[Таблица составлена по данным в: C.M. Sekulic, Massey& Hodson(1994) Who Were the Yugoslavs? Failed Sources of a Common Identity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9, No. 1, pp. 83-97]

Из данных таблицы мы можем видеть, чт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в Югославии укреплялась год за годом.

В Заключении м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понятиями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и «язык». «Язык» во многом формирует «нацию», но распад нации также может происходить «с помощью» языка (как, например, в случае с Югославией). Мы проходим к выводу, что язык является ключом к объединению людей; однако, когда в 1990-х годах началась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название сербохорватского языка стало критическим местом в этом конфликте. Этот конкретный случай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как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самобытность повлияли на языковую политику, а не наоборот. Нужно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хотя нация пытается создать свой «язык», такое языков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оздает своего создателя».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проводившаяся в Югославии в период с 1945 по 1991 гг.,

DOI:10.6814/NCCU201900758

была демократичной, однако, декларативно предполагая повсеместно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сербохорватского языка», фактически поддерживался только сербский идиом, чт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ло созданию равновесной язык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данной работе дана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терминам «сербский», «хорватский», «сербохорватский» язык как обозначениям гомогенных языковых систем, 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основные трактовки данных понятий с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и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период правления Тито проходила в условиях эндоглоссной, гомогенной, гомоморфной язык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для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Югославии был характерен ярко выраженный мультилингвизм. Другими словами,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Югославии была мультилингвальной, если исключить то, что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сербским и хорватским языками относились не к билингвальным, а к монолингвальным.

В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но также то, как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влия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спользует язык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определён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целей, то есть политика фокусируется на языке, а языковая ситуация влияет на политику. Язык выступает объектом политики тогда, когд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амого языка проводится политика, под которой в широком смысле понимается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принципов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решению языковых проблем в социуме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спользует язык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определён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целей: как только встаёт вопрос о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рост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 –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затрагивается языковой вопрос.[26]

[26] Чжуан Хуйг Чжин, А.В. Савченко (Научный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Сербохорватский Языковой Континуу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Языков Сербии, Хорватии, Боснии И Черногории.* Ужгород: Студії З Філології Та Журналістики, Випуск 5, стр.281-285

DOI:10.6814/NCCU201900758